

红 领 巾 书 架

# 把一切献给党

GE MING YING XIONG ZHU YI CONG SHU

吴运铎 著



21世纪出版社

红领巾书架

书 名：把一切献给党（少年版）  
作 者：吴运铎  
责任编辑：肖飞飞  
装帧设计：毛加农  
封面画：江晓珊  
插 图：郭秀庚  
出 版 行：21世纪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960mm 1/32  
印 张：6.25  
字 数：9.6万  
版 次：199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5,000  
定 价：2.50元

ISBN 7-5391-0418-X/I·113

邮政编码：330002

（21世纪图书局属印通、泰订造印刷厂承印）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太华 吴运铎  
杨 沫 张会村  
段火梅 倪少成  
黄定元 温新华

主 编：熊向东

副主编：汪述荣 高学棻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宗觉 汪述荣  
吴 海 杜 林  
林 俊 高学棻  
黄庆来 熊向东

## 目 录

童年.....	1
劳动的开端 .....	11
在矿井里 .....	22
觉悟 .....	37
我们的工厂 .....	48
入党 .....	64
转移 .....	72
反“扫荡” .....	85
第二次负伤 .....	96
新任务.....	109
制造枪榴弹.....	126
拆定时炸弹.....	137
我们的平射炮.....	145
第三次负伤.....	156
永远前进.....	171

## 童 年

我是在矿山上长大的。

听父亲说，我们老家在湖北，家里穷得连瓦也没一片。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父亲从小四处流浪，做过店铺学徒，做过苦工，后来流落到江西萍乡煤矿，当一名记帐的小职员，才在这里安下家。

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矿，矿工们都叫它安源山。山上山下，长满茂密的树木。山腰上，烟囱林立，日夜喷吐着黑烟，炭粉把青山绿树都染黑了。连绵不断的高山，包围着这座矿工城。

我家就住在煤窑直井口旁的山脚下。在我童年的心里，矿井是个很神秘的地方。老年人说，那里藏着宝物，谁能得到宝物，谁就得到幸福。也有人说，那里暗无天日，有一天太阳照进了矿井，人们就不再受穷受苦。听到这些神奇的传说，我一心想进矿井。虽然母亲不断地嘱咐我说：“煤窑里小孩可不能进去，进去就出不来！”也吓不住我。我像一只初出窠觅食的小鸟，成天在矿山上跑来跑去，恨不得找个机会钻进矿井，把听到的一切弄个明

白。

离家门口不远的直井旁，煤车一溜溜地从井口运到洗煤厂。我喜欢学工人们的样子推煤车，弄得满身大汗；有时趁工人不注意，钻进了空煤车，弄得一身煤灰和油污。我羡慕刷洗烟囱的工人们的勇敢，也想冒险尝试一下，挽着烟囱上的铁环，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弄得满脸煤灰，挂破了衣服。只是，每次溜近煤窑口，都被大人赶回来。……

有一天，父亲买了一只鸭子，拴在院子的棚架底下。哥哥说鸭子会浮水，不沉底。难道真有这种怪事？趁着母亲没看见，我悄悄地解开绳子，抱起鸭子，一直跑到煤窑直井前的广场上，钻过了栏杆，把鸭子丢进喷水池里。

喷水池是洋灰砌的，池里都是发电厂排出的热水。水流通过粗大的铁管，喷到半空，又倒泄下来，发出闷雷一样的响声，鸭子在池里吓得乱窜。父亲不问情由，就把我拖回家去，打了一顿。第二天，拿来一个新书包，一本新书，把我叫到跟前说：

“你在家调皮总算够够了，今年六岁啦，该上学了，明天上后山胡老先生那里念书去！”

读书本来是好事。哥哥们都上了小学，我一直很羡慕。谁知父亲偏不让我跟哥哥们一起。父亲对我说：“得找个厉害先生管管你！”既然算是一种

“惩罚”，这个“上学”，我根本不感兴趣。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给我换了新衣服，用手帕包了一对蜡烛三支香，还拜托邻家的张大妈送我去后山上学。

胡老先生一看来了新学生，马上换了一件长衫，端端正正坐在上首。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写着“天地君亲师”。张大妈忙着点蜡焚香，吩咐我：

“快拜老师！快磕头！”

“又不过年，干嘛磕头呀？”

张大妈不回答，硬接着我磕了三个头。

在这里读书很枯燥。整天念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意思一点不明白，先生也从不解释。你要问他，他就瞪眼。

每天我路过煤窑直井，听见围墙里的嗡嗡声，就不由地放慢了脚步。脑子里时刻想：机器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这样叫唤？……应该去看看！

一天，我照例背了书包去上学，一出家门，跑上后山，把书包挂在树叶稠密的树枝上，就急急忙忙地跑到直井围墙门口，背着警察，溜了进去。

随着机器的响声，轻手轻脚走进了打风房。那庞大的空气压缩机整齐地排列在厂房里，巨大的飞轮飞快地旋转着，白光闪闪。这庞然大物，不息地旋转，发出隆隆的吼叫，真叫人害怕。说什么好

呢？可是一见机器就叫人走不开了。我走近围着机器的铜栏杆，两眼盯着机器出神。

背后有粗大的手搭在我的肩上。

“小家伙，你跑来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司机工人何叔叔，笑嘻嘻地站在那里。

“叔叔，那个推机器的人，躲在哪里？”

他用棉纱擦了一下油手，摸着我的头问道：

“什么推机器？”

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着说：

“你这个小傻瓜，这哪里是人推的，是汽，懂吗？”

也许不忍叫我失望，他又安慰我说：

“不要紧，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要人推还算什么机器！机器是人造的，你要它怎么着，它就怎么着。”

从那时候起，我觉得世界上最奥妙的东西就是机器了。它不吃饭，也不休息，老是轰轰隆隆地忙碌着。可是最了不起的还是工人，他能让机器听话，还能造机器！做一个管机器的工人——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梦想。

我再不愿坐在冰冷的书房里，读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书本了。每天早晨，照例把书包挂到树枝上，到处跑个够，天黑才回家。机器占据了



我整个的心，甚至夜里做梦也全是机器。这个秘密很快被母亲发觉了，她又托张大妈送我到胡老先生那里去。

“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先生问我。

“看机器去了。”

“我叫你去！我叫你去！”

他一手死死拧着我的耳朵，挣也挣不脱，疼得我抱住先生的大腿直转圈子。

“看机器有什么不好？偏要拧耳朵！”我想。

晚上回家，父亲问：

“你的耳朵怎么啦？”

“老师拧的！”

“为什么？”

“逃学！”母亲在旁边说。

“看机器去了，不是逃学。”我觉得母亲不公平。

“咳！你逃学去看机器，拧耳朵不冤枉！”父亲说。

这一夜，耳朵疼得要命，母亲用凉手巾给我捂着。我侧着身子睡，真想大喊大叫。到底还是咬咬牙，忍住了。

第二天，父亲领着我，去找胡老先生。

“胡老师，我这孩子太调皮，你要好好管教他。不过，拧耳朵要两只都拧，拧完那个，再拧这

个。像这样一个大一个小，多难看！”

“好吧，叫他明天别来就算了！”先生冷冰冰地板着脸，不教我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私塾。学校半路也进不去。母亲常为这事发愁：

“你这样下去，怎么是好啊！”

“不要紧，妈妈。将来我要当工人，造机器，开机器！”

我跑遍了整个矿山。电车厂，煤车厂，发电厂，打风房，锅炉房，升降机房，都是我经常拜访的地方。我成天在车间里混，常常连饭也顾不得回去吃。

父亲的老同事毛师傅，是修理厂的老车工，我再三请求他带我去玩。他说：

“你听话不听话？”

“带我去吧，一定听话！”

我们走进了修理厂。几百部加工机械——车床，刨床，钻床，许多特别的工作母机，都整齐地排列着。头顶上的起重机，拉着沉重的机件来回走动。这里修理全矿山的机器，也制造机器。这里的机器和我以前看见过的完全不同，以前看见过的打风机、发电机，我都不太了解它们为什么要那样旋转。可是这里的锤床、旋床，却能够看见它们工作的结果。成块的铁料卡在床子上，机器一动，一剥

一层皮，就变成了光亮亮的机件。在锻造间里，起重机的吊钩拖出通红的钢铁，送到了蒸汽锤的铁砧上。汽锤猛烈地打击大铁块，火花四射，光彩夺目，比烟火还美。在工人手里，不管多坚硬的钢铁，都变得非常驯服。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站在车床旁边干活呢？我真盼望快长大，做个工人！

在那一边，工人们拿着钢的工具刀，在旋转的砂轮上一碰，便喷射出五彩的火花，刀子立时锋利无比。我想起前几天为了造玩具枪，把厨房里的菜刀砍坏了，惹得母亲天天埋怨。这回可好了，把菜刀拿来磨快，让母亲喜欢喜欢。

第二天，我把菜刀藏在衣服里，进了车间。趁大家不注意，拿出菜刀就往砂轮上碰，不料火花一闪，菜刀脱手飞出，几乎砍在脚上，右手震得发木，瞪着眼直发愣。

毛师傅发觉了，马上走过来拾起菜刀，替我磨好，责备我说：

“你再乱动手，就不许你来了。这是好玩的吗？”

他看见我那伤心的样子，又和气地摸着我的头说：

“孩子，你还小哩！……”

我非常尊敬毛师傅。心想：像毛师傅那样的人，都是些特别的人，机器不敢不听他们的话。什

么时候我才能学到他们那样的本事呢？

跟工人们混熟了，他们送我一些小锤、小凿子、小锉刀，我很爱这些礼物，心想，他们送我这些东西，就是要我也锻炼成像他们一样的人。

到秋天，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级，每天和哥哥们去上学，念“大狗叫小狗跳”。但是心里老记挂着机器，放了学，总要绕到后街铁匠铺门口去看打铁。

这学校是教会办的。早晨的第一课，是趴在礼堂里做祷告。许多孩子受不了，就把后院的单砖墙拆了个大洞，祷告一开始，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钻出去；等上课钟响了，再爬进来。我也跟他们一起爬出爬进。日子一长，被训育主任杨胡子发觉，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堵着洞口，每人给了五板。可是，第二天，我们又开了新的洞口。

大考结束后，成绩单送到家里。哥哥们都升了级，我的功课不好，留级一年。

父亲给哥哥们买了些彩色画片作奖励。还当着哥哥们的面对我说：

“你打算留级到胡子白吗？”

哥哥们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在我面前摆来摆去。他们一走过来，我就闭上眼睛。可是心里难过，觉得丢人。

这年冬天，我约束自己，整天在家里复习功

课。虽然还是想念车间，到底没出过家门。

第二年，我升级了，考试分数超过了二哥。二年级大考，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父亲逢人就夸奖我们有出息。

但是，我并没忘记要做一个工人。在工厂外面的渣子堆里，拾来一些碎铁片、洋钉和铁丝，又找到一个罐头盒子。我把树枝切断，卡在罐头盒口上，两头钉上小洋钉，在小树枝中间系一根长绳，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

我跑到一个水池旁，肚子伏在栏杆上，把小桶投进水里，可是它不肯下沉，我猛地向前一扑，想趁势打上水来，谁知两脚腾空，一头栽进池里去了。我刚张口叫喊，一股水灌进了肚子，一喘气，鼻子里又吸进一股水，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急得我在水里乱抓乱滚。幸亏挑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上来，还照头上打了两巴掌，说有冤魂附体。

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一手顶着肚子，一手按头，控出许多黄水。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送我回家。父亲照例又打了我一顿。

夏天，锅炉房后山的贮水池里常有小孩子洗澡，我心里又痒痒起来。想下去，怕再挨淹。一时拿不定主意，楞楞地站在那里。

“下来吧！”小仇两手在水里扒了一下，向我招呼。

“我不会。”

“那怕什么，我教你！”

他两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激起一团团水花。我的劲头被勾起来了，连忙脱了衣服，下到水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练习划水动作。我使劲地打水，一高兴忘记了危险，脚一滑，落进了深水地方。我两手一使劲，划出了水面，刚一冒头，又沉下去了。小仇脸也吓白了，急忙爬上岸，抱一根粗树干，推到池里，我一冒头，抓住了树干，小仇趁势把我拉上岸来。

从这以后，我天天到池子里去，到底学会浮水了。

## 劳动的开端

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了工人运动。党首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教育工人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接着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进一步把工人组织起来。还办了四个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子弟不用花钱，就可以进学校里念书。

一九二五年，我整整十岁，在东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级，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儿童团，担任宣传员。

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出钱盖的一层三层大楼，背后靠山，前面是大广场。礼堂正面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标语，两边还挂着斗大的红彩球。每天下课以后，我们背着洋鼓洋号，到广场上吹打。有时也在俱乐部看戏、听讲演。俱乐部里一天到晚不断人，它是组织矿工斗争的中心。

这年九月，官僚资本家和军阀派兵封闭了工人俱乐部，逮捕了工人领袖黄静源。工人们赶来抢救，反动派用排枪向工人射击，有两个工人当场牺

牲了。黄静源被敌人捆绑着，愤怒地质问反动军官：

“我犯了什么罪？”

反动军官答不上来，只反问一句：

“你还敢打倒帝国主义吗？”

“打倒帝国主义！”

敌人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逼他供出党组织的活动，又问他谁是共产党员。黄静源冷笑着回答：

“闭起眼睛一个没有，睁开眼睛到处都是！你们能杀死我一个，杀不尽全中国人民！”

敌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广场上，把黄静源杀害了。他临死前还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天晚上，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抢出烈士遗体，连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还在他就义的地方埋下一根树桩，作为标记。并且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不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从广东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后，安源煤矿总工会公开出现了，八方井窖口扎起了高大的牌楼，牌楼上写着“也有今天”！矿工们拔掉了早年在广场上埋下的树桩，竖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牌，上面写着：“黄静源烈士就义处”。周围的栏杆上挂满了花圈。安源煤矿工人成立武装纠察队，



参加了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开到安源，疯狂地屠杀人民。安源煤矿变成了一座屠场，每隔三两天，就见敌人绑着一批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草坪上枪杀了。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广场上的黄土和绿草。

最使人不能忘记的，是安源矿工武装领袖杨士杰和株萍铁路工会主任朱少连的被害。朱少连在就义前还给他岳母写信说：

“不要伤心，革命一定要胜利！”

杨士杰被敌人拷打了七昼夜。敌人用烧红的铁钉，钉住他的四肢和胸口，他还忍痛高喊：

“蒋介石你瞧吧！将来一定有人来收拾你！”

革命的疾风暴雨过去了，那血的记忆却永远不能从我幼年的心里抹去。

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萍乡以后，学校停办，我就失学了。接着，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绝境。

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攒下几个工钱，全存在萍矿银行里。同事和朋友们劝他在湖北老家买点田，置几间房屋，给晚年留个落脚的地方。但是父亲不要田地，也不要房屋，只想让孩子们念些书，学些本事，把他们培养成人。

父亲的梦想完全破灭了。

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统治下，煤矿陷入不死不活

的半停顿状态。银行一倒闭，父亲一辈子的血汗钱都白扔了。矿上又趁机滥印“矿票”，市面上谁也不收，工人拿着废纸买不着东西，只好用它当手纸。

我们兄妹七个只会张口等吃，这对父亲是个很沉重的负担。家里生活越过越苦，开头还有点稀的喝，后来连稀的也难喝上口。家具卖完了卖衣服，衣服卖完了卖破烂。要米钱，要油钱的债主们，成天找上门来，坐着不走。

父亲看着一家人挨饿，只是叹气，有时弄到一点吃的，家里人口多，也不够吃。弟弟妹妹围着母亲直嚷。母亲含着眼泪说：

“好孩子，让爸爸吃饱，好出去挣钱。”

父亲把稀菜粥还给了母亲说：

“先给孩子们吃吧。”

父亲捧着头坐在桌子旁边，落下辛酸的眼泪。

母亲低声下气地应付那些催命债主，还要哄孩子们。大哥被送进萍矿医院学医，那里管吃不给钱。二哥急得没法，饿着肚子跑到大街上，挤在人堆里听大鼓书。

这一年，我十二岁，看见家里这样子，心里像油煎一样。我不能眼看一家人挨饿，我要靠劳动解除饥饿的威胁。

萍乡煤矿四面环绕着高山，在矿区东北的深山

丛林里，丰富的煤藏快接近地面。人工开采的小煤窑，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这深山里。

土窑完全靠人工采煤。窑主们随便挑个地方，挖一个斜洞，就算是煤窑，工人出进连腰也伸不直，像狗一样爬进去挖煤，又像狗一样把煤从窑里拖出来。窑顶常常倒塌，压死人。窑主害怕工人不下窑，在洞口摆个泥菩萨，挂上一块写着“确保平安”的木牌，天天烧香上供，迷糊工人。

从山里往外运煤，也同样靠人工，挑脚的把煤一担一担地送到车站。许多穷孩子都去挑脚，卖力挣钱，我也打算挑煤去。

我去找从小在一起玩的小赵商量，想叫他带我去。小赵歪着脑袋，把我左看右看，笑了笑说：

“得了吧！你也挑得动煤？像个瘦猴子，不要让扁担把你压扁了！”

“我的力气大得很，不信，咱俩比比看！”

“比什么！你要去就去吧，明天早点起来。”

“今晚不睡也可以，明天我去找你！”

要挑煤半夜就得动身。家里没有灯笼，我跑到电机房，找了些用过的油棉纱，在机器上擦了点机器油，绑在木头棍子上，准备点着照路。

母亲知道我要去挑煤，心里不忍，可是又不愿意眼看着孩子挨饿，只是不声不响地爬起来，送我到门口外面。我约上小赵，匆匆忙忙走了。

我们爬过几座山，穿过几处树林，赶到了挑煤的地方。哪知来得太早，小煤窑办事的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两扇门关得紧紧的，里面的人都在睡觉，也没有灯光。只有窑口上泥菩萨面前的残香，闪着微弱的火星。

屋檐底下有两张方桌，是窑上开票记账用的，我看天不亮，就睡在桌上。睡得正香，忽然向下一跌，好像掉进一个无底洞，摔得浑身疼。原来桌子被人抽掉，矿上的办事人来开磅称煤了。

我爬起来揉揉胳膊，心想：出门做工真不容易，穷人到哪里都要受欺侮。

我很想多挑一些，试了试，挑不动，又去掉一点。矿上办事人不耐烦地说：

“你要不挑就算了，别找麻烦！”

我赌气挑上就走。

我挑着煤赶路，一开头还跟得上人家，走出一二里就渐渐赶不上了。扁担把肩膀压得生疼，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移到左肩，换来移去，左右都吃不住劲了，只好歇一歇。哪知挑东西走路，越歇越想歇，越歇越觉得担子重。不一会又要爬山。这山连一条路也没有，那些人踮出来的小路，光溜溜，跟滑板一样，一步三滑，肩上的煤筐来回晃荡，像是甩秋千，直到中午才爬上山头，解开衫子一看，肩也肿了，皮也破了。

我鼓起勇气，挑着往前走。一不留神，被石头绊了脚，一个跟头栽倒在半山腰，胳膊和腿擦破好几道伤口，煤炭也撒了一地。眼看太阳落山，挑煤的人早走远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荒山上，离车站还有五六里路，就是挑到地方，收煤站也收秤关门了。怎么办？

红肿的肩头跟滚水烫过一样疼，腿上的伤口不住流血，只好挑着两只空筐子回家。

一进门，我一头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饥饿和疲劳完全征服了我。母亲走过来轻声问道：

“孩子，你怎么啦？”

我只简单地说，煤炭没挑到站，都扔在半山腰了。母亲含着眼泪给我打来洗脚水，我怕她看见碰破的伤口又要难过，不肯下地，向母亲说：

“妈妈，不要紧，我明天还去挑。”

“你吃过饭吗？”

“我不饿。”

第二天一早，喝了一碗野菜粥，又翻过高山去挑炭。扁担一压上红肿的肩头，头上就直冒冷汗，我想应该趁力气还没使尽的时候，多赶几步路，免得磨到天黑又误了事，就咬紧牙，两脚不停，一直把这担炭挑到了车站。

冬天，大雪盖遍了安源山，暴风裹着团团碎雪，裹着煤屑，搅得天昏地暗。饥寒把许多矿工驱

赶进深山野洼，父亲推着沉重的独轮车，儿子拖着绳子在前边拉。雪地上踏出了一条黑色的路。有时不留心，腿陷进雪堆；有时被暴风一卷，连人带车从山腰一直滚到山底。……

我挑着箩筐，从早到晚，夹在人堆里奔走。身上穿一件破棉袄，拦腰拴一根草绳，赤脚穿着草鞋，脚被碎冰块割成一道道血口子。山路又滑，走一步，身子不住乱颤，等赶到地方，煤也快丢光了。像这样累得半死不活，一天也难挑满一担煤。不能白受这份罪，得找别的门道了。

去锅炉房拣煤渣，一担炭可以卖十多个铜元，有的人一通夜能拣五六担。我觉得比挑煤合算，就找了一个旧畚箕去拣炭渣。

天一黑，我把畚箕往背上一挂，趁警察不注意，钻进了锅炉房。那里摆着一排锅炉。好像是一队听候命令的兵士。工人们不时打开炉门，举起钢铲，一铲又一铲地把煤投进那火光熊熊的炉膛里，煤炭立时变得像稀泥一样柔软，不一会就闪起淡兰色的火苗来。工人们不时发出吆喝声，给自己助威。

烧锅炉的工人，要在晚上九点钟以后，才把炭渣从锅炉里掏出来。时间还早，我跑到锅炉背后的烟道旁边，把畚箕放在地上，底朝上当枕头，倒下头就睡。雪花随着北风，从屋檐下钻进来，落在身

上，化成水珠。我紧紧地靠着温暖的烟道，一会就睡着了。

突然沉重的竹鞭抽在身上，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揉揉眼睛，屁股又挨了一脚。原来是查夜的警察来了。

“谁叫你来的？小东西！”他凶声凶气地吼叫着。

我忙去抢畚箕，警察举起鞭子又抽过来，我闪开了，拔腿就跑。警察还不放松，在后面紧追。我跑过横在铁轨上的煤车，弯腰拾起一块煤块，朝他打去。警察挨了一下，翻过煤车又追。我绕着煤堆转了两转，跑出锅炉房。警察气呼呼地打开锅炉门，把我的畚箕丢进火里。

外面雪下得更大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喷水池的水珠一落在破棉袄上，马上结成一块块冰花，冻得我上下牙直打架。我推开屋门，家里人都睡了，母亲还在昏暗的灯光下补衣服。见我空手回来，她吃惊得睁大了眼睛，随又凄然一笑，好像是说：孩子平安回家，这比什么都好。

我在门背后，又拿起一个畚箕，转身就走。母亲追过来，一把拖着我，颤声说：

“别去吧，你的脸都冻青了！”

“不怕，妈妈。你去看妹妹吧！”

我挣脱了手，背上畚箕，向锅炉房飞跑。

工人们正在清炉。通红的炭渣从炉里拉出来，用水一喷，蒸气、炉灰搅成一团雾，呛得张不开口。拾炭的穷孩子们哪管这些，只顾闹着渣子堆，寻找没烧尽的炭渣。

我拾满了畚箕，背着警察，把炭运到外面堆起来。就这样，来回拣到天明，再把炭挑上大街去卖。

……日子长了，手指上烧的泡结成了又厚又硬的茧子；赤脚走在煤渣堆里，也不怕疼了。患难把穷苦的小伙伴们结成一体，大家轮流放哨，监视警察。远远看见警察的影子，放哨的喊声“来了”，都跑出去躲起来。警察一走，打一声口哨，又回来照样拣炭渣。

穷人和穷人总是心连心。那些烧锅炉的工人们，不等煤炭烧透，就拉出来用水浇灭，好让我们快点拣走。我又邀二哥来当帮手。就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家半饱的生活。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冰雪融解，大地发青，满山的白茶花，发出醉人的清香。但是，春天并没给矿山带来繁荣。那些官僚资本家们趁火打劫，盗卖资材，假报工名，还印发“鬼票”，坑害工人。他们就靠这些不义之财，养得又肥又胖，工人越倒霉，他们越享福。工人们都说他们是吃冤枉的。许多机器拆走了，许多机器生了锈。工人们拿不到工钱，还要日夜做工，因为大水淹塌相依为命的矿



井。

矿工们更没有忘记那血海深仇。早晨，太阳一出来，煤窑口的石壁上，就出现了斗大的白字：“打倒国民党！”煤车出窑，每个车皮上都有石灰水写的大字：“打倒蒋介石！”不屈的人们坚持着斗争，革命的心不死，革命的火永远不灭！

从春到夏，父亲失业在家，成天发愁。我仍旧背着畚箕，到锅炉房拣炭渣。秋天，新谷上市，听说后山乱薯便宜，卖完炭，我又挑着箩筐，到后山买红薯。我们家吃不起白米，红薯就是上等饭食。

我的肩膀磨得结实了，挑三五十斤也不觉得吃力。这天黄昏，我刚爬上后山，就见一群人迎面走来，有的背着雨伞，有的背着小包裹。我只认得一个是修理厂的工人，他还送过我一把小锤子。我把筐子放在路边，拦住他问道：

“叔叔，你们到哪里去呀？”

“上井冈山！找我们的救星去！”他指着东南边。

“找红军吗？”我丢下扁担，“我也去！”

他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

“不行，老弟！你还太小。赶快长大，做个有用的人，等我们胜利回来，咱俩一起开机器！”

我含泪站在那里，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山头那边，直到月亮爬上东山。

## 在矿井里

矿山再没有什么指望了，父亲只好拖儿带女，逃回湖北老家去谋生。一家人逃到湖南的洞庭湖旁，钱花光了，没钱买火车票，父亲急得在湖岸上来回转圈，望着茫无边际的湖水发愁。

湖旁停了一只小拖轮，是从武汉来湖南运木排的。父亲恳求他们顺便带我们一家回湖北。船上的工人们一口答应下来，给我们找了一块小地方，一家人躺在锅炉顶上，逃到了武汉。

父亲从小就流落外乡，亲戚朋友们见父亲穷着回来，谁也不敢沾边，饥寒仍旧无情地威胁着我们。父亲又带着一家人，逃到湖北省大冶县。

大冶的石灰窑（地名）面临长江，左右和背后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铁、煤、石灰石和其他矿产，官僚资本汉冶萍公司设有大冶铁厂，还有四个煤矿，一个水泥厂。

江岸上耸立着鼓风机，高大的烟囱插遍了山脚，黑烟结成乌云，笼罩着矿区。火车匆忙地顺着江岸奔跑，把褐色铁矿石从山里运到铁厂。煤矿的空中索道，越过了丛山峻岭，钢索上的煤斗，满载

着煤炭，穿过那一架一架竖立在山顶和山腰的钢塔，一直把煤从深山里运到停在江边的大轮船上。

父亲的老同事们，很早以前就从萍乡煤矿回到湖北，在这里的富源煤矿做事。有一个姓高的同事在煤矿当采煤工程师，由他介绍，我们弟兄几个先后进煤矿当了学徒。

第一天清早，我怀着愉快的心情，走进了工厂。心想从今以后，我就可以成天和机器作伴，学会管理机器、制造机器。特别使我高兴的是，童年的梦想将要实现：人们将要叫我“工人”。

机电工程师把二哥分派到机器修理间，把我分派到电机间。工头带我到陈师傅面前认了老师，又把师兄叫来，要他交代工作。师兄顺口说道：

“早晨上班以前要烧开水，泡茶，扫地，打洗手水……”

“记住啦？以后就看你的了！”工头说完转身就走了。

这年春季，井底发大水，直井里的水泵日夜不息地把水从深井里抽出井外，黄黑色的井水，通过许多水管，在井外汇合，流成了一条小河。谁知最大一部水泵的电动机突然发生了故障，井水灌满了井底蓄水池，接着淹没了井下铁道。

老师傅们忙着换下井的衣服，收拾工具和材料。师兄对我唠唠嘴：

“准备吧！”

头一天就下煤井，真是好运气。我忙把沉重的装工具的小铁桶，往肩上一挂，随着师傅们踏上了升降机，降落到煤井里。

这里离地面有几十丈深，太阳光射不到井底，四周一片漆黑，污浊的空气夹杂着细小的煤灰，钻进鼻孔里，使人感到窒息。煤窖里四面八方到处冒水，汇成一支汹涌的水流，冲进蓄水池。煤道的拱架受了潮湿空气的侵蚀，木柱上长出一种白色霉菌。

在暗淡的电灯光下，那忙碌的运煤矿工们，把一车又一车煤炭从窖里的远处推进了升降机。泵浦房是砖砌的一个大拱道，里面排满了各种抽水机，有电动的，有蒸气的。粗大的水管伸入蓄水池，拼命地吸着水，尽管它们日夜不停喝着水，可是池水老是满满地，好像是永远也喝不干的大海。

蒸气水泵喷出粘腻腻的热雾，笼罩了泵浦房，蒸得人浑身滴汗。起重机把巨大的电动机移开，大家脱光衣服，站在水里抢修。我蹲在旁边，拿着手电灯替师傅照亮。

突然，我浑身剧烈地抖动起来。原来手电灯的电线皮磨破了，漏电抓住了我。陈师傅急忙冲向配电盘，扯开了电门，我的两脚一滑，从水泵底座倒栽下来，摔在铁轨上。

大家把我抬起来，放到木板上，脱去湿衣服，半晌才缓过气。我忍着疼痛，直忙到半夜，修好了水泵，才随师傅们出窑回家。母亲含着眼泪，为我洗净背上的血迹。

第二天，曙光还没有透过窗棂，又悄悄起来，摸着黑穿好衣服，要在汽笛没响以前赶到车间。我怕惊醒家里人，踮着脚尖拉开门闩，又返身把门掩好。只听父亲在黑暗角落里长叹了一口气。……

车间里还没有人影，我提着茶壶去厨房里烧水冲茶。身上一阵困倦，坐在炉旁，就蒙蒙眈眈睡着了。

汽笛响了。等我惊醒过来，火上的铁壶没有了。仔细一看，壶水烧干，铁壶烧脱了焊，只剩下几块通红的铁片，躺在炭火上。

我急忙又找来一把铁壶，守在炉旁，烧开了水，冲好了茶，又急忙提着沉重的磁壶，匆匆下坡。因为昨天受伤熬夜，浑身骨头又痠又疼，一不小心，踩着了一块石头，两脚一滑，一个倒栽葱跌在地下，大磁壶摔成几块，开水四下飞溅，手背烫起了许多小泡。心想祸是闯下了。

“什么时候了，还不给我沏茶？”工头堵在门口嚷道。

我伸出烫伤的手给他看。

“烫死你活该，我管得着吗！给我拿茶来！”

工头只管瞪眼。

我再也忍不住了，就气冲冲地回答说：

“茶壶我摔了，你瞧着办吧！”

“好小子，你还敢造反哪！”

工头一撸袖子，就想打人。陈师傅走来拦开了我们，把我拖到发电厂的窗外，嘱咐道：

“吃点亏算了，跟他闹气没有好处呀！”

果然，以后工头就挖空心思跟我为难。那些受苦的粗活，总少不了我。有一次，工头硬要我清洗煤气过滤器，我刚钻进去，就被煤气熏倒。等人发觉，把我拖出来，我嘴角直冒白沫，只有一丝气息了。

学徒生活既无白天，也无黑夜，什么时候喊你，什么时候得在眼前。挨打受骂，钻锅炉，爬煤窑，拼死拼活干到月底，落得三块工钱，再给工棚管伙食的扣去伙食费，连剃头都没钱啦。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受穷受苦的道理，觉得世界不公平，是因为坏人太多，铲除了坏人，就不会受气。或许学会本事，多挣点钱，生活会好一些。因此，就一心一意钻技术。对机器和电气方面不明白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只是没有地方能找到答案。

不下窑，我就在车间学做电气钳工，老虎钳太高，我找两块砖垫上脚，站在那里学打锤，学锉，学焊。陈师傅把钳工技术一样一样教我，我照样地

做。可是电是什么呢！煤气发动机为什么自己会转呢？发电机为什么会发电呢？……这些童年时早就怀疑的问题，现在更使我不能安心了。我不能满足于这些打锤、锉锉的操作，我要弄清这些“为什么”。可是去请教谁呢？师傅也是一辈子受穷受苦，没有迈过学校门坎，虽然有一手精巧出众的手艺，却不能作原理上的说明。他凭的是经验。如果你问他电是什么，他会惊奇地望着你：

“你疯了吧？电就是电呀！”

去问问工头吧，他嘴上常挂着“将钱学艺”，没有钱别想惊动他。我除了几根瘦骨，哪有钱送礼？再说那些师兄们的父母，逢年过节，为了送礼，往往押当、借债。可是师兄们还不是也一样不知道电是什么吗？他们比我好的，只不过是少受点气，少钻煤窑吃苦罢了。

想来想去，只有请教书本了。我把希望寄托在书上，相信书本能解答各种疑难，告诉我从师傅那里学不到的东西。

我搬来一架梯子，爬上车间的阁楼里，把里面打扫干净，用旧报纸糊好顶棚，装了电灯，搭了个木板床，找了个装机器的破箱子，底朝天当桌子。一下班，我就钻进阁楼读书。我买了一套工业小丛书，书里讲的有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有发电机和电动机，有内燃机。还买了几本浅近的物理书。我

如饥似渴地读着想，恨不得把书吃到肚里去。

夏天，屋顶的瓦晒得滚烫，伸不直腰的阁楼里热得像蒸笼。冬天，猛烈的北风由瓦缝吹进阁楼，冷得像冰窖。可是我被书本紧紧吸住了，常常忘记回家吃饭。书给了我热力，给了我快乐，也改变了我的生活。以前干活，师傅怎样教，我就怎样做。动起手来，总不免有些顾虑。活做完了，自己心里也没底。现在，做的和读到的道理一碰头，我就渐渐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干起活来，信心也大了。

那些出身贫寒的师兄弟们，多半不识字，学习技术更困难。我也常常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告诉他们。我们利用晚间的工夫，在车间里开了技术讲座，我把书上的东西讲给他们听。师兄弟们不再赌钱和胡逛了。

有一天，锅炉房散热用的电风扇出了故障，电动机的线圈烧毁了。矿上从没有人能换电动机的线圈，以前都是送到汉口去修理。工头为了露一鼻子，要亲自动手。他傲慢地说：“这回看我的！”

电动机抬进了工头的办公室，只有工头的小舅子被叫进去，还紧紧地关上了门窗。

半个月以后，电动机修好了。工头叫抬出来，接上电线试验。

开关一开，电动机发出一声牛吼，射出火花。



工头眉毛眼睛都活动起来，正想吹嘘几句，忽然那电动机颤抖一阵，不动了。工头眉头一皱，冲师兄们骂道：

“看什么！快给我干活去！”

晚上，我独自一个留在车间里。一股好奇心，使我想了解一下电动机的秘密。我拆开了电动机，拿着书本，一行行对照查看，发觉是线圈不够长，而且绝缘不良，引起短路，工头做的和书上说的不一样。心想，要是我也来做一次，那该多好。但是，工头修不了，更不让别人修。那部电动机，到底还是运到汉口去了。

当学徒的照规矩应该“吃三年萝卜干饭”才能出师，我只吃了一年半，在十七岁那年出了师，正式成为一个机电工人。机电工程师还分给我带两个学徒，吴昆和小阮。同事们一见我们就笑着说：“小师傅带小徒弟。”

矿工在阴森森的煤井里，一天要干十二个钟头的活，早晚跟太阳不照面。换班的汽笛响了，窑外的矿工们背上鹤嘴锄，提起电石灯，脸色阴沉地走进窑口。升降机把他们送到黑洞洞的煤窑里，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能不能活着出来。那些刚出窑的矿工，就像是刚从黑色染缸里爬出来一样，只剩下眼珠旁边一星白点。他们庆贺自己又活了一天，高声吆喝着奔往洗澡池。人人都说：进窑就是鬼，出来

才算人。

煤窑里，老鼠成群结队。送饭的工人一进窑，老鼠从顶棚里跑下来，围着饭桶转。矿工蹲在地上吃饭，老鼠也跑来要吃，好像是和工人聚餐，一点也不怕。矿工们要是一天不见老鼠，反倒不安起来了。预料着矿井底下将要发生火灾，或是大水要冲倒煤窑。大家都说老鼠能掐会算，老鼠算到有灾难，早就逃走了。不信，你看每次灾难过后，总找不到死老鼠。

在涨水的季节里，每天，工人一进窑，母亲和妻子就在家烧香求神，祈祷亲人的平安。算命瞎子敲着小铜锣，成天在工人住处转圈，为矿工判断祸福。这灾难的季节，是在亲人的祈祷和眼泪中，是在深沉的痛苦和耽心中，一刻一刻挨过的。

尽管矿工们敬重老鼠，尊称它为“高老爷”，尽管家里烧香敬神，算命卦卜，可是灾难还是不断发生。有时候大火燃烧，有时候地底下的大水淹了矿井，有时候顶板塌了下来，……常见一车一车成十上百的矿工尸体，丢在煤桶上，随着煤炭从窑里运出。荒坡上的新坟，一年多似一年，每逢阴天晚上，荒坡上就闪烁着点点的磷火。老年人传说着：那是矿工不屈的眼睛。……

我在矿上，眼见许许多多伙伴残废了，流落在街头要饭，晚上躲在市场里卖肉案子的旁边，和狗

挤在一起过夜。眼见许许多多人的妻子成了寡妇，  
沦落为娼妓。有些人灰心丧气，喝酒赌钱混日子。

我出师以后，每天只拿三角工钱。父亲一直找不到事情做，我们弟兄几个做工，勉强只够自己吃，养不起家，母亲和妹妹替人家洗点衣裳，收入也有限。家里的生活照样苦。父亲经不起生活的熬煎，慢慢变得疯疯癫癫，后来得了瘫痪病，成天躺在床上。到大治第二年，没有过完冬天就死了。

矿工们最害怕春天。一到春天，事故就一天比一天多。这年大水冲倒了煤井，灌满了第三层直井；淹了井底所有的采煤横井。矿主为了继续采煤，在竖井中，用升降机吊着电动水泵抽水。

水泵安在井口，抽完一段，用升降机吊起来，着人下去垫好枕木，再往下移。就这样白天黑夜地抽水，凶猛的水流还是直往上翻。

这直井不是砖砌的，只用洋松木搭起架子，四围安上木板，一层叠一层，一直从井底叠到井口。这天又要移动水泵了，苦差事照例派到我头上。我和机器修理间的工人们攀着木架往下溜，安好枕木，移下了水泵。最后，还得安一盏电灯，我背着工具袋，提着电石灯，爬上爬下。我抱住一根木柱，想把线接上，不料这粗大的木柱被水泡烂了，两手一使劲，木柱就倒了下来。我随着木柱左碰右撞，直往井底落。电石灯掉在井下摔碎了，煤井里

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眼看要粉身碎骨，忽然被下井的梯架挡住，一头撞到搁梯子的木板上。虽然摔昏了，却没有掉进井底。

在井口等我的伙伴们，听见这可怕的响声，都趴在井口往下看，喊了半天也没回声。他们找来了畚箕和吃饭的筷子，一齐顺着木梯爬下来，打算用筷子来拾我的碎骨头。

下完第五架梯子，才发现我一只手挽着梯脚，昏倒在木板上。他们马上用绳子捆住我的腰，把我抬到升降机吊篮顶板上，司机慢慢开动吊篮，把我送出了井口。

工头走过来，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道：

“回家给老祖宗烧香磕头吧！没死就算便宜。”

第二年春天，煤窑又被大水冲倒，一时无法恢复。老板决定和后山的富华煤矿合并，改名源华煤矿。并且趁机会大批裁人。在翻砂厂学铸工的弟弟被裁掉了，失业在家。我带的学徒吴昆也被裁掉了，没法生活，逃到萍乡煤矿去了。我能吃苦干活，工资又少，虽然勉强留下，也养不了家，母亲只得随着妹妹逃到萍乡煤矿去。工头怀着鬼心眼，死和我作对，借口两矿人员调整，把我调到后山富华煤矿电机修理厂去。

富华煤矿在高山那边。头顶满天星，我就起来上工。想起生活这么艰难，又气愤，又着急。谁知

道那边还有什么鬼把戏！

春天的寒风，带着一股水腥气，轻手轻脚地溜过江面，远处传来煤车急驶的轰隆声。我刚刚跨进车间门口，胡工头就迎过来说：

“吴师傅，你来的正好，电动机昨天烧毁了，你去给修理吧！”

我心里一愣，明知是有意为难，也只得硬着头皮答道：

“修就修吧！”

我拆开电动机一看，线圈全烧毁了，要装新的。我把线圈的连接法和一切数字记在小本子上，领了材料，就开始工作。

花了一个星期时间，电动机总算修好了。我用仪器仔细地检查了每个新装上的线圈，同事们帮忙装好电动机，接好了电线。只见胡工头神气活现地走到电屏前，右手握着开关的手柄，望着我问道：

“吴师傅，开吗？”

我第一次做这活，根本没把握。蹲在电动机旁，心里七上八下，大家一齐望着我，等我回答。我狠了狠心说：

“开吧！”

胡工头推上了开关，电动机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迅速地转动了。胡工头瞟了我一眼说：

“你的运气不坏！”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下了，伙伴们也长出一口气，替我庆幸。头一关总算过来了。

没过几天，刚响过下班的汽笛，同事们忙着收拾工具，回家吃晚饭。煤窑里的升降机忽然发生了故障，煤车拥挤在窑里，无法运到外面来。胡工头又跑来对我说：

“吴师傅先别走，麻烦你下去一趟吧。”

我清理了工具，走进煤窑。司机黄师傅慌慌张张对我讲了升降机的毛病。我急忙开始修理，井口下煤车越挤越多，站井口的工人拼命拉动钢丝，撞得井口上的钟乱响，催促司机赶紧开车。

运转器修好了。黄司机走上司机台，握着运转器的手柄，开动升降机。还知怎么搞的，他把手柄推错了方向，机器立刻发出像牛叫的怪声，电动机的电刷环上喷出了火花，升降机的吊篮顶住了大滑车。黄司机吓得没了主意，呆呆地握住手柄不动，眼看升降机就要毁了。我正蹲在机器旁边收拾工具，准备出窑，一看不好，连忙跳到配电盘前，拉掉总开关，切断了电流。

检查了机器，幸好没出毛病。这样一来，救了黄司机，也保住了升降机。黄司机呆了老半天，才说出话来。他连连向我道谢。我满心欢喜地走出了煤窑。

第二天早晨，我刚走到车间门口，胡工头堵着

门说：

“吴师傅，明天你不用来了。”

“为什么？”

“上头的命令，矿师说你昨天把升降机弄坏了。”

我为人处事，一向都是小巷子里抬竹竿，直来直去，但是，越是这样，饭碗就越颤得厉害。严酷的事实一件件告诉我，这些爪牙结了帮，个个心毒手辣，最会赶尽杀绝。“凭本事吃饭”，只不过是可怜的幻想罢了。

就这样不声不响被开除，太便宜他了。拼上这条命，也得出口冤气。我找到黄司机，把我被开除的事告诉了他。黄司机也气愤地说：

“亏你救了我，怎么要罚你？那是我的错，要罚就罚我。我去替你证明！”

我们一起到了办公室。矿师跷起脚，左手撑在桌上，背着我们抽雪茄，半天才转过身来，眼一眯问道：

“你们来干什么？”

黄司机把昨天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并且承认是自己的错。那矿师不等他说完，就瞪眼骂道：

“放屁！人家都说是吴运铎弄坏的，你怎么知道不是他的错！”

我头上冒火，勉强压住怒气问道：

“你到底讲理不讲理？……”

这鸦片鬼立刻大发脾气，拍着桌子喊道：

“来人！拿棍子来！”

我看他真要打人，心想：这正对劲，我就和你拼了。顶多坐上几年牢，死了还是这几根硬骨头。我卷起袖管，向前走了一步：

“来吧！只要你敢动手，看我把你打扁！”

听差的拿来棍子，一进门看见这阵势，回头就走了。矿师知道讨不了什么便宜，威风先杀了一半，只好自己找梯子下台：

“人家都说是你把升降机弄坏的，一清早胡工头就来报告了。”

“工头没有下窑，他怎么会看见？”

“等会我再调查，你们去吧！”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工。



## 觉 悟

清晨，阳光照到鸡头山顶，江水沸腾了。就像是才出炉的钢水，闪着金光。鸡头山伸长脖子，插到江心，只给江水留下一条狭窄的通路。浩荡的江水奔到鸡头山下，碰到岩壁下，卷起巨大的漩涡，然后带着一股冲力挤过闸门，愉快地叫嚷着奔往东方。

生活也正如那险恶的漩涡。人一陷进去，就跟着旋转，挣扎，呼喊，……我在生活的激流中，左冲右撞，冒着风险，步步搏斗，景况一点不见好转。在我跟矿师闹翻以后，又被调回到原来的富源煤矿，照样受欺压。我开始怀疑起来：拚来拚去，最后吃亏的还是我，得胜的总是那些坏蛋，这是什么道理？哪里才有出路呢？

正好抗日战争爆发，把我带进热血沸腾的生活里。

矿上的小学举办了抗战讲座，讲师就是小学的干仲儒校长。一到晚上，工人成群结队去听讲。我家也成了爱国工人们的集会场所。不久，我们租了两间房子，贴上标语，搬来桌椅，组织了工人时事

座谈会。我们又在矿区的要道口，竖起木板，每天下班，把报上的消息抄写在大张的纸上贴出去。

从武汉来的救亡青年，一到大冶，就来找我们，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解答问题。就像一阵春风吹来，长期冻结的冰河奔流起来了，工人们唱出了内心的声音：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们组织时事座谈会的消息一传出去，山后利华煤矿的工人也动起来了，还特地派人来要求我们帮助。

我时常乘上煤车，沿着空中索道，越过丛山，到工棚去开会研究工作。在这火热的日子里，工人之间变得更亲密了。我感觉到个人的力量不是增加了一两倍，而是千万倍。

一天黄昏，我沿着灰尘滚滚的公路回家，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干校长，他老远就向我喊道：

“老吴，快来！我们正找你！”

干校长一手拉着一个穿工人服的人。那人向我点头微笑，不等我问话，他就自我介绍说：

“我叫张明，是来这里向你们学习的。”

我楞了一下。干校长接着说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才从武汉来的，

准备在矿区建立发行站。

从这以后，张明明天天来找我。他从国民党监狱里刚出来不久。偶然掀起衣裳，身上就露出一块一块的疤痕。他受过电刑，坐过老虎凳，他不屈服，坚持过来了。最初我还替他担心，他是这样瘦弱，看来一阵风就会把他刮倒，但是他常常东奔西跑，成天不落脚，参加座谈会，找人谈话，直到深夜，好像永不知累，有一天，我问张明，他这劲头哪里来的？他笑着说：

“这是大家的事，干起来才有劲。就是累，心里也快活！”

张明还说：一个人眼光远大，目标明确，生活才有意义。从他那里，我开始懂得了革命道理，了解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我们受穷受苦受压迫，难道是因为懒惰吗？不！我热爱劳动，而且花了心血，我们工人是不靠欺诈生活的。我总希望把活干得更好些，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感到真正的快乐。难道说我们愚蠢吗？不！我们凭耳朵就能听出机器有什么毛病，甚至用鼻子也闻得出发电机内部发生了什么障碍。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费了许多心血，还被踩在脚下？原来不是别的，只因为社会上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真正的劳动者受轻视，

受压迫，苦不堪言；而那些吸别人血汗过活的人，脚不动，手不拾，天天养尊处优。这真是太不合理了。为了最后消灭这人类最大的不平，许多先驱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被绑赴刑场的时候，他们被活活钉在门板上的时候，都不曾对革命事业发生丝毫动摇，他们为伟大的理想牺牲了个人的一切。活在世界上，就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

张明还说：中国工人阶级受的痛苦非常深重。本国的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以外，还要加上外国的剥削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苦难重重，要想得到解放，凭个人力量是不行的，只有更多的人都觉悟了，行动起来，才能达到目的。团结斗争就是胜利的保证。在今天，应该首先集中力量来反对当前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然后才能建设理想的幸福的社会。

我明白了这些道理，就希望我的伙伴们也能赶快明白这些道理。《新华日报》是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的，我觉得应该让它广泛地送到工人们手里去。我们在矿上成立了《新华日报》推销站，专门请了一个小孩送报。每天下午四点钟，由汉口来的轮船一靠码头，小孩就上船去取报纸，按时送给订户。张明见工人们生活困难，不收报费，但是工人爱护自己的报纸，省吃省喝也要交报费。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虽然允许《新华日

报》公开发行，暗中却想尽一切方法来限制，有时借故没收报纸，有时在轮船码头上，毒打报童，抢走报纸。我们就组织起来“护报”，使报纸能继续发行。最后矿上强迫摊派国民党反动派出版的反动报纸，硬在工资内扣除报费，但是始终得不到工人读者。

不久，张明走了。他撒播下的种子，在矿工中间生长了。这时候，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的消息越来越多，而八路军却开向最前线，工人们把一切希望都放在遥远的北方，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把北方和我们联结起来。我细心地阅读着八路军的每一个战报，每一个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报上说，朱总司令号召全国人民募捐为八路军战士制备防毒面具，我像接到了动员令一样，半夜里跑到小学校去借来一架油印机，自己刻蜡板、印收条，天一亮，就去找工人们募捐，凑了四十多块钱，当天由邮局寄给了《新华日报》。我们觉得，寄去的不只是钱，还有我们的心，用我们工人的心保卫我们自己的战士。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工人群众觉醒，他们极力打击工人时事座谈会。

大冶本来也有个御用工会，不过这个“工会”并不在矿区，却在离大冶十多里的黄石港。成年累月跟工人不照面，成了“走狗不走”。现在工人起来

了，矿上才觉得走狗远了使唤不方便，就连忙盖起新房子，门口挂上新招牌，把走狗叫来，要他们就近来欺压工人。

御用工会的头子，是我小学同学，他一到大冶，就跑到我家来，一见面开口就说：现在“工会”已经成立，应该把时事座谈会取消。接着把说头一转：

“老弟，放着清福你不享，当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

我勉强压制内心的愤怒，冷冷地问他：

“说完了吗？”

“我劝你是为你好，你看共产党有几个落得好结果！……”

在我脑海里，立刻浮起一副刽子手的凶相来。我捏紧拳头对准他的鼻子喊道：

“你再不滚蛋，它就认不得你了！”

他冷笑两声，转身走了。

我把这事告诉了工人伙伴们，大家很气愤。都说：

“他有胆子，就叫他碰碰看！我们还干我们的。”

我们团结得更紧了。每天晚上照例在大树底下读报开会。工头和御用工会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接连几天加班开夜工，把工人关在车间里，不让出

去，并且恐吓青年工人们说：

“你们不怕掉脑袋吗？吴运铎是个提着头玩的人，你们跟着他哄什么！”

接着，矿山上又传起各种谣言，说我组织什么暗杀团。工人们都知道这谣言的来源，它丝毫不能动摇大家追求真理的意志，老年工人们常跑来安慰我：

“运铎，别泄气，那些坏蛋不是打击你一个人，是打击我们大家啊！只要干的对，我们什么也不怕！”

的确也没什么可怕。哪怕变成土，只要是铺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让伙伴们大踏步走过去，那也值得！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战线逼近了武汉。矿上的经理们瞒着矿工，黑夜里一批一批地把大皮箱搬到码头上，连哈巴狗也跟着太太小姐们上了船。原来这些家伙打算先送走家眷，回头炸毁煤窑，撒腿逃跑，就不管矿工的死活了。

消息一传出来，谁也没心思干活。早晨，我走进机电车间，伙伴们就围在一块儿商量，要矿上发给安家费。不多工夫，全矿的机电工人都集合了，大家又拥到锻造间。没来的就只有那些工头和反动工会指定的组长们。我跳到铁砧上，高声喊道：

“同事们！是咱们拿出力量的时候了！他们是

人，咱们也是人。要退都退，要留都留。再说，咱们生在矿山，长在矿山，几辈子都在这里扎了根，连逃的地方也没有！我们只有一条路，敌人来了，就跟它拚！经理是中国人，就该爱国，不能叫他们逃跑！”

“对呀！”

“找经理去！”

大家鼓掌，呼喊，涌出了车间。

站在门口的机电工程师一把拦住我，把我拖到公事房，悄悄说：

“运铎，你怎么这么傻！叫别人去闹，还不照样有你的份！经理说只要你不闹，他给你双份也行。……”

我气愤极了，这不是叫我出卖同事吗？大家已经行动起来，我也顾不得和他计较，不等他说完，我就狠狠带上门，转身跑开了。

我们马上召集青年工人看守发电机，防止坏人破坏，并且派人值班，保证继续发电。因为发电厂一停工，煤窑就会淹掉。在敌人没有占领矿山以前，我们是不忍心让煤窑毁掉的。

傍晚，矿工们一出煤窑，就跟机电工人的队伍汇合了。矿工们跑到锅炉房，打开汽笛的汽阀，举起鹤嘴锄敲断汽阀的把手，汽笛冲破夜间的黑暗，发出嘹亮的叫声。这是我们总动员的信号。因为汽



阀的把手敲断了，在锅炉的蒸汽没放完以前，谁也无法让它停止吼叫。矿工们得意地笑着，很满意自己的发明。

那汽笛鼓足了我们的力量，刚下窑换班的矿工也扛着鹤嘴锄出来了，他们自动在窑口上岗，看见谁要下窑，就喊：

“要活命的都去找经理！”

工人队伍奔到经理大楼前面的广场上，奔到矿警局门前的堆煤场上，要经理答复工人的要求。到处响着一个口号：

“反对逃跑，武装抗日！”

天黑了，大楼里灯火辉煌，经理们正在清理公文印信。工人队伍一到广场，他们连忙灭了灯，紧紧关上大门。还派出狗腿子，来分化收买工人。大家看穿了鬼花样，当场把狗腿子赶跑了。坚持到半夜，经理们不敢露面，工人们也一直不散。我们没想到，就在那黑洞洞的大楼里，官僚资本家们正在策划着对工人下毒手。

突然，黑夜里响起了枪声，子弹呼啸着，穿过广场的上空。一个连的反动军警，像群疯狗，直冲过来。工人倒下一大片，队伍散了，到处是呼喊声、叫骂声。连星星也直哆嗦，好像要掉下来。

二十多个工人牺牲了。广场上洒满了殷红的血。血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国民党反动派极端仇视

人民，有枪不打日本鬼子，却来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人民。但是反动派没有杀退我们，我们掩埋了伙伴的尸体，继续斗争。

第二天，热血沸腾的工人们紧紧包围了经理大楼，包围了反动工会，要求严惩凶手，要求抗日自由。工人们团结得更紧了。经理们被迫答应谈判。我和几个伙伴被推为工人代表，去办交涉。

“你们谁是头？”一个经理不怀好意地问。

“我们都是头，有话你就说吧！”

“忙什么，请坐请坐！……”

“我们能等，恐怕大家等不得！你没看见外面吗？”

“啊啊……”

正义在我们这边，经理们到底屈服了。惨案发生以后，《新华日报》发表言论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武汉的一些工厂也行动起来，支持我们的斗争。在广大爱国人民的压力下，他们答应发给全矿工人三个月的工资，作为安家费，死者由矿上埋葬，另外发给抚恤费；伤者由矿上医治。警察局长也受了撤职处分。

这个事件戳破了国民党抗战的假面目。也教育了工人，谁是真正跟他们站在一起的。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煤矿，许多矿工拿起武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鄂东抗日游击队。罢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

放出风声，要追查“肇事人”。正好我受压迫也受够了，决心离开矿山，投奔新四军。

黄昏，我奔往码头，搭上开往汉口的轮船。我迎风站在甲板上，长久地看着矿山——养育过我，磨炼过我的地方，在那里，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想起也许要永远跟它分别，心里不免又浮起眷恋的感情。

鸡头山远了，前面是新的斗争！

## 我们的工厂

我路过武汉到萍乡去，准备参加新四军。

这是一九三八年九月，日本鬼子已占领鄂北一带，汉口成了一座死城，街头店铺都关了门，饿狗窜来窜去找寻食物，倒在路旁的重伤兵呻吟着，呼唤“救命”。周围不时传来爆炸声，入夜，大火冲天，遮没了一天星斗。

我穿过瓦砾堆积的街道，走到长江通洞庭湖的港汊，搭上一条难民船。仓里有十几个人，都是老弱妇孺。船刚开动，敌机就追来低飞扫射，木船只好隐蔽在岸边柳树底下，直到黄昏，才得开动。

第二天下午，船到洞庭湖口，下雨了，天上地下，迷迷茫茫。我冒着雨赶到岳州，搭上南下的难民车。车是敞篷，大人孩子在泥水里泡着，冻得直抖。我把大衣顶在头上，不一会就湿透了，浑身是水。车刚出站，敌机又追来了，机车呼吃呼吃喘着气，拖着漫长的列车，疯狂地向前奔驰。

晚上，车到长沙。遍地是残砖乱瓦，烧得焦黑的墙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铁轨炸得像一团乱麻，有几节车厢都烧光了，只剩下一副骨架，歪歪扭扭

地倒在一边，车轮旁边还有一个烧焦的婴孩尸体。

……

我在废墟里站了好久，心里非常沉重。忽然汽笛响了，开往江西的火车蠕蠕爬动，我踏着枕木碎石，向前追赶，把行李卷先抛到车上，抓住车厢门口的小梯子跳了上去。车上又是难民！到处都是难民，到处都是惶惑的眼睛。听着病人的呻吟，听着孩子的啼哭，听到母亲的叹息，我的心几乎要炸开。祖国在苦难中，人民在苦难中。再不拿起武器，真白活了！

在车轮的单调而迟钝的轰隆声中，不知道过了多少站，我总嫌车子开得太慢。……终于，到了度过我童年时代的萍乡。我摸摸口袋，只有几个铜元，才想起自己两天没有吃饭。

矿山也是满目凄凉。歪斜的门框结上了蛛网，黄鼠狼在倒塌的房舍里安下了家，窑前长满一蓬蓬枯黄的蒿草。煤井早已停工。国民党只知道逃跑，哪管人民的死活！

我见到了久别的母亲，见到了妹妹。离别一年多，母亲显得更苍老。她听说我要去前方，难过得哭起来。

“你们弟兄几个的翅膀都硬了，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吧！”她一边抹着眼泪埋怨，一边帮助收拾行李。

当晚，早先跟我一起做工的吴昆，带着两个人跑来了。

“我不干了，咱们一块走！”吴昆说着，就从口袋里把钱掏出来。“你看，帐都算了，正好做路费。”

我们四个人，扛着简单的行李卷，离开了萍乡，坐上火车，一直往东。这一带离战线还很远，敌机偶而来盘旋一阵。车行两天两夜，才到南昌。

我们找到新四军办事处。同志们听说我们是煤矿工人，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忙着给我们打水洗脸，倒茶端饭。当天，我们穿上了军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漂亮的衣裳了——这是革命战士的衣裳呀！

不久，我们到皖南云岭。

这是一个小山城，新四军军司令部就驻在这里。深夜里，可以听见低沉的炮声。一种迫近战斗的喜悦，一种对火热生活的渴望，弄得我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早晨起来，不是收拾鞋子，就是摆弄袜子，把那简单的行李卷，捆了又捆，包了又包，只等通知，就出发到前线去。那时候，我们住在招待所，每天茶来张口，饭来伸手，还发香烟抽。大家等得有点儿着急了，他们三人推我去找司令部的同志请求分配任务。

“好同志，赶快发枪吧！”

“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哩。你们去造枪不更好吗？”

那个同志搬过来一张椅子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现在新四军的武器很不够，又不好，有的同志还在用鸟枪、土铳打仗。他说：

“你们都是机器工人，一定能学会造枪的。你们多造些枪，对革命不是更有好处吗？”

一个工人懂得一枚螺丝钉有多大意义，他们是从生活中懂得的。螺丝钉虽然小，可是少了它，机器就不能正常地运转。既然工作十分需要，就不能凭个人的感情用事，造枪拿枪一样是为革命，用不着讨价还价了。我说：

“好！快些分配吧。”

第二天，我们四个人被派到了军司令部修械所。

修械所在黄山东北一百多里的一个小山村里。这里有一百多户人家，居民靠砍柴、烧炭、采茶为生，也种一点儿山田。周围都是高山大岭。岭上岭下两种气候，山顶落雨，山下天晴。黄昏时站在峰顶，月亮像是从山谷里爬出来，似乎一伸手，天上的星星也摸得着。

所长跟我们作了简短的谈话，分配我们去修枪。我们也巴不得一步跨进车间，站在机器旁边工作。所长笑着说：

“好吧，你们先到工厂去看看！”

我们走进一所普通农家的小院子，只见墙角搭起高高的茅草棚子，那就是锻工间，里边有两座用土筑起的锻铁炉，两个木风箱，一个铁砧子。北屋正中间摆着宽大的工作台，紧靠着台子，埋了几根粗树桩，每个树桩上安一部老虎钳，桌上摆满了锤子、锉刀、钻头一类零星工具。靠窗户旁边的木桩上，安了两把手摇钻。对面是枪托修理间，只有些普通木工用的简单工具。一切都很简单，找不到任何一部机器。我们四个人楞住了。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工厂啊！

我们正要扭头往回走，在工作台那边干活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连忙放下锉刀，笑嘻嘻地跑过来：

“我叫罗克绳。所长说你们没有修过枪，要我来帮助你们。不过我也不怎么会，咱们一起研究吧！”

这个年轻的小组长，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他领我们到库房里抬出一捆破步枪，这是前方才送来的，大多数残缺不全，需要安装新零件。步枪的种类很多，我们连名字都说不上。罗克绳一枝一枝拿起来介绍：这是德国的老套筒，这是日本的三八式，这是国民党的汉阳造，……世界上所有的步枪种类，这里几乎全有。因为，我们的队伍主要靠夺取敌人的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而国民党反动派发



动的“反共”内战，却得到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援助。最后，我们发现了一枝奇怪的步枪，枪筒特别丑，没有来复线<sup>①</sup>，没有枪栓，也没有标尺和准星。罗克绳说：这是以前红军使用的武器，本来是农民打猎的鸟枪，也跟着主人来到了队伍里。

罗克绳的老虎钳靠近我。他把步枪零件一件件拆开，又一件件安上，给我讲零件的名称和作用。怕记不住，每讲一遍，还再三问记住没有。

我照他讲的背一遍，又做给他看。直到完全没有错误，他才高兴地说：

“很好很好，就是这样。”

在短短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修理各种枪枝，制造各种步枪的零件。虽然这里一切都很简陋，但是，它比大冶的大矿山，比武汉的近代化工厂还要可爱。因为这是我们工人自己的。

在这以前，我们什么时候，对什么东西能说一句“这是我们的”？河流、土地、矿山、机械、铁路，……所有一切，都不是我们的。它们被少数人霸占着，我们都受少数人的奴役。只有今天，在革命队伍里，我们工人才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们的！”

星期四上午举行实弹射击，检查修好的枪枝。

---

<sup>①</sup>来复线又叫膛线，枪膛或炮膛内的螺旋形凹凸线，凸起的叫阳线，凹下的叫阴线。作用是使发射出的弹头旋转飞行，以增加射程、命中率和侵彻力。

大家忙着领了子弹，把修好的步枪抬到山沟里，向山脚下射击，罗克绳忙着进行检查。顿时山脚下掀起阵阵的黄土，枪声响彻了山谷。吓得那些麻雀吱吱叫喊，满天乱飞。

我拿起了自己修理过的步枪，一枝又一枝地射击。忽然一枝土造枪的枪管爆炸了，我的左手正托在枪管下面，手掌和手指被震得变成青色，指缝里流出紫色的血。

罗克绳赶忙跑来，扶着我走向宿舍，所长带着医生随后赶来，替我敷药包伤，同志们也都跑来看我。

傍晚，同志们上课去了。我躺在床上，想起白天的事故，心里还有些庆幸。幸亏这枝枪没有出厂，不然，在前方的战士手里爆炸，那该多糟糕啊！

第二天，左手的疼痛轻了许多。我走近工作台，拿起锉刀。罗克绳抓着我的肩膀说：

“等伤口好了再干吧！”

“前天你砸破手指还工作，我受点伤就叫休息，这太不公道的！”

他不回答什么，笑着把我推出车间。

罗克绳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并肩工作，床铺也并排摆着。早晨在一个桌子上自修，晚间在一个桌子上听课。我们在空闲时候，也常常沿着小径，到溪边散步。他的刚毅沉着，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总是把最困难的工作

留给自己，从来不叫苦。他诚恳谦虚，关怀别人。他又是那样单纯，就像一池清水，清可见底。他对我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甚至使我在不知不觉中摹仿他的一举一动。后来我们作过一次谈话，我就更了解他也更尊敬他了。

一天傍晚，罗克绳和我到溪边去洗衣服。那里早有一群村子里的大嫂子和姑娘们跪在地上捶洗着，她们唱着小调，笑着闹着。我们怕暴露目标，只得远远躲开。如果被发觉了，她们连问也不问，就把衣服夺过去洗。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眼尖手快的缴获了战利品，就洋洋得意；下手慢的就噘着嘴，说有“偏心”。弄得我们同志又要道谢，又要赔不是。每次洗衣服都偷偷摸摸，瞟过她们的眼睛。

我俩绕了一个圈，走到上流去，找了一个水深的地方，把衣服泡起来，背着夕阳坐在水边的石头上。罗克绳一边用手搅着水，一边问我：

“这里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样样得会。你过得惯吗？”

“怎么过不惯！这是我们的革命生活呀！”

“一个战士不但要会打仗，会工作，还要会生活，你看我还会做针线哩。”

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针线，又找到一块鹅卵石，把袜底衬上补起来。这个年轻人的一双手，一

上一下，熟练得很，使我想起了母亲为我缝补时的情景。半晌，我忍不住问道：

“你从小在家里学会的吗？”

“我没有家。”

“你的父母呢？”

“都牺牲了。”

“唔！”我惊异地望着他。

他把补好的袜子收拾起来，咬了一下嘴唇，沉重地说：

“这个仇我永远忘不掉！”

每个穷孩子，都有一段惨痛的经历。他家住在  
大冶，租地主几亩地种，收的粮食不够吃，父亲还要上山采药，换来粮食交租。十岁那年，鄂东红军打进了大冶。父母钉上大门，带了几件破烂衣服，一家三口都跟队伍走了。

他当了红小鬼。

队伍从湖北转战到江西。在反“围剿”战斗中，父亲两腿被敌人的枪弹打断了，仍然爬到山石后面继续抵抗，直到牺牲以后，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第二天，做炊事员的母亲，请求到前方去，再也没有回来。

“那时我真难过！哭了几天，两眼都叫眼泪腌肿了。心想我再也没有亲人了。可是我们的党把我

当作自己的儿子，像父母一样关心我，爱护我，培养我。我年纪小，打起仗来跑不动，叔叔们就轮流背我；敌人炮弹落下来，叔叔们就用身体遮盖我。我是党抚养大的，党就是我最亲最爱的人。”

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无心再洗衣服，胡乱揉了几下，提着水淋淋的衣服回来了。

不久，我申请参加了青年队。

……修好的步枪堆满了仓库，因为缺少刺刀，不能送上前线。领导上调我到刺刀制造班，赶造刺刀。

造刺刀全用手工，刺刀上那两道槽，得用凿子一下一下挖，这样来得很慢。虽说是冬天，窗外飘着雪花，汗珠还是顺着背脊往下滚。忙了一天，才造了一把，一检查，还是废品。吃饭的时候，看见同志们都欢天喜地，我更觉得问心有愧，心想，同样长两只手，吃的也不少，为什么别人一天能做几把，我却一把也造不成？越想脸越发烧，饭在嘴里团团打转，却咽不下去，好像有刺卡着嗓门。我坐不住了，忙丢下饭碗，跑到屋外去。

我严格检查了自己：既没有偷懒，甚至比别人还要累，那为什么落在后边呢？拿没有经验，工具使不惯，来安慰自己，就更可耻了。这等于没有上战场，先准备做俘虏。这样的人，如何能做战士？

天黑下来，我坐在村边一棵歪倒的枯树干上。雪

花飘落着。深谷里不时传来猿猴的哀鸣。我仰起脸，清凉的雪花使我稍微感到一阵舒畅。……忽然罗克绳走来，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你不舒服吧？一个人跑到这里坐着，多冷啊！”

他给我撑着雪。我们一起绕着村子，无目的地走着。我心里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还是罗克绳先问我：

“今天工作得不好吗？”

“糟透了！”

“这样的事，我也碰到过。有时候，工作没做好，就顿脚捶胸，恨不得把自己撕成几半。等到稍微清醒一下，发现自己还留在老地方，一步也没有前进。这太可笑了。工作有缺点，光发一阵疯，骂自己一顿，又有什么用？应该多问问别的同志，请他们帮助你。这并不丢人呀！”

平静的话语，句句打动我的心坎，我发现自己正是原地踏步。一个坚强的人，碰到困难，是不会这样惊慌失措的。应该钻进去，虚心向别人学习。想到这里，我立刻快活了。

第二天早晨，我一进车间，就去找老同志请教。他们让我站在旁边看着。我发现他们每人手边都有十多把凿子，用坏这一把，马上换那一把；我呢，只一把凿子，用钝了，现磨现淬火，耽误许多

时间。人家的锤子砸下去沉甸甸的，我的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我那个老虎钳也太小了，夹不住活。这一下弄明白了。我连夜改造好工具，以后干活快多了，造出的刺刀也经得起检查了。

车间里贴了一幅大标语，上面写着：“我们多流一滴汗，战士少流一滴血！”每次看见这鲜红的大字，胸口就止不住激烈地跳动。觉得自己的工作  
和革命事业联在一起，干活也更有劲。那天完工，数数刺刀，竟赶上了其他同志的数目。

春天又来到了，心里又轻松又愉快，锤子抡起来也更有劲。在这万物生长的季节，我们修械所也承担了新的任务。所长宣读了军部的命令，要我们在山沟里建立第一座兵工厂，制造新步枪。

在我们面前，摆着数不尽的困难，没有厂房，没有材料，更没有机器。可是，困难是不能压倒创造的热情的，我们决心从无到有，把工厂建立起来。

当天就出发勘察新厂址。我们沿着麻岭坑山脚下的小溪向前走，过了村子搭成的小桥，转过羊肠小路，进入深林。这里完全是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小溪穿过乱草，穿过山脚的密林，口渴的獐子们悠闲地在溪边饮水，偶尔昂起头来，看着行人。

前面有一块不大的盆地，古老的松林遮蔽了阳光，林间显得异常幽暗，多年堆积的落叶，发出刺

鼻的霉味。就在这里，我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兵工厂。

山村里的农民们，成群结队带着斧头锯子来帮助我们。我们扫清腐朽的落叶，砍倒大树，搭起屋架，又到小溪旁伐倒粗大的竹子，编成围墙，把茅草铺上屋顶，把墙壁糊上泥，刷上石灰。不到一个月，制造车间、修枪车间、锻工车间、枪托车间和炊事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都一一出现了。

我们从麻岭坑搬进了山谷。领导上拨出一座大房子，作全厂青年队员们的宿舍。派我担任青年班的班长。

搬来的第一夜就发生了意外的事。半夜里，五班的宿舍乱嚷起来，杯子碗盆摔得乒乓响。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慌忙披上衣服跑过去。五班的同志从床上跳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跳到地上，堵着门大喊：

“捉活的，捉活的！”

我们点起松明一看，遍地都是茶壶、茶杯的碎片，桌子也打翻了。老李光着膀子蹲在地下，两手按着一个小獐子，叫道：

“快拿绳子来！”

大家一边忙着捆獐子，一边问：

“怎么回事？”

老李牵着那只吓得浑身哆嗦的小獐子，说：

“这个小东西真坏透了，半夜跳上床来，在我



脸上乱舔，我还以为是谁跟我开玩笑呢！想不到……”

他轻轻拍了一下小獐子的脑袋。大家止不住打了半天哈哈。老柴一边架翻倒的床铺，一边做鬼脸说：

“老李，该你好福气，头一天就有个四条腿媳妇送上门，保险以后百事如意。”

大家兴奋得不能睡了，亲密地挤在一块，坐在床沿上、桌子上，谈着生活，谈着未来，谈着自己的心愿。尽管各人都有不同的爱好，但是大家关心的却是一件事：让我们的工厂变得更好。

车间里安上了土机器。枪筒是要用旋床旋出来的，我们没有旋床，就把大长木凳的四条腿埋半截在土里，在木凳一端钉上两个铁叉，叉子当中放一根带有木轮子的铁棍当车轴，车轴前面的凳子中间再钉上一个铁叉，枪筒一头卡在车轴上，一头搁在铁叉上，木轮一转，枪筒也跟着旋转。这样就成了一部最简单的旋床。

枪筒里要有来复线，好叫弹头正确地飞行。我们没有造来复线的机器，就在地上埋了一截粗树桩，对面竖着埋一块厚木板，木板中间钉个母螺丝，用一块扁铁板拧成和来复线相等的螺旋形，穿过木板上的母螺丝，一头安上四个刀口的刀，一头安上木柄，把刀插进固定在树桩上的枪筒里。这就

算是刻来复线的机器了。工作起来，握住木柄来回推拉螺旋，枪筒就刻出了来复线。

我们又造了打光机。把铁棍插进枪筒里，浇上铅，拿下来抹上菜油，再把破玻璃碾成碎末，用细罗筛好，洒在铅棍上。如果来复线有毛碴，就用我们自制的打光机在枪筒里来磨回擦，不一会，来复线就又光又滑了。

没有发动机，我们就借老乡磨面的石磨，在磨眼上插进一根铁棍当轮轴，埋下两根树桩当轴承，把石磨架起来摇，就算是发动机。再缝一条厚布带代替传动皮带，一摇磨扇，车轴转起来，土机器就能生产。

新步枪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前线去了。

一天，有几个人来参观工厂，中间有一个外国妇女，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军装，脚上着的草鞋，还会说中国话，她就是我们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

她先要了一枝新造的步枪，拉开枪机，仔细察看了各部分的构造，不住口地赞扬工人们的手艺，并且要我们在小坡上埋一块钢板，她举起枪来向着钢板一连打了三枪，子弹都顺利地穿过了。她放下枪问：

“用什么机器造的？”

我们领她走进了车间，那里没有一部机器，只有一些长凳子、矮凳子、木桩、木板和旋转着的石

磨。……

她热情地跟同志们一个一个握手，兴奋地说：

“我从美洲到欧洲，到过很多国家，也看见过很多工厂，可是还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兵工厂。你们这个兵工厂真是世上少有。”

## 入 党

我们的时代是战斗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我感到幸福。尽管斗争非常残酷，革命战士的生活，也不会黯淡。因为愈艰苦，愈奋斗，也就愈快乐！我们整整挖掉半个小山，开辟了运动场，在工厂周围的空地上栽花种菜。我们唱歌、演戏、办墙报，还举行体育比赛。看到这些活动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下一分钟这里也许就发生激烈的战斗。

兵工厂迅速成长起来了。附近一个煤矿有许多破旧的工作母机闲着不用，我们就把机器借来，成立了机工组。我被派做组长。

大家忙着拆洗机器，修配机件，架天轴。从收买来的废铁堆里，找到一部残缺不全的十五匹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我们连夜修好。没有钢筋水泥给发动机筑固定座，就在地下挖一个深坑，埋了几根粗树桩，用螺丝把发动机固定住，再套上大皮带。发动机一开动，全部工作母机都转动了。

有了机器，我们的工作起了很大的变化。做一枝枪筒，用手工最少也要一天，用机器不到一个钟头就成了。开工那天，全厂同志都拥到车间来参

观。看见机器飞快地转动，枪筒外皮的钢屑冒着青烟，卷起一长条的圆钢带，都兴奋地互相夸耀着工厂的发展，畅谈着将来的美景。

“我们这里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电灯！”管理汽灯的小黄说。

“还是安上自来水好，一拧龙头水就哗哗流，炊事员也不用到河里挑水了！”小赖在南昌见过自来水，老觉得新鲜。

“只要开动脑筋克服困难，什么也不愁！”罗克绳说。

因为人少，我还兼管发动机。一天早晨，在溪边洗脸，忽然想起小赖说的自来水。我们的发动机靠凉水冷却，每天都要一担一担挑水，花费很多人力。如果让水流到门前多好呀！我顺着泉水寻找水源，钻进灌木林，爬上了后山，发现一座陡岩下面，涌出一股清泉，汇成一个小池塘，水流像一条小蛇沿斜坡蠕动着。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年轻的伙伴们，并且提议修造自来水管，让小河搬家。他们高兴得跳起来，马上跑去请示了所长。当天，我们就把建厂剩下的长竹子，用铁棍一节一节打通做水管。又用树枝做好支架，把竹管架起来，一根套一根，从半山腰的水源一直接到伙房，接到机工间的发动机上，清亮的泉水不断地涌出。从此以后，青年班得到一个别

号，叫做“自来水公司”。

不久，大家选我当俱乐部主任，还兼任墙报委员。不管工作多么紧张，我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好像心里也安上了发动机。一清早，在小溪里洗过脸，就跑到竹林里读书。吃过早饭，跑到车间，分配完工作，就守着发动机。它那嘭嘭的响声特别使我愉快，整个心都随着这音乐的旋律跳动了。所长看到我已经担负了两个人的工作，叫我停止修枪。可是我总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还能做更多的工作。我在发动机旁掘了个大坑，埋了一根木桩，把我修枪的老虎钳搬来，固定在木桩上。一边修枪，一边用耳朵掌握发动机的运动。一到晚上，我又成了“教员”，在俱乐部讲发动机和机床的构造原理，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各种技术问题。

这年春天，敌人沿着浙赣铁路向西进攻，萍乡煤矿被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时破坏了。逃到四川的弟弟来信说：大哥在武汉被敌人逮捕，关进了集中营，二哥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妹妹逃到广西，年老的母亲流落到浙赣路的樟树镇，沿街乞食。家庭的不幸遭遇，不免使我心里有些沉重。多少个家庭在战争中毁灭了，多少人丧失了亲人！可是个人的不幸，不过是我们祖国人民经受的苦难的一部分。流泪，悲伤，不能结束这种苦难。只有英勇战斗，彻底消灭敌人，以战争来消灭战争，才能夺得幸福。

个人的幸福只能包括在集体的胜利中。因为个人不过是一滴水，谁能从苦海中捞出一滴甜水？斗争也是这样，无数水滴汇合成巨流。一旦离开了集体，最大的水珠，也会干涸。我早已决心做一个革命战士，把自己交给集体，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那末，怎么能够只眷念个人的家庭呢！

一个星期日，吃过早饭，我跑到后山坡，躺在草地上看书，周围都是一丛丛的野花，忙碌的小蜜蜂们正在紧张地劳动着。不一会，做钳工的秦永祥，也拿着一本书从山下跑来了。

“我猜到你就在这里！”他打开书本，坐在旁边，狠狠地吸一下那浓郁的香气。“这地方真美！就跟花园一样。”

老秦从前是上海一个工厂的车工，抗战第一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先在教导队学习，毕业以后，调到兵工厂制造刺刀鞘。机工组一成立，又被调来做钳工。他是我们车间里的生产能手，又是俱乐部的文娱委员。他爽直热情，我们一见面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春天的太阳晒得身上有些发热。老秦站起来脱掉上衣，铺在地上，望着山洼里那一片黄色土房，凝神微笑着说：

“看我们工厂多好！才一年时间，发展得这么大，再过几年，说不定真能造出大炮呢！”

我也跟着站起来，望着脚底下的山沟。想到未来的日子，感到很愉快。

老秦回过头，忽然问我道：

“老吴，你将来准备做什么？”

我想了想，我一直是个工人，机器永远对我有一种魔力。当它平平稳稳地转动，像琴键弹出一个个动听的音符的时候，心里就愉快；当它发出杂乱的噪音，像一个醉汉发着呓语的时候，心里就不安，好像是亲人得了重病，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放进他的胸膛里去。这种感情，是任何一个热爱自己事业的人都会有的。可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最使我激动的感情：不仅要做一个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而且要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口号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在战斗中，又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做一个这样的人，是最大的光荣，也是最大的幸福。因此，我毫不迟疑地说：

“做个共产党员！”

秦永祥的眼睛立刻闪耀着光亮，他丢开书本，紧紧抓住我的手，热烈地喊道：

“太好了，太好了！”

那时候，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党还没有完全公开。不过，那些忠诚积极的人，在我们心里都印下一个特别记号，因为这些人平时都是大家的榜样。



秦永祥就是受到普遍敬爱的一人。我向老秦说：

“老秦，我早就想参加党，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只是我有不少缺点，性情又急躁，恐怕离党员的标准太远了。”

“只要努力争取，党一定吸收你！”老秦说，“做个革命战士，最重要的，得有坚定的立场，对党无限忠诚，经得起任何考验，不管什么时候，都跟着党走，不变心！”

我们谈的很多。除了工作，学习，也谈了思想修养。老秦有段话，特别启发了我。他说：“个人主义最害人，自私自利，虚伪欺诈，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做个真正的革命者，要像对待毒瘤一样割掉它！”长时期以来，我也反复思索过这个问题。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实际上没有生活方向。成天在自私自利的阴沟里爬来爬去，弄得一身泥，满脸脏，走到哪里，臭到哪里。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我参加革命，并不是把自己存进银行里，打算捞一笔优厚的利息。因此，听了老秦的话，我就说：

“我认识到，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就是终身最大的幸福。我要把自己完全交给党，听党的话。希望你好好帮助我。”

老秦热情地鼓励了我，要我们互相帮助。还说：共产党员也都是从旧社会出来的，不是“超人”，即使入了党，也还必须在斗争中锻炼，靠批

评和自我批评来加强党性。一个人，只要不掩饰缺点，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就能够不断提高阶级觉悟。一个人，如果是真心革命，就不会让个人主义的灰尘迷住眼睛。这场谈话使我更加了解到革命战士要改造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的意义。我正如我们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当相信自己“正确”的时候，常常表现得十分固执，单枪匹马，个人突出，因而也就过分看重个人的成败。谈话以后，我时时警惕自己的毛病，决心不惜牺牲一切，献身给伟大的工人阶级的党。

已经是初夏了。菜园里的黄瓜蔓爬上了架，这里是小白菜，那里是小萝卜。傍晚，我和几个年轻小伙子在菜园里浇水，只见罗克绳老远连蹦带跳地跑来了。他一把拉住我就走，高兴地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他跑出菜园。

“老秦已经把你的要求向党支部汇报了。”他边走边说，“经过研究，支部认为你可以正式申请入党。”

“真的？”

“真的！我做你的介绍人。”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当夜，我坐在菜油灯下写入党申请书，并且写了详细的自传。我不断回忆起那些过去的日子，那

些痛苦和折磨，我走过弯路，摔过跟头，是党告诉我正确的方向，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里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现在，我长久的期待快要成为现实，我将成为党的一个成员。我忽然觉得天地都更加开朗了。

过了不久，一天晚上，月亮刚刚爬上山头，罗克绳领着我翻过一道小山梁，顺着林荫小路，走进一块不大的草地。月光穿过茂密的竹林，照着挂在树枝上的党旗，环境严肃异常。我只觉得心在砰砰跳动，脸烧得发烫。

支部书记宣读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罗克绳把他平时对我的了解作了介绍，然后表决。

“一致通过！”支部书记宣布。

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地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誓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终身奋斗到底！”

这一天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

我觉得，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我必须不辱没共产党员这个崇高的称号。

## 转 移

上班的哨声响了，车间里沸腾起来。我检查了发动机的油箱，添进了煤油，握着摇柄开动了发动机。不提防摇柄一滑，落下来，把左脚踝骨碰破一个小伤口。在厂里，手脚破点皮算不了什么，像往日一样，我也没在意。

过了半个月，伤口还不停地流黄水，时刻隐隐作痛。一天早晨，我去山后镇上采购材料，翻山越岭，来回跑了五十里，当晚赶回来，同志们又拉我去麻岭坑参加晚会演出。化装时解开腿上的绑带，小伤口已经肿了，身上也发烧，我忍着痛演完了歌剧《一根扁担换支枪》，不料散会后就站不起来了。

同志们把我抬上担架，送到留守处门诊所，一试体温，烧到四十度。医生用小刀划开伤口，乌黑的脓血涌了出来，原来伤口内部全烂了。

第二天，我被送到军司令部后方医院，医生给我挖去腐烂了的肌肉，沿着踝骨挖了一个月牙形的大洞，足有半个菜碗口大。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伤口老不见好。心

里惦记工厂，一闭眼睛，就好像听见发动机嗡嗡转动着。整天躺在病床上，心里又烦又闷。我实在忍不住了，请求医生发给我一些药膏绷带，腋下夹两根拐杖，一只脚跳回工厂去。正好半路碰见工厂派担架来接我。一回厂，我马上投入了紧张愉快的劳动。

这时候，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调动了十几万人马，要消灭在江南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兵工厂接到了撤退命令，连夜埋了机器，随着非战斗部队先撤。军医处和兵工厂跟着前卫部队走在最前边，刚离开茂林不远，顽固派军队就从中间插了进来。猛烈的战斗开始了。

我脚上的伤口还是那样大，拄着拐杖走，左脚一落地，就疼痛难忍，只好临时找到一副担架，请两个农民妇女抬着，随队伍撤退。

傍晚，我们撤到宣城地界，驻在一个大村庄里。大家忙着烧晚饭，我拿出药膏和纱布，坐在厨房的油灯下换药。庄外突然响起枪声，庄子里起了阵骚乱，老乡惊慌地向四外逃跑，国民党军队追过来了。

同志们急忙继续撤退。没有了担架，大家轮流搀扶着我走。我咬紧了牙，紧跟在队伍后面，伤口的血浸透了纱布和绷带，流进草鞋底。浑身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漆黑的夜，分不清小路的高低。队伍前进的速度正在加快，我的左脚猛地踢在路旁的大石头上，大拇指的指甲掀掉了一半，不停地流血，痛得我昏倒在路，同志们轮流背着我跑了一夜。

行动更加困难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汉奸汪精卫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派出了正规军和大批特务，密密地布下了罗网，来搜捕我们的同志。

队伍要渡过长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沿途经过敌人占领的许多城镇。我们这部分人不是战斗部队，又没有武器，只好化了装分散走。

我躺在一家农民的床上，无法行动。所长和同志们走到我面前，看着我发愁。我说：

“你们走吧，不要为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

“运铎同志，大家相信你经得起考验。我已交代老乡，好好照顾你。等情况缓和一点，你再去找我们！”所长说。

“你们放心，我爬也要爬过长江去！死也不落在敌人手里！”

同志们换上便衣，按照指定的路线出发了。罗克绳紧紧握着我的手，舍不得放开。我催他赶快上路：

“你快走吧，过长江再见！”

罗克绳眼里闪着泪花，半晌才说：

“你要好好保重！”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看。我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前面有八百多里路程，有敌人的严密封锁，时时都可能撞在敌人手里。心想，往前走一步，就离目的地近一步。还有一口气，决不能留在这里。我必须不顾一切艰险，赶上同志们，去迎接新的斗争。

我勉强爬下地，做出发的准备。和老乡商量，换了一身破烂的棉衣，又弄到一张姓周的难民证。怕脚上的伤口被人发觉，就买了一大张狗皮膏药，贴在纱布外面。当天下午，我挽了个要饭篮子，扶着一根树棍上了路。

我成天脸也不洗，蓬头垢面，越来越像个难民了。路旁田里，死水面上已经飘浮起一层薄冰碴，寒风扫过辽阔的田野，成群的乌鸦在头顶上盘旋。我咬紧牙，一步一步向前挨。一路上，看见一块石头，一个土堆，都想坐下来歇歇，可是一停药，就累得倒在路旁。想到后面战场上英勇战斗的同志，想到前面开辟道路的战友，我又来了力气。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不能被困难压倒。我擦擦头上的冷汗，挣扎着爬了起来。

黄昏后，拣最小的村庄留宿；天不亮，又急忙赶路。走大路怕暴露目标，专拣小路走。偶而遇见推小车赶集的农民，他们也顺便送我几里地。就这

样，一天又一天，一里又一里，赶往前去。

疲惫和伤口无情地折磨着我。

一天午后，太阳快落山了，忽然浑身发冷，两腿直哆嗦，我站不稳，一头倒在枯草窝里，缩成一团。剧烈的颤抖过去，接着又发高热，嘴里干得冒火，两眼烧得睁不开，原来是害疟疾。我连滚带爬，挣到水田旁边，大口大口吞着污水。不一会，稍微清醒了些，我扶着树棍，向前边冒着炊烟的庄子挣扎。

在草屋门前的柳树底下，一个年老的大娘坐着搓麻线。我说：

“老大娘！天黑了，叫我借宿一夜吧，天亮就走。”

我两腿一颤，就倒在墙根下了。

老大娘丢下麻卷，慌忙跑到我跟前，拉着我滚烫的手问道：

“你是哪里来的呀？”

“逃难的。”

老大娘招呼来她的儿媳，把我扶进后院的牛棚里。那大嫂抱了一大捆稻草，铺在牛屁股后边；老大娘一手抱棉被，一手提茶壶，送进牛棚来，回身关好门，叫我休息。

“你委曲一点，睡在这里吧！这些天风声很紧，该死的汉奸天天来查，说是要捉新四军。你



……”

忽然门开了，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皱着眉头向老大娘说：

“妈，别唠叨了，你给他烧点开水，我找药去。”

他凑近两步，蹲在我身旁，压低嗓门问道：

“同志，你准备过江吗？”

“你认错人了，我是逃难的。”

“别耽心，我昨天带路才回来！”

“给谁带路？”我一骨碌爬起来。

“给兵工厂的同志。”

“他们在哪里？”

“赶得快还能跟得上。”

他笑着出去，不一会拿来了膏药，让老大娘掌着灯，用温水给我洗了伤口，再换好药。然后他说：

“趁黑夜赶路吧，天亮了不方便。……不要紧，我们抬担架送你。你一定很累了，就在担架上睡一觉。”

这位大哥又找来了一个老乡。大嫂搬出一个藤躺椅，上面铺了床棉被，两边绑上茶杯口粗的竹竿。老大娘扶我躺下，给我盖好被子。两位老乡抬着担架抄村边小路，一直往北走。

北风在耳边不断呼啸，天要下雪了，冷得很。

1  
L  
—  
19  
代

虽然天黑，担架却很平稳，这条路原是我们农民弟兄踩出来的，他们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失脚的。想着就要和同志们见面，我心里兴奋得砰砰跳。可是不一会就蒙蒙眈眈睡着了。

天蒙蒙亮，已经走出六十多里，担架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白霜。他们把我安顿在一座破庙里。

“天快亮了，我们得赶快回去。同志们离这不远。你多多保重吧！”

“谢谢你们！”我感激得不知怎么是好，只说出这一句。

“说哪里话！自己人嘛！”

那大哥又把他们随身带的干粮全塞给我，就把担架拆开，一人挑着被子，一人扛着藤椅，我们难舍难分地告别了。

前面就是溧阳和句容交界的地方。我按约定的记号打听，没找到人。后来听说一个村子里住着工人，我急忙赶去，到那里已经半夜，我怕惊动大家，就借村边一间小屋住下了。

不料第二天清早，天还不大亮，村里起了枪声。我惊醒过来，慌忙下床。留我住宿的老大爷披着衣服，把我连扶带拖，跨过小菜园的篱笆，转进一道土沟，送到另一个村子上。

原来有一群特务，打听到消息，混进村里，拿着手枪堵住了罗克绳带领的那一个小队住屋的门。

罗克绳他们用石头砸，用扁担打，勇敢地往外冲，敌人就开了枪。

这一次，六个同志被捕了，里面有四个党员，两个青年队员。他们是黄虎胜，于志修，张先哲，张光先，余长海，还有罗克绳，他受了重伤，没有冲出来。

敌人把被捕者捆在大庙的柱子上，一个个严刑拷打，要他们供出新四军活动的情况。同志们被打得死去活来，大殿上溅满了血。但是没有一个人屈服。在他们心里，有一道攻不破的防线，这就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意志。这道防线，永远不会崩溃。

当天下午，狗特务把我们的同志转交给日本鬼子。敌人都一样残忍，也都一样愚蠢。日本鬼子用水灌，用火烧，照样得不到什么东西。

鬼子派人在村口大道旁边，连夜用木板搭起一座大台子，又逼着老乡们在台下面挖了六个坑。他们想用屠杀来恐吓人民。大清早，走狗们敲着锣沿路吆喝，鬼子兵端着枪，挨门挨户把大人孩子都赶到台前去。

凄凉的北风扬起灰蒙蒙的尘土。我们的战友被推到台前。许多老乡看见他们血淋淋的模样都哭了，敌人就拿鞭子乱抽乱打。战友们激昂地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从容跳进

了土坑。台下成千人的呜咽，变成了痛哭。敌人慌了，拿起铁锹直往坑里填土。战士们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秒钟，决不屈服！死亡永远不能征服人民的战士。

这天夜间，地方上的党支部同志把我送到一个小学校去。他们得到紧急指示，向敌人展开反搜查斗争，保护自己的同志。我刚进门，一个穿棉袍的商人打扮的人向我扑过来。

“老吴，你可来了！……”

原来是秦永祥。他也是那天脱险的。我们紧紧拥抱着，激动得说不出话。想起那些英勇牺牲的同志，我们都禁不住流出热泪。

这里还有二十来个各式各样打扮的男女青年同志，我都不认识。他们也是被敌人冲散的。我们编好小组，准备作更艰险的行军，穿过敌人占领的常州城，渡过长江。

秦永祥、我和四个女同志编在一个小组。因为我正闹病，需要休息，只好晚些出发。农民同志们日以继夜地防护在小学校的四周。

过了两天，我们这一组拂晓出发，带路的同志领着我们悄悄走到一条小河旁，钻进了船仓。进城的男女老乡也上了船。船开出二十多里，星星才隐没在青苍色天幕的后边。

机警的带路人领着我们混过敌人一道又一道关

卡，旁若无人地走过常州城内萧条的大街，城外小河里早有一只小木船等着我们。

出城二十五里，船行到了最后一道岗哨。一个汉奸拿着一根皮鞭，从碉堡那边摇摇摆摆过来了，后面跟着一个鬼子兵。他们跳上了船。汉奸站在仓口，把头伸进来喊道：

“检查！”

我暗地扯扯老秦的衣角，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虽然没说话，我们已经得出共同的结论：万一暴露了，先把这两个家伙推下河！……

鬼子兵站在船头，只顾伸手向船夫讨美丽牌香烟，叫着：“美丽美丽！”鬼子愈来愈穷，连香烟也抽不上了。

坐在仓口的带路同志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银元，交给船夫塞过去。鬼子兵眉开眼笑地向那汉奸一咧嘴，扭头走了。

前面就是长江，暴风掀起雪白的浪头，冲击着堤岸。江边停着几只破旧的小渔船，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颠簸着。敌人的军舰来回巡逻，封锁了江面，看见渡船就用机枪扫射。为了尽量减少牺牲，我们小组又分开单独行动，各人找港口设法渡江。老秦看我的伤口没好，行动不方便，跟我留在一起，好随时照顾。

我俩一整天都伏在堤岸上，观察敌舰的动静。

身子紧贴着地面，动也不敢动。狂风过后，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江上灰蒙蒙一片。

“来了！”老秦轻轻拉了我一把。

只见下游飞驶过来两艘鬼子军舰，浪花翻滚起来，有一丈多高。接着响起一阵清脆的机枪声。

“又有人受害了！”老秦愤恨地说。

身上冻得有些麻木了，不远的江堤下边，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茅屋，大概是渔人歇脚的地方。我俩跑进去，想找些吃的。屋里却一点烟火气也没有，尘土盖没了脚面，严寒把蜘蛛赶进了墙缝，小屋四壁透风，几块烧得焦黑的土坯砌的小灶也塌了。它的主人呢？

墙角灰烬旁边，有几块红薯皮。我说：

“这里一定有人住，你看……”

“有人就有办法。”老秦说。

果然，黄昏时候，一个老渔夫背着一捆柴进来了。我们帮他生了火，老人问道：

“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

“准备过江！”

“过江？这可不是玩的！一点不好就把命送掉。这一带你们有熟人吗？”

“没有。”我和老秦同时回答，“请你帮帮忙吧！老大爷。”

“不好办啊。……”

老人从布袋里倒出几个红薯，拨开通红的火灰，把红薯埋在里面。我们就这样围着炉火谈了一夜。天快亮，老秦凑到老人跟前，亲切地说：

“老大爷，跟你说实话，我们是新四军，得到命令要转移到江北去。你帮帮忙吧！”

“你们是新四军，怎么不早说！拼上不要老命，我也要送你们过去。你们放心好了，有我就有你们。”

兵舰上的绞锚机隆隆响起来了。老人招呼一声，我俩跟着出了小茅屋。外面积雪很厚，我们后脚套前脚，脚印叠脚印，一直走到港口，准备趁兵舰到上游巡逻的空隙冲过江。

我们上了小渔船。老渔夫撑着舵，摇动后橹。我俩坐在船旁，使劲摇桨，顶着西北风，破浪前进。小船行驶在汹涌的波涛上，一会抛上去，像要离开水面，一会又陷下去，周围的浪头就像一堵堵的围墙，浪花直往脸上扑，紧张的搏斗使我忘记了伤口的剧痛。到达北岸以后，都累得满头大汗，而衣服上却结起厚厚的冰块了。

我们终于到了苏北。

一进黄桥镇，街头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老乡们挑着鱼肉，背着成捆的鞋袜，慰劳参加黄桥大战的战士们。原来就在我们突围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向苏北我军也发动了进攻。被复仇烈火鼓舞

起来的战士们，把顽固派一个军赶进一条河里，饱饱赏了一顿机枪手榴弹。敌人死尸压死尸，填满了河沟。殷红的河水被尸体堵塞，溢出堤岸来。连顽固派军长李守维也淤在河底，喂了王八。

当天晚上，我瘸着腿跟老秦兴奋地参加了庆祝黄桥战斗胜利的军民大会。



## 反“扫荡”

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党中央决定在苏北成立新的军部，全军扩大为七个师，坚持华中抗战。军司令部成立军工部，领导建立修械、炮弹、手榴弹等兵工厂，加强作战的力量。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工人都成了建厂的骨干，秦永祥被派到修械厂，我担任了军工部党支部书记。

我的伤口一直没长好，现在生活一安定下来，连脚背也红肿了。眼看着无数同志千方百计地到处搜集破铜、碎铁、烂机器，我又怎么能只顾个人的一点伤痛呢！不久，军司令部决定要建立子弹厂，军工部长对我说：

“老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我知道你没造过子弹，可是别人也没造过；更糟糕的是一无材料，二无机器，困难当然困难，不过革命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只要发挥革命毅力和创造智慧，总能想出办法。”

还有什么可说呢。让一个战士去执行严峻的战斗任务，这是党对他最大的信任，因为党相信我们

不会碰到困难就向后转，成为可耻的逃兵。我应该珍重这种信任，愉快地接受任务。

终日狂风大雪。我们驻扎的古庙盖满了白雪，院子里柏树的枝都压弯了。我站在台阶上，望着墙根出神。那里散乱地堆着搜集来的许多破铜废铁，也有钢轨，也有铁板。我们的子弹厂就要从这堆废铁里诞生出来。

大庙的正殿里耸立着三尊大佛，斗大的脑袋一直顶到大殿的屋顶，成天眯着眼睛，猜不透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在佛座下铺了稻草，挨着窗棂架上案板。古庙的大殿便又是宿舍又是车间了。

东西配殿做了修枪厂。我去领了几发步枪子弹，把弹头拔掉，仔细地量着子弹各部分的尺寸，计算了材料的重量，记在日记本上，成天地揣想子弹各部分的制造方法。

我先制出一副弹壳模型，但是制弹壳要用铜。这类材料很缺乏，只有要求每个战士珍惜每一颗空弹壳，把保存的弹壳汇集缴回工厂，由我们用钢模压制，使它恢复原形，再造成子弹。不过弹壳底部的火帽在放射时被撞针击毁了，必须换成新的。我们没有做火帽的铜片，只好把那些不能再用的裂口空弹壳剪开，锤成薄片，来代替火帽材料。

我就这样守在大殿里，不分昼夜地干。冷风时常从雕花的窗缝钻进来，手冻僵了，脚上的伤口发痒了，我就离开木案走动走动，往手上呵呵热气。……

在敌人重重的封锁下，火药原料是找不到的。只好去寻找代用品。我把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准备用酒精泡开，制成起火药。但是找不到酒精，就到小铺里打了二斤老烧酒，又做了个洋铁罐子，把烧酒蒸馏一下，当酒精使用。谁知火柴爆炸力太强，不适合做起火药。我又跑到厨房里刮下锅烟子，掺在一起，才配成了起火药。不过，红头火柴需要很多，根据地不出产这东西，从敌占区运来又不方便，后来我们到药店里买了雄黄和洋硝，混合配制，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当时我们还没有大炮，缴获来的各种炮弹用不着，都堆在那里。我把它一个个拆开，取出炮弹壳里的发射火药，又做了一个小铜碾子，把它碾成碎末，做子弹的发射药。这种易燃物体，磨擦过度容易起火，把人灼伤。所以每次碾末都要特别小心。

制造弹头的材料更缺乏。我试着把铅溶化了注入模型，做子弹头。但是铅经不住高热，放射时，铅头子弹经过枪管，把柔软的铅渣填满了枪管的来复线，步枪有被炸毁的危险。最后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尖尖的子弹头，里面

灌上铅，实验就完全成功了。

接着还要制造机器。我从废铁堆里找出几节切断了钢轨，中间钻个洞安装模型，然后把铁轨钉在案上，算是“冲床”。修械厂也为我们制造出一批手模、冲子等简单的工具。上级又调来一部分人员，成立了子弹实验厂。

实验工厂刚开工，日本鬼子就来“扫荡”了。这天，吃过早饭，庙里的大铁钟响了，这是空袭警报的信号。我连忙把那些零碎工具装进袋子，背上就跑。刚出庙门，六架敌机迎头冲来，只听耳边一声呼啸，三颗炸弹同时落下，我顺着雪堆滚下斜坡，车间立刻发出震耳的爆炸声，砖瓦木梁嗖嗖从头顶飞过，烟和尘土像浓雾似的迷漫了大庙，倒塌的屋顶埋住了机器，佛像也被炸得东倒西歪，呲牙咧嘴。敌机未发现目标，打一阵机枪飞走了。

随着轰炸，敌人冲进了这年幼的根据地。

黑夜里，各厂同志冒着风雪，把机器、材料抬上了船，沿着小河向东北海岸大荒地撤退。坚固的冰块封闭了河流，船只挤在河里开不动，同志们卷起裤脚，跳到冰块上，抡开大锤砸破冰块，开辟前进的道路。

夜间看不清四处景色，怕暴露目标，也不能点火把，往往脚下一滑，人就扑通掉到水里，大家又

撤下机器去抢救伙伴。湿透的衣服被冷风一吹，立刻结成冰甲。女工同志们背上背着孩子，手里握着竹篙撑船，男工同志们曳起纤绳，沿着堤岸一步一步往前拖。岸边密密麻麻布满了钢刀一样的冰刺，碰到我左脚的伤口，引起一阵阵剧痛。

凶恶的北风扫过灰色的海洋，扫过一望无边的大荒地，扫过海岸熬盐区的盐堆——成群的盐堆耸立在海岸的荒滩上，就像一个个白色的岛屿。暴风夹着盐粒和雪花，冲到人身上，渍得肉疼。在这个咸土地带里，草木不愿生长，飞鸟也不愿歇脚。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座盐民的茅屋，点缀着辽阔的荒原。

我们在茅草屋里安了家，架起机器重新干起来。荒凉使人们忘掉大米和白面，连玉蜀黍也看不见了，黄豆吃完吃绿豆，大麦吃完吃红薯，最后连红薯藤子也吃了。井水河水全是咸汁，雪水成了甘露。

后来敌人追到荒滩上来，我们又化整为零，并且派一部分同志带些机器上了大盐船，张开大帆，在海上建立了分厂。就这样，我们坚持了武器和弹药的生产。

荒原上转过风向，东风带来了雨季，终日一阵风一阵雨，半个多月太阳不露面，茅草棚子塌的塌，漏的漏，同志们撑开军毡，照常工作。这里百十里

路没有人烟，运输本来就很困难，再加上暴雨，补给就完全断绝了。材料、粮食眼看快完了，我们只得离开海边，转移到盐城附近的水网地区。

人工挖掘的河渠，像蜘蛛网一般交错在苏北平原上，除了河流，就是水田。初夏时节，河堤上飘着鹅绒般的柳絮，褐色的小燕子满天飞，巨大的风车在堤岸上旋转，农民们忙着往稻田里灌水，赶插早秧。在那绿色林阴下的茅舍里，我们的工厂又开工了。

那时候，不光要有战斗精神来劳动，还要随时准备作战。每个工人都带着两种武器，除了钳子、锉刀以外，还有步枪和手榴弹。工人们平时都把子弹压进步枪的弹仓，放在身边。

秋天来了。一天早晨，太阳刚露头，忽然听见小河里有汽艇的马达声，接着机枪扫射起来了，掷弹筒在河岸上炸开，烟雾淹没了沿河的柳林。敌人偷袭我们的工厂来了。

工人们立刻放下工具，拿起武器，沿河岸散开，抵挡敌人的进攻。敌人的汽艇靠不了岸，像掐掉头的苍蝇，直在河心里打转。工厂就利用这个空隙撤退。女同志和工人家属先顺着隐蔽地带转移，机器能带的都带走，不能带的就埋起来或是丢在池塘里。

我们撤退完了，日本鬼子冲上岸来，炸毁了机

器座子，烧了房子，又紧紧跟踪追来。

各厂的工人们迅速编成了战斗小组，边打边向阜宁转移。当时我是子弹厂的政治指导员和工会主席，领着一个青年工人小组，掩护家属和照管机器、材料。这一支队伍连老带少一百多人，妇女们有的生病，又有孩子。那些娃娃们，有的刚会走，有的还没断奶，一有动静，就哇哇大叫。行走起来队伍拉半里长。青年工人们就前前后后来回跑，扶大人，背孩子。到了宿营地，这些年轻小伙子，要担任警戒，又要四处找粮草。刚阖上眼休息一下，又要出发了。

兵工厂是敌人的眼中钉。敌人紧紧地跟着追击，一步也不放松。敌人到东，我们就到西；敌人向前扑，我们就向敌人后面钻。我们不是战斗部队，能够保护好自己，就是胜利。

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四面环河的村庄，打算在这里整理队伍，休息一下，做顿饭吃。同时把一些半成品埋藏起来，减轻行动的负担。两个同志帮我把东西抬到一个小菜园里，刨了几个坑，把一个个小箱子放进去。忽然，邻庄鸡飞狗叫，老乡们拖着孩子，向庄外奔跑。

鬼子又追来了。

这庄子只有一条木桥出进，再慢一步，撤退就来不及了。我对他俩说：

“你们快回去，带着队伍过河，绕到敌人后面去，我埋完东西，再去找你们。”

敌人很快到了南河岸，木桥被我们拆了，敌人站在桥头向庄子里乱打炮。我填完最后几土，又在坑上盖了些烂草和树枝，弯着腰往河边跑，敌人发现了，打来一阵乱枪，脚下土噗噗冒花，我一翻身滚下河堤，嘴里咬紧手榴弹的布袋，左手举起步枪，游过了小河。

军工部带领各个小队，冲破敌人的包围圈，退到阜宁去了。我们这一小队跟领导机关失去了联络。

我们只好向西北方的阜宁前进，沿途又收容些前面掉队的同志。白天行动不方便，就在树林里休息，晚上互相牵着衣襟赶路。绕过那些火光闪闪的被难的村庄。就这样跟敌人周旋了一个来月，天气转凉了，田里的稻子也黄了。最后我们走到一处叫丁家渡的地方，忽然发现陷进敌人的包围圈。

这里四面都是河流，又是开阔地带，如果被敌人发觉，连隐蔽的地方也没有，必须连夜冲出封锁线。我把队伍带到一道土埂下面隐蔽起来，和一个同志去找船。

我俩轻轻走进村外一个小茅棚子，擦亮一根火柴，唤醒了主人。这个农民听说我们是新四军，马上拉我们往河湾跑，那儿正锁着六条船。



“这船是‘瓦房子’的，向他们借用一下吧。”  
他说。

原来“瓦房子”指的是地主。我们又翻身往瓦房子跑，好说歹说才叫开门。

“深更半夜，又不报丧，干嘛砸门啊！连个安稳觉也不叫睡吗？”地主气势汹汹地说。

“船借我们用一用，弄坏了赔你的。”我说。

“哼！你们新四军还赔得起船呀！”地主眯缝着眼睛，坐在太师椅上，装着打瞌睡。

时间是不能再等待了，我们一边说，他一边打呼噜。我急得把驳壳枪掏出来，枪栓拉得哗啦响，大声说：

“干脆，你说：借不借？”

地主立刻吓得变了脸色，浑身哆嗦，又是作揖又是打拱，连说：

“借……借……借！”

“你早该说借了！”领路的农民得意地笑起来。

当天夜里，大雷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淋着倾盆大雨，我们把机器和材料搬上了船。风大雨大，孩子们饿得直哭，妈妈焦急地把干瘪的奶头塞到孩子嘴里，也哄不住。我们是逆流而上，河里涨水，船直往后退。当地许多农民得到消息，半夜里跑来帮助拉纤。响雷在头上爆炸，一道道闪电照

得眼花。

船行不远，碰到敌人预先布置的封锁网。敌人把河岸上的大树砍倒，一排排埋在河中，树和树之间用铁条连上钉牢了。我们跳进河里，拿钢锯锯断铁条，农民们在树桩上系上粗麻绳往外拔。从河里拔掉三根大树桩，大家一齐使劲把船硬拖过去。在丁家渡口，又碰上同样一道封锁网，也照样被突破了。

这一夜，我们简直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人人脸色铁青，被疲乏、饥饿、寒冷折磨得站也站不稳。体质弱的人，走着走着就晕倒了。这里离阜宁有六十多里，还要通过反动地主武装土匪控制的地区。我们顾不上休息做饭，抬着病号，互相搀扶着，继续向前赶路。

傍晚，刚渡过漕河，武装土匪果然扑过来了。数百人摆开扇形队伍，想把我们压进大河里。我们趴在河堤上抵抗，十多枝枪压不住敌人的气焰。正危急间，侧翼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是住在附近的我们的战斗部队赶来了。

土匪们丢下死尸，扭头就往回跑。我们紧跟着队伍冲上去，像赶鸭子一样，把土匪挤到一个大院子里，抓了俘虏。

我们在这里舒舒服服过了一夜。战斗部队的同志们给我们做饭，安置住处，就像招待客人一样。

第二天又护送我们离开了战斗地区。

我们这小队，终于到达上级指定的归队地点，人员一个没有损伤，机器没丢失一件。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军民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把敌伪军赶出了根据地。

## 第二次负伤

随着华中抗战形势的发展，军司令部决定把我们这些兵工干部和工人分配到华中各根据地去，建立更多的兵工厂。

军工部吴师孟副部长带着一部份同志去二师，那是罗炳辉师长率领的部队，驻在淮南根据地（包括安徽省津浦路东西两侧地区）。我也被派到淮南去。

激烈的反扫荡战斗，打了五十多天。日夜作战和转移，我左脚的伤口弄得愈烂愈大，成天淌脓流血。医生说伤口已成了慢性溃疡，没有特效的医疗方法，要我每天露出伤口晒太阳。

早晨，太阳越过村东头的大树梢，我坐在墙角地下背靠着墙，解掉绷带和敷料，把伤口伸在阳光下晒。同志们在屋里忙着化装出发，窗口不停地传出打闹的嘻笑声。

从苏北到淮南要步行几百里，要越过敌人盘据的村镇、炮楼、公路和重重封锁线。怎样完成这艰难的行军任务呢？我瞧着伤口直发愁。

同志们在找我换服装，小鬼拿着一套旧便衣，

带头跑出屋来。

同志们见到我的伤口，都默不作声。一会，钳工老李说：

“老吴，只要有我们，抬也把你抬到淮南去。”

是真的，只要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这多年来在战斗中，在建立敌后兵工厂的斗争中，我们度过了多少艰苦困难的日子啊！

越过黄河故道，我们向敌占区挺进。上级为了我们的安全，特地派遣了一个营的部队护送我们。我们日夜赶路，不时还要进行小的战斗。急行军时，部长把马匹让给我骑，在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一个月后，我们胜利完成了这次战斗行军，进入了淮南根据地边境，在高良涧乘上了大帆船，一路顺风驶进了洪泽湖。

朝雾迷漫，湖水连天。渔船结队撒网，水鸟不时惊起四飞。

芦苇丛里突然驶出一队船支，一字摆开，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主力舰船头上架上小钢炮，甲板边缘堆着沙袋，船舷四周挂满半寸厚的大铁板当装甲，这是我们的海军——二师巡湖大队。

主力舰上打旗语，要我们落帆受检。当他们听说我们是军部派来建立兵工厂的，舰队里立即爆发出欢呼声，指导员领着舰队的战士们，送来许多大

筐的鲜鱼和菱角，舰上的战士们挥着手直嚷嚷：

“同志们！没有别的慰劳，吃点鱼罢！”

“同志们！多给我们造些炮弹！”

一进大门就遇到这样好客的主人，弄得真过意不去。同志们的信任，这是更珍贵的礼物。它给了我们更大的鼓舞和信心。

到了二师司令部，罗师长陪我们吃饭，晚上又陪我们一同坐在地下，看文工团演戏。人人都盼望在这里赶快建设起自己的兵工厂。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吴师孟担任了二师军工部部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建立步枪子弹工厂，年产量是六十万发。军工部派了二个钳工，一个锻工，二个车工，二个小鬼算学徒，连我一共八个人。在这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里，要建立起工厂。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多的，但困难对我们来说，又算得什么呢？只要有党的领导，发扬我们党的革命传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接到任务后，我那左脚上的伤口，仍是张着铜板大的血口，一走就出血。偏偏又得了肠炎，连日地拉肚子，真是“内外夹攻”。只好到医院取点药来，一边治，一边工作。

一年要生产这么多的子弹，就必需要有生产子弹的设备和机床，这些庞大而又要求精密的机床又从哪里来呢？我们决定从自己设计开始，把各种机

床制造出来。

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们，千方百计的为我们收集破铜烂铁，作为我们制造机床的材料。从另外一个修械厂调来一部四尺长的皮带车床，两部老虎钳和一台手摇钻。村上农民腾出两间茅草屋子给我们当车间，背包一放就算安了家，从此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劳动。

交给我的任务是设计各种机床。制图用的丁字尺和三角板是用木片钉成的，一个小学生用的破旧圆规，两支铅笔。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制图仪器。借来当床用的门板，铺上一张白报纸，权当绘图板。

机床的设计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进行的，也不可能硬搬现成的理论，因为我们缺少材料。某些机件的制造需要大型工作母机，而我们仅有一部四尺车床。大的锻造机件需要有空气锤，我们最大的铁锤只有十二磅。较大的铸造件也无法制造，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用人工拉动木风箱鼓风的小熔铁炉。此外还要考虑战斗中的转移，机床也不宜过大。最重要的，还得看我们收集的材料怎样，有什么就利用什么。这就是我们设计的立脚点，如果不从这里出发，想像得再完美，在实践中也还是不顶事。

茅屋没有窗户，东西墙上临时掏开两个小洞，

早晚随着太阳转向，搬动那扇两用门板，借着墙洞透进来的亮光，绘制图样。有时候也跑到车间作实验，寻找设计上的缺点，检查代用材料的性能，使设计更切合实际。

当弹壳大冲床的图样完成的时候，我们立刻分成三班干活，昼夜不让车床停歇。每天鸡叫头遍，我上最后一班。我们常常一连几天通宵不睡，黑夜接着白天，干了一班又一班。有时过于疲倦，就倒在机器旁边，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会醒来，用冷水擦擦脸，再接着干。吃饭时，炊事员把饭送到车间来，我们也管不得满手油腻，拿起碗筷就吃。

一天黄昏，材料科的牲口大队，运来大批材料。牲口背上的驮篮里满装着破铜碎铁，还有几匹牲口驮的是不能使用的迫击炮弹，这是打扫战场时收集起来的。

我们跑出车间，帮着卸驮篮。赶牲口的同志把鞭子往腋下一夹，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旧纸糊成的小信封，里面有张纸条，是吴师孟部长写来的指示：

“……前方等着炮弹，务请尽一切力量，提早修好。”

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我们停止了制造机床，来抢修炮弹。这批炮弹没有一个零件，只剩一个空弹壳，不是修理，等于重新制造。我们找来一颗同



类的完整炮弹作样子，依样画葫芦来制造每一个零件。炮弹修好了，就是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汞<sup>①</sup>。我们当时没有制造雷汞的材料，前线又急迫的需要炮弹，要能很快得到雷汞，办法只有一个，从旧炮弹里去挖取。

我收集了一些旧炮弹，这些炮弹大多是在历次战斗后，在打扫战场时收集的一些敌人打过来没有爆炸的炮弹。我把这些形形色色的炮弹的雷管拆卸下来，浸在洗脸盆里，放在宿舍的床底下。

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可是白天黑夜里，只听见敌人的大炮轰轰声，想到自己的炮兵还在焦急的等着我们的炮弹，看着浸在脸盆里的雷管，这叫人多么焦急啊！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一天早晨，早饭后，同志们都到车间里工作去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关好门，把脸盆搬到桌上，我坐在桌边开始挖炸药。我从脸盆里拣了一支最大的雷管。仔细地观察了一会，拿着小签子轻轻地挖出了一小块炸药。我认为没事了，没想到凉水只浸透了雷汞表面一层，内里还是干的。当第二次签子一接触炸药的表面，轰的一声，这支雷管就在我左手里爆炸了。

---

<sup>①</sup>有机化合物，白色或灰色结晶，有毒，受到热、摩擦或冲击时，极易爆炸，用来制造雷管。

眼前火光一闪，泡雷管的脸盆里，红成一片。左手炸掉了四个手指，肉和皮炸得飞起来，贴在墙上，贴在桌面上。左腿膝盖炸开了，露出了膝盖骨，左眼直淌血，什么也看不见了，脸上炸了几个洞，浑身麻木得失去了感觉，反面不知疼痛。

我赶紧用右手握紧左手手腕，阻止流血。低头一看膝盖的伤口，直担心腿骨炸断了，全身就像着了火，急得我在屋里来回跑，不知怎样才好。

车间里工作的同志们，听见宿舍里爆炸，赶紧丢下工具就跑。那些家属大嫂们，丢下孩子也跑来。大家忙着绑了个担架，把我抬到了医院。

院长和医生们都忙着为我准备手术。他们为我洗伤口，消毒。衣服脱不下来，只好用剪刀把衣服剪成碎块。

天黑了，解放区没有电灯，没法动手术，只好等到天亮。可是这天夜里，死亡严重地威胁我，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陷入了严重的休克状态。

同志们白天黑夜看守着我，想我是活不成了。但是我还有一丝气息，脉搏仍在微弱的跳动着。但有时醒来，睁大一只右眼，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吃饭，同志们急得把我牙翘开，天天给我灌凉开水。大小便尽拉在病床上，害得护士同志们成天为我换床单。

这些日子里，同志们都在为我的生命担忧，吴

师盖部长也特地赶了几十里路来看我。

后来护士同志们告诉我，说我在白天或是深夜里，时常猛地从床上跳下来，一直往大门外跑，挥舞着缠着绷带的胳膊，高声喊叫：

“我要回去！前方等着炮弹哪！”

可是，我左腿负伤很重，身体衰弱不堪，跑出大门不远，就摔倒在大路旁的水稻田里。

整整地过去了十五天，这天下午，我突然清醒过来了。我恢复了知觉，额角上沁出细汗，身上有些闷热，我推开被单，衰弱地喊了一声：

“渴。”

值班护士小张惊喜的凝视着我，突然她一转身，拔腿就跑，一时，院长、医生和护士，都赶来了，挤满了病房，同志们为我获得了生命感到高兴。护士同志赶忙端来开水，一匙一匙往我嘴里喂，我深深感到阶级友爱的温暖，感到革命大家庭的幸福。

三天以后，我被抬到手术室，继续做完左手伤处的手术，据说第一次手术，因我休克不醒，手术只作了一半。

我左手捆满绷带，左腿膝盖处也捆着绷带，摸摸脸，也全用纱布绷带裹起来了，只露出嘴和一只眼。伤口不时疼痛，我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冬天来到了，窗外飘着雪花，北风呼啸，穿过

病房破墙缝隙，不时引起人们的寒噤。我成天躺在病床上，望着日落日出，数着心脏的跳动。我尽力排除心中一切不安的影子，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工厂，想到那些未完成的机床设计，心里便非常不安。弄得长夜不眠，我想我这时能做点工作该多好啊！

一个深夜里，伤处剧烈疼痛，我再也不能入睡。想起那些机床的设计，叫人不得安宁。我想利用躺在病床的时间，把每部机床的结构都想好，等我出院后，在设计工作上，就可赢得很多的时间，加快建厂的速度。我一直想到天亮。

次日中午，值班护士离开了病房。我想把自己想好的设计方案和机床结构记在自己的小本上。我从枕头下取出了日记本和钢笔。可是躺在床上，一支手仍然是无法工作。我用两手腕关节顶住床板，死劲挣扎着坐起来，手腕一出力，左手伤处疼痛难忍。我只得倒下去稍事休息，第二次我一死劲，终于坐起来了。我满心欢喜的打开小本，记录机床设计的方案。和结构草图。

护士小张提着一壶开水走进病房，惊愕的瞧着我的左手，突然说了一声“不好”，扭头就跑出了病房。

护士的惊愕，弄得我难解，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左手伤处湿漉漉的，我抬起左手一看，

白色绷带全变成红的了。鲜血穿透敷料和绷带往下滴。

医生和护士赶忙跑来，解开绷带和敷料，从伤口里喷出一线血流，直喷到病房的墙壁上，原来是我在坐起时，手腕关节顶在床板上用力过大，震断了伤口内的动脉血管。

血不住地喷着，医院没有血管钳，太阳下山了，动手术也不可能。护士用橡皮管扎紧手腕，血流仍在缓慢的渗着，最后在这茅屋病房的屋梁上，拴上一根绷带，把我的左手高高地吊了一夜，次日天明后，我又被送进手术室扎血管。

我的秘密很快被医生发觉了，院长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没收了我的小本和钢笔。我只得成天躺在病床上，想着机床设计，硬记在脑子里。

一天，司令部周参谋长到医院检查工作。他来到病房，沿着病床，依次向伤病员问好。最后，他走到我的床前，查看了病床前挂的牌子，他看了我一会，问道：

“你是拆信管炸坏的吗？”

“是的。”

他坐在床边，摸摸我的额角烧不烧，看看水杯脏不脏，被子是不是单薄，又问伙食好不好，窘得我不知怎样应对。

“一切都好！”我喃喃地说。

“真没有一点困难吗？”

“就是没法工作。”

“那你就好好休养。”参谋长微笑着说。“你不要为残废耽心，一个革命战士，只要心在跳动，他就能工作。”

首长的话，给了我鼓舞。但也加重了心思，只想早日回厂工作。

在医院同志们的细心治疗下，脸部的伤口已愈合，体力也趋渐恢复，我终于能起床走动了。只有手和腿上的伤口，老不见小。

窗外柳枝吐出了新芽，春天又来到根据地。

今年春天带来了胜利的喜悦，津浦路西界牌集反顽战斗已获全胜。

战斗结束后，由前方送来一些负伤的战士。我们的病房，又多了两个年青的伤员。这天傍晚，他俩忍着伤口的疼痛，从被里挣扎着坐了起来。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次反顽战斗的经过。他俩的谈话，吸引了全病房的同志。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增加了胜利的信心。最后，他们谈到了部队弹药缺乏的困难情况，也引起了我们心情的沉重。

这天晚上，我在被子里翻来复去睡不着，特别是想起那些艰苦斗争的日子，战士们每人只有两三发子弹，部队行军时，子弹袋是空空的，战士同志们不得不选些粗壮的高粱杆，切成子弹一般长，排

列起来装在子弹袋里。

想到这些，我更是想要回去工作，我不能成天躺在病床上，无聊地瞧着茅屋顶蓬。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我急忙穿衣起床，刚走到院子里，年轻的女院长就迎面走过来了：

“你怎么起来了？”

“院长，我要求出院！”

“什么？”她瞪着两支大眼瞧着我。

“我要出院！”

“你别胡说啦！你的伤口还没长好，怎么能出院呢？”

我把昨晚的经过都告诉了她。

“这些情况我也清楚，我也愿意你早回去。可是你伤口不好也不能工作呀。”

“我回去就安心了，自己不能工作，帮同志们出点主意也好。我们工厂附近有个门诊所，我每天可以去换药。”

院长最后点点头，同意了我的办法。她说：

“你先等一等，我给你开个介绍信。”

我回到病房，就向军工部派来照顾我的小同志说：

“小鬼，快打背包，咱们走吧！”

护士同志给我换了一块新三角巾，把左手吊起来。我和同志们告别后，撑着树棍就走。

医院离家二十多里地，一路上膝盖上的伤口，  
挣出了血。直走到天黑，远远看见工厂茅屋的影  
子，我兴奋得忘记了疼痛，拖着小鬼就跑。心想：  
我又能和同志们紧张愉快的劳动在一起了。



## 新任务

长期住医院，好像手脚都闲得笨拙了。眼前的任务是继续造机器，建立兵工厂。许多制造子弹的机器还没有设计，车间里等着图纸加工制造。我摘下挂在左手上的三角巾，用包扎绷带的左手按着三角板和丁字尺，忍着左手伤口的疼痛，趴在床铺上继续设计制图。有时也跑到车间，跟同志们一块作试验。炸瞎的左眼和炸断四根指头的左手，使我碰到许多不便。铅笔秃了，就用左臂按着铅笔，再把它削尖。我顽强地练习用一只手工作。

星期天大清早，同志们都在打扫屋子，洗衣服。我刚走到门口，迎面过来一个炮兵，牵着一匹大骡子，驮来一门迫击炮。炮兵说：

“我们的迫击炮打坏了，请你们修理修理。要的很急，我住在厂里，等你们弄好了，马上带回去。”

我把迫击炮全身查看一遍，没有毛病，就是底座中间的一个零件震坏了，需要削一个新的装上。我招呼大家把炮卸下来，抬到车间去。

我装上毛坯，开动了机器。

天近正午，零件做好了，就是表面有许多毛碴，不够漂亮。我想再磨光一点，就拿起锉刀，左臂轻轻按着锉刀的尖端，谁知机器转得飞快，手刚触着制件，绷带就被这零件表面的毛碴挂住了，受伤的左手也跟着被拉过去。在我旁边干活的一个工人飞步跳过来，把机器停住。可是伤口已经挤肿，流出很多血，浸透纱布，把皮带也染红一大块。

同志们又把我送到医院去。医生上了药，要我住院。

“我刚出院，怎么好意思又住院？你还是给我配点药带回去吧！”

“回去可以，不过，伤没好不许工作。”

傍晚，我回到工厂。那个炮兵还在车间门口转来转去，要他休息一下，他直摇头，连一口水也不肯喝。我很了解这小伙子的心情，如果今夜任务完不成，他连觉也睡不安稳的。其实我一样着急。一门炮到了我们战士手里，就能发挥强大的威力；丢在这里，不过是一大块废铁。我拿起锉刀又走到机器跟前去。同志们拦住，把我扶到一边，拉过一条凳子叫我坐下。

“你在这儿看着我们做，要是不对，你说一声就行了。”

同志们连夜把炮装好，试一试，炮座很牢固，直到炮兵同志愉快地赶着骡子走远了，我们才吃晚

饭。

图样画出来了，同志们又是日夜赶工。要造的机器很多，困难一个紧跟着一个。可是我们绝不被困难吓倒，我们的格言，是顽强战斗，用创造性的劳动克服困难。

我们要造的螺旋冲床，单是那个杠杆，就有半吨左右，我们没有起重机，全靠人力搬来搬去；这个杠杆应该是中间加粗，我们没有汽锤，只有打铁的铁锤；屋子也小得转不开身。我们在屋外的空场上，用砖砌好火炉，支起风箱，开辟了“露天车间”，又在地下挖了一尺多深的坑，埋上铁砧，四周搭起一人多高的木架，上面铺好板子，安装上木轮滑车。等杠杆中间烧红了，就用粗绳子把一头拴牢，拖到铁砧上竖起来，五个小伙子光着膀子，爬上木架，抡开铁锤，一边吆喝一边砸着。六月天，太阳像一把火，身上的汗水直流，杠杆还没冷却，人已经没有力气了。小伙子们累得放下铁锤，张大口喘气。我拐着膀子，给同志们送水喝。天黑了，木架上吊起汽灯，同志们不顾劳累，继续干活。我也在一旁帮着拉风箱。这八个人的工地，热闹得像市集。铁锤叮叮当当，火花乱飞，炉子上的火苗，随着风箱低沉的吼声一闪一闪。终于把那碗口粗的铁杠挤鼓了。

接着又制造螺丝杠。在一根三吋多粗二十多吋

长的铁棍上刻六条螺丝扣，十六吋长那么一段，要转一圈。按规矩该用铣床，可是我们没有铣床，只能用手工在铁棍上硬刻。刻完公螺丝，就用公螺丝杠翻砂制成坯模，灌进去铜水，铸成母螺丝。没有化铜用的坩埚，就利用废炮弹做的“钢锅”。不过，化过两次铜，铜锅就腐蚀得像蜂窝一样了。

“这材料能造多少漂亮的工具呀！”同志们心疼地说。

我们轻易得不到好铜，一切精致的工具：刀子，钻子，锉刀，……都是用铜炮弹改制的。

身上的伤口逐渐长好了，就是受伤的左腿走起来有些吃力，眼睛瞎掉一只，视力受到很大损伤，但我的心却好像磨炼得更坚强了，因此工作起来，总是有劲的。

第二年夏天，制造子弹所需要的机器全部造成了，大大小小一共三十多台。我们把机器都刷上了油漆，写上了号码。又把村头的一座大庙打扫干净，修补好破漏地方，把新机器搬进了大殿。

每年要生产六十万发子弹，只靠八个人当然不行，上级从战斗部队里调来一百多个青年队员，到厂里当学徒。我们开始轮班带徒弟，师傅教了徒弟，徒弟再教徒弟，一边上课，一边实习。

工厂正式开工这天，同志们都换上干净衣服，铁钟一响，涌进了大殿。

我装上原料，推动沉重的冲床，在机器巨大的吼声里，第一颗子弹诞生了。我拾起那颗黄澄澄的弹壳，捏在手心里，舍不得丢开。接着，机器全部开动了。小伙子们呼喊着自己创造的号子，那雄壮的呼应，压倒了冲床的吼声。

吴师孟部长也特地骑马跑了九十里，赶来道喜。他跨进车间门口，在那里站了很久，看着整齐排列的机器，看着黄色的弹壳从冲床下面一个个滑出来，他愉快地笑了。走到机器跟前，跟每个人握了手，随后也卷起袖管，抓住那沉重的冲床杠杆，参加了生产。

刚到淮南的时候，我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为了早日生产子弹，吴师孟部长曾经化装成商人，跑到敌人占领的上海，采买工具和材料。这个从井冈山来的老战士，直到后来病逝的前一分钟，还惦记着兵工厂的生产。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永远刻印在我们的心里。

工厂每月都超额完成任务。虽然困难一个又一个来到：弹头变形，弹壳裂口，打瞎火，材料用尽，工具不够，但是都一一克服了。起初我们制的是上下一般粗的子弹，后来我们也能制尖头鼓肚的“流线型”子弹了。

第二年秋天，上级命令制造迫击炮弹，同时还叫不妨碍子弹的生产。我们召开了动员会，重新组

织力量，抽出一批人来学习、实验。

我们从来没造过炮弹，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迫切需要获得知识。可是这类书籍根本找不到。我收集了敌人打过来的各种各样没有爆炸的炮弹，把它拆开，又把每个弹壳、弹尾和信管锯开，通过实地解剖来掌握炮弹的构造原理和制造知识。我对每个零件都提出了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构造？它起什么作用？反复对证，直到断定不会发生错误为止。我把敌人炮弹的优点综合起来，再根据自己工厂的条件，设计迫击炮弹的图样。

同志们根据图纸，制出第一颗炮弹，准备试炮。

这一天，在靶场的土丘上，架起了一门迫击炮，我站在炮旁，右手高举起炮弹，准备打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的第一炮。为了防备万一炮弹在炮筒里爆炸伤人，我让同志们伏在远远的洼地里。

我用敏捷的动作，把炮弹投入迫击炮口，一翻身滚下土丘。谁知炮弹根本就不响，它带来了可怕的沉寂。我站起来一看，同志们已跑过去，一人双手堵住炮口，一人双手抬起炮的底部，把炮弹从炮筒里倒出来。小鬼在一旁扯起嗓门唱着：

“迫击炮，真糟糕！打不响，往外倒。”

第一炮失败了。检查结果，发现炮弹直径过

大，底火药调制不好。我们的底火药是把洋硝、雄黄和锅烟子掺在一起配制的，成分没有配好，当然打不响。我们连夜重配了底火药，修正了弹带直径的尺寸。第二天早晨，又走上了靶场。

炮弹投入炮口，迫击炮大吼一声，把炮弹喷射出去。炮弹在半空里疾驰向前。大家欢呼起来。

可是，炮弹落在前面的荒草地上，静悄悄地钻在土里，像是跟我们捉迷藏一般，无声无息。长久难耐的沉寂告诉我们，它是存心不爆炸的了。第二炮又失败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失败的原因。但是炮弹钻到哪里去了呢？不把它找回来，又怎么能听取它的意见呢？谁知道它到底闹的是什么情绪！大家跑到那宽广的荒草地上，寻找这颗顽固的炮弹。太阳下了山，同志们打起灯笼火把，披开一丛丛的荒草搜寻，炮弹还是渺无踪迹。

晚上，我一直思索炮弹不炸的原因，没得到结论。鸡叫头遍，我喊醒了同志们，跑到荒草地上，继续向炮弹飞行的方向寻找。结果发现它躲在一堆乱草里，入土一尺多深。我们用锄头把它掘出来。因为信管的安全装置在发射前已经去掉，说不定它一发脾气，又要爆炸。同志们就特别小心谨慎，冒着危险把它请了回来。对这个临阵脱逃的家伙，翻来复去作了检查，才弄清楚：原来是信管里撞针的

弹簧太软，减低了撞针冲击力。

针对着毛病动了“手术”，又作第三次试验。为了避免落地不炸，又不好寻找，这次准备了三颗炮弹。

试验开始了。炮弹在草地上空呼啸着向前飞奔，它一接触地面，立即闪出火光，发出巨大的轰鸣，泥土冲向半空，伏在四周的同志们一跃而起，高声欢呼：

“再来一个！”

我又放射出第二颗炮弹，随着爆炸声又是欢呼：

“再来一个！”

第三发炮弹响过以后，同志们争先向荒草地跑去，找到三个爆炸坑，忙着量坑的直径和深度，又查点了留在弹坑里没有飞出的破片的数目，量了破片的大小。一切材料都证明炮弹的杀伤威力合乎规格，试验成功了。

当天就给军工部首长们写信，报告了炮弹试验的经过。吴师孟部长回信鼓励我们继续努力，要我们试造三百发炮弹，还说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们突破敌人的封锁，从敌占区找到一部破旧的六尺车床。这有力的支援，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边试造炮弹，一边赶造工具，准备建立炮弹车间。

一个月后，三百发炮弹出厂了。



炮弹送到司令部的第四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检修机器，军工部的小通讯员忽然一头撞进门来。他那副慌张的样子，弄得我有点不安。我忙接过信，拆开看，上面写着：

“……第一批三百发炮弹已发给部队。炮兵在演习射击时，将炮弹加足药包，只打三十公尺左右，落地还不爆炸。现在炮弹已全部退回，师长要你明天一早赶到司令部。”

信纸从手里落到地下。真惭愧，三十公尺远，还不如扔手榴弹呢！而且几乎要延误战士们执行战斗任务！我的心被这只能打三十公尺的三百发哑叭炮弹咬住了。同志们拾起信来一看，也都是面面相觑。

在失败面前，不能张皇失措，必须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我下定决心，哪怕失败一百次，也要作第一百零一次的尝试。不胜利不罢手！

我立刻收集那些制造炮弹剩下的零件，回到宿舍里，在铺板上摊开图纸，仔细检查。零件都合乎规格，图样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我又把每道工序负责加工的人和成品检查员都找来，详细询问，把制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意外都研究到了，还是没有结果。恨只恨炮弹出厂时，为什么不来一次实弹射击呢？

又是一个难耐的不眠之夜。我刚上床，又跳起

来，点起油灯，想了一阵，再躺到床上，盯着屋顶，眼睛都发酸了，还是不能入睡，好像那些打不响的炮弹直在眼前晃来晃去。最后我想到：只能打三十公尺远，也许是发射火药还没烧完，炮弹就出了炮口，不能充分发挥火药的效力。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火药厂，完全靠缴获来的火药乱七八糟凑的，什么火药都有。想到这里，心里一亮，原因多半在这里。

我披上衣服，擎着一支蜡烛，静悄悄地推开门，跑到后配殿旁边的草屋里，轻轻叫醒装配工老王。

“老王，你记得炮弹装的是什么火药吗？”

“日本鬼子的山炮弹火药。”

“上回试验炮弹用的火药呢？”

“早用完了。”

这就是了！山炮弹的火药，用来做迫击炮弹的火药，当然不行。可是不用这火药，又上哪里去找迫击炮弹的火药呢？眼看这三百发炮弹，就因为没有火药而成了废物。

回到宿舍里，火药问题还是使我不能入睡，怎样把火药的燃烧速度加高，使它成为迫击炮弹的火药呢？从化学上来改造它，我们没有制药厂，根本做不到。想来想去，觉得把火药片压得更薄一些，更小一些，可能烧得更快一些。一骨碌爬起来，又

跑去叫醒了老王，我俩一起跑到车间，点起灯来压火药。

天一亮，我带了两个技工，带了压碎了的火药和工具，赶到了司令部。

参谋长命令在靶场支上一门炮。靶场周围人山人海，大家都关心这一批炮弹的命运。

我拿起一颗炮弹，不卸掉筒管上的保险，有意不让炮弹爆炸，以免发生危险。我用力把炮弹投入炮口，只听炮筒里轻轻响了一声，炮弹无力地飞出炮口，落在二十多公尺远的田里，炮弹尾翼上的绸布药包还在空中燃烧，原来真是火药燃烧太慢。

我们立刻拆掉十个炮弹的火药管，换上自己带来的火药。炮兵同志马上又架起一门炮，我给他们每人五发炮弹，要第一炮不加药包发射。两门炮同时一声怒吼，炮弹射到五百公尺远的山坡上，发出闷雷般的爆炸声。同志们都热烈地鼓掌欢呼。

第三和第四发炮弹，各加了三用药包，在炮口巨大的吼声里，炮弹飞过对面山头，落在两千公尺外的山地里，猛烈地爆炸了。那两个炮兵同志跑过来，跟我们握手，激动地说：

“谢谢你们！这回不愁没有口粮了！”

我们迅速建立了一个炮弹车间。不但能够修理坏炮弹，还可以制造新炮弹。又在附近的村子找到一座房子，把造子弹的人员和机器分出去，建立了

一个分厂。

生活永远是紧张的战斗。一件工作完成了，新的任务接着来到了面前。当子炮和炮弹生产正在紧张的时候，上级要我们想办法制造地雷。

在游击战争中，地雷这种武器，轻便灵巧，便于使用，杀伤力很大。为了展开地雷战，上级要我们制造多样的地雷，拉火地雷，脚踏地雷，还有定时地雷。

说也好笑，当了几年兵，我还没见过地雷，不知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形状，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既叫地雷，可能是埋在地里的炸弹，也是利用爆炸的破片杀伤敌人。那末像定时地雷，究竟怎样不用人触动它，就叫它在一定的时间里起火爆炸呢？用什么装置来控制起火时间呢？想来想去，得不到答案。如果按照炮弹延期信管的原理，把引火线加长，计算好时间，燃着了埋进土里，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地雷盖上泥土以后，里面断绝了空气，引火线就要熄灭。我们试着把一小段封闭的铁管，压进空气，再使空气慢慢地泄漏，来延长地雷的发火时间，还是失败了。

有一夜，我在屋里翻书，想找到一些线索。熬到半夜，眼睛也睁不开了，睡吧，又睡不着。竹林里的土獾子，也不知忙些什么，来回奔跑，弄得枯竹叶习习作响，惹人发烦。我熄了灯，走到院子

里。

夜很黑，很安静。只见西屋里有一星星火亮，那是警卫同志点的香火，用它标志值班的时间。我忽然联想起人类历史上的许多记时方法。我们的祖先利用过竹竿的影子来记时，后来发展到铜壶滴漏。用滴水的方法可以定时，可是又怎样使地雷爆炸呢？这就不得不借用电力了。

我用马口铁做了一个圆形水壶，壶底装了个放水的小开关，壶里注满水，水面浮着一块圆形木板，在木板中心装一根小木杆，上面刻着每十分钟的刻度。木杆夹着一个可以移动的电极，壶盖中心挖一个孔，使木杆可以上下活动，铁盖上也固定安一个电极。放开壶底的水开关，壶里的水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浮在水面上的木板和木杆逐渐下沉，两个电极一碰头，地雷就爆炸了。

问题还没有完，电力可以用手电筒用的那种干电池，但是电雷管又怎样解决呢？这起火的电雷管是要用钨丝做成的，根据地买不到钨丝，最后还是想到手电筒上。拧下一颗手电筒的小灯泡，用砂纸在灯泡的玻璃上轻轻地磨损一个小洞，填进火药，再用纸糊住，一过电，红热的钨丝就把火药点着了。

我们进一步作了实验。同志们搬出一颗迫击炮弹的空壳，里面装满了炸药，拧上了用电灯泡做的

电雷管，把铁壶灌满水，电线全接通，然后把炮弹埋在大庙前的旷场上。一切都跟我们安排的一样，在规定时刻，埋在土里的炮弹爆炸了，定时地雷成功了。

不过，经过多次的实验，暴露了滴水装置的弱点：爆炸时间往往不十分准确，有时靠前，有时靠后。这主要是因为水滴的大小难以调节。最后，大家动脑筋，想法采用了现代的记时方法，按照钟表的机构，用发条齿轮装置代替了滴水装置。虽然制造要复杂一些，定时地雷却达到了准时爆炸的要求。

脚踏地雷的设计，同样是用电起火的。它的优点是一踩就炸，更机动些。

拉火地雷，可以由人选择时机。最初设计时，只是根据步枪撞针的装置，来设计地雷的发火机构，里面有弹簧、钢珠和许多零件。为了检验设计是否正确，我带着草图走进了钳工车间，照图样制造。钳工老高在旁边看我锉一根撞针，随口问道：

“老吴，你在试验拉火地雷吗？是不是像手榴弹那样一拉弦就炸？”

我连忙放下锉刀，琢磨着老高的话。是啊！如果按照我自己那种复杂的设计，机件多，需要的材料也多，也要多费工时，如果按手榴弹发火的装置设计，既不影响质量，也可以大量生产了。我根据

老高的启示，彻底修改了设计。

从此，我们炮弹厂同时生产各种地雷了。

铜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材料，炮弹和地雷的引信都需要用铜来制造。根据地没有铜矿，也没有炼铜厂。材料科的同志们终日为它发愁，唯一的来源只有四处收集破烂铜器，供应工厂的需要。

引信的加工，一向是沿袭着老法子，先将碎铜熔化，铸成铜棍，再用车床来加工。一百斤铜棍约有五十斤的铜被切削成了铜末，简直是浪费。

如果能制造一副钢模，把融化了的铜水浇入模型里，倒出来，再一加工，就是成品。这样不仅节省了原料，也大大地缩短了引信生产的过程，赢得了时间，更腾出了车床来造炮弹。

我们在庄子后的河沟旁，建立了一座新的压铸车间，进行新生产方法的试验。可是没有坩埚，开不了工。化铜要有坩埚，早先在战场上打扫来的敌人的钢炮弹，全都当坩埚用完了。

我们学补锅匠的办法，买来造坩埚的粘土，造了一个小坩埚。同志们使劲地拉动着风箱，熔铜炉喷出了熊熊的烈火。我把新造的坩埚放在炉火中间，刚一转身，坩埚炸得粉碎。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坩埚，结果都一样。

我们立刻开“炉前会”，研究原因，都认为新的坩埚没有先烤干，一放到炉火上，干燥太快，里

面的水分化成蒸汽，就爆炸了。

我们又开始了试验。坩埚烧得通红，在烈火上支持了十分钟，同志们都会心地微笑了。我拿起铁钳把一块块碎铜添进坩埚里。风箱越拉越快，蓝色火焰从炉中升起，车间里飘浮着柳絮样的白色氧化铜末。金黄色的铜液，已经熔满了半坩埚，忽然又是一声爆炸，铜水向四方喷射，拉风箱同志的头被烫伤了，几小点铜水喷上了我的右手背。铜水流下了炉底，把炉桥也凝结了。我们停了火，修好熔炉，继续再干。一连几次，都失败了。

我们得到的粘土原料都是劣质的，没有造坩埚的石墨粉，只好用捣碎了的焦炭粉末来代替。这也是失败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各种知识。书本上也没有介绍土造坩埚的办法。后来有人提醒：补锅匠的坩埚是怎样造出来的呢？为什么不拜他做老师呢？对！就这么办。

清早，我拿了区长的介绍信，跑去把一位老补锅匠请到车间里来。老师傅细心地察看了我们做的坩埚，察看了造坩埚的原料，他拿起粘土仔细看看，摇了摇头。他带领我们管材料的同志，去买来另一种灰黑色的硬得像石块的粘土，他不用焦炭粉，在炭渣里找了一些没烧尽的炭块，把粘土和炭块捣碎，动手造了个坩埚。最后他烧了些木柴和树枝，慢慢地把坩埚烤干。



同志们留心地观察老师傅熔铜时的一举一动，看他怎样安置坩埚，看他怎样加料，看他怎样调节炉火。老师傅若无其事地操作着。我们把铁勺伸进了坩埚里，盛起了铜水，注进钢模，压铸成一个又一个引信体。试验成功了。我们学会了老师傅的手艺，保证了压铸车间按照新方法顺利生产。

敌人的扫荡更加频繁了，我们的地雷也日夜不停地大量制造出来。抗日根据地里到处布下了地雷阵，遍地是雷，叫敌人无处立脚。上级办了地雷干部训练班，要我去上课，同时照顾工厂生产。每天我骑着匹快马来回跑。

罗师长派人在上海买了一部《现代工厂实习法》，送给我作为奖励，要我好好学习。在书的第一页上，师长亲笔写着：

“只有把科学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我时时刻刻记着这亲切的教导，督促自己。人民要革命，就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和敌人斗争。虽然，在科学的领域里，我还几乎是个一无所知的小学生，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为了战斗的需要，我将不畏挫折，老实地虚心学习，努力掌握科学知识，一步步摸索前进。

## 制造枪榴弹

工厂天天扩大，人员也天天增加。可是我心里却越来越觉得焦急。我感到：党不仅要培养我成为一个精通业务的技术工作者，而且要培养我成为一个具有革命理论政治工作者。为了进一步提高，符合党的要求，我请求调我到司令部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厂工作。政治委员批准了我的要求，要我等候通知。

恰好秦永祥调到淮南来了。吴师孟部长通知我，上级决定调我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委派秦永祥担任厂长。

一九四一年苏北秋季大扫荡后，秦永祥被分配到三师军工部工作。敌人安下许多据点，反复“清剿”，兵工厂天天拖着机器打游击，无法生产，后来他们把机器、材料、熔铁炉拉上大帆船，就在船仓里安装上机器，建立了机械加工车间和铸造车间，组成了一支海上流动兵工厂。煮饭是海水，喝的也是海水。同志们的嘴都烧烂了。海上生活，严重地摧毁了秦永祥的健康，他时常吐血，晕倒在机

器旁边。疾病把他赶上了海岸。我连夜办完交代。

老秦说：

“延安，这是革命的圣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能去那里学习，真是太幸福了！”

“只是一见面又要离开，有些舍不得。老秦！你要注意身体，不要拖垮了。……”

“现在才应该加倍工作呢！要不然，鼻子往上一翘，想工作也不行了。”

我感觉得到他那颗战士的心的跳动。他还像过去一样，有着饱满的战斗精神。

第二天一早，我告别了同志们，老秦一直送出大门，我们又紧紧握手，互相嘱咐珍重。

大雪盖遍了田野和村落。我冒着北风，赶到司令部周参谋长说：

“来的正好，赶快到供给部换便衣，准备出发吧。”

我拿上介绍信，跑出大门，恰好罗炳辉师长刚从连队里回来，正站在台阶上掸雪，看见我匆匆忙忙往外跑，一把拦住我问道：

“运铎同志，上哪那去啊？”

“到供给部换便衣。”

“干什么？”罗师长奇怪地问。

“到延安学习。”

“啊！是这么回事。来谈谈吧。”罗师长拉着

我走进了他的住室。

我一向非常敬爱罗师长。这位人民英雄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母都是被地主老财害死的。一九三九年秋末，他领着队伍到了敌后战场。第一仗，在来安城烧死了上千的日本鬼子，从此在淮南扎下大营。人民都称呼他“我们的罗司令”，也有说他是天神下凡的。看外表，他那魁伟的身体，也的确像金刚一样威武。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也是战士们和老乡们亲切的朋友。他常常叫我去他那里去玩，讲一讲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也谈一谈个人的工作和学习问题。临走照例送一点礼物，像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用具啦，装烟用的皮口袋啦等等。有一次，他找了半天，没有东西可送，就跑到小菜园子里，把自己种的蕃茄摘下一个最大的送我。他种的蕃茄，总比我们收的多，长的大。

罗师长让我坐下，像往日一样，亲切地和我谈话。

“运铎同志，学习是很重要的，不过现在战斗很紧张，还有重要任务交给你。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暂时不走好不好？”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既然工作需要我留下，就继续在工作中学习吧。”

罗师长满意地笑了。他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着，一边给我分析形势。罗师长再三地说：对待敌

人，就应该狠，狠到连它的骨头都给敲碎，叫它永远爬不起来。我们现在就需要有各种各样能敲碎敌人骨头的武器。

“你看能不能想出办法来？”他微笑着问。

罗师长的话给了我很大启示，我提出保证：

“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罗师长送我到门外，还嘱咐我：

“要有信心，要顽强。回去跟大家商量商量吧！”

我接受了研究新武器的任务回到工厂。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材料，没有机器。光凭主观去想，就是想得再好一些，把图样画好了，也是没用。有了材料，没有工具也不行。所以第一件事是找材料，研究工具，然后根据这些进行设计。

年老的老乡们说，以前国民党打着“治淮”的幌子，说是要在洪泽湖附近造水闸，运来一批铁棍，后来国民党官僚捞满腰包就跑了，水闸没造成，铁棍也没影子了。听到这个消息，军工部材料料全体动员，整天沿着湖岸寻找，扒雪堆，挖土丘，坑坑洼洼都找遍了，最后在湖边一堆腐烂的苇子里，把那批铁棍掘了出来。铁棍有好几百根，每根三吋多粗。大家就像发现了金矿，高兴得很，马上套上大骡子，全驮回来了。

究竟拿这些材料造个什么东西呢？凭空研究一种武器，是不容易的。我把能找到的书都搬了出来，翻来翻去，在一本旧杂志上翻到一篇介绍枪榴弹的文章。说也可怜，那篇文章总共不过二三百字，而且多半是空话，无非讲枪榴弹如何如何厉害之类。唯一的收获，是从这里知道了所谓枪榴弹，就是利用步枪发射一个小型炮弹。至于它的构造，只说是用钢片制成的小炮弹。

我收集了敌人的掷弹筒弹和各种迫击炮弹，终日伏在桌子上研究。最后决定把粗铁棍锯断掏空，制成枪榴弹，像装刺刀那样套在步枪口部；再用铸铁造成形状像迫击炮弹一样的炮弹，装在筒里，利用没有弹头的步枪子弹的火药气体，把筒里的枪榴弹发射出去。

我拿着草图找老秦一块商量，对每一部分都作了详细的研究。车间的工人们也纷纷围拢来，探听新武器的消息。钳工老高拿起枪榴弹筒底座的草图，仔细端详着。他提议把底座柄和底分开，成为两个零件，这样能节省材料，加工方便，可以大量生产。

同志们积极的支持，给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大家要我尽快把制造图纸交给他们。

忽然木型车间的小丁，挤到我面前说：

“你这玩意行吗？一颗小子弹，要把那么大炸

弹轰出去，准是落在自己面前，没打到敌人，反而炸坏了自己！”

这个年轻小伙子平时说干就干，搞到劲头上，拦都拦不住怎么忽然畏首畏尾起来了？我正在寻思，小丁拍着我的肩膀说：

“咱俩打个赌吧！要是成功了，我输给你一只老母鸡。”

在抗日根据地里，大家的生活非常艰苦，平日吃肉都难得，没有很大喜事更吃不了鸡。我心里明白，小丁要打赌，是激我快点把枪榴弹制造成功。他使用的是“激将法”我回答说：

“好！你先买好母鸡等着吧。”

根据草图和大家的意见，我作了最后的设计。第一个难题是计算枪榴弹筒内火药的压力。这需要高等数学知识。我只学过分数和体积，别的全不懂，只好现作实验，先做个筒子，量好直径，打一枪，再量一量，看它胀了多少，不行，再改一改。射程距离的调节也是一个难题。怎样叫它远它就远、叫它近就近呢？我想用调节枪膛压力大小的办法来调节枪榴弹的射程：膛内压力加大，枪榴弹就可以射远；减低压力，枪榴弹就可以射得近。可是要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机械装置才行呢？我跑到车间去和大家商量，根据大家的意见，按照调节车床速度的道理来设计。

天气渐渐暖和了。柳树枝头已经绽出了鹅黄色的嫩芽。设计工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我日夜忙着绘图，忙着去机器旁作实验。当感到过度疲倦的时候，就跨上小红马在田野上奔驰，让脑子被风吹得清爽些。整个的心都被图样钉住了，吃饭，睡眠，似乎都成了多余的负担。晌午，勤务员小顺子轻轻地推开门，把饭菜放在桌上，倒了一碗开水。到天黑，小顺子送来晚饭，桌上的饭菜还一点没动，筷子整整齐齐地摆在一旁，小顺子噘起了小嘴，用手掩着图纸，抱怨起来：

“厂长，你怎么老不吃饭啊，只顾你完成任务，我的任务就完不成啦！”

“对不起，小顺子，现在‘做总结’吧！”

他一直站在旁边看我吃完，才收拾起碗筷，笑眯眯地走了。

装配车间的女同志和那些家属大嫂们，一下班就去找小顺子问我换衣服没有，要不就跑进屋来翻床底，寻找要洗的衣物。她们还送些零食给我晚上吃。

一种对事业的共同责任感，一种阶级的友谊，把大家的心都联结在一起了。大家的心都在为一个目的跳动，共同分担苦恼，共同分享快乐。

图纸交到各个车间，同志们抢着干。半个月后，第一批枪榴弹和第一支枪榴筒造成了。谁都想



尽力把自己的创作做得更漂亮一些，还在枪榴筒上镀了一层蓝黑色的电光。

春天说来就来了。工厂后边的荒地上铺上一层新绿。警卫连的战士们在荒地四周布置了岗哨，不让行人走进射击地区，我们的枪榴弹第一次举行实弹射击。

小顺子扛着枪榴筒，跟着我走到靶场上。谁也猜想不到这第一枪是什么结果，也许打不响，也许枪榴弹在枪榴筒里就炸。为了避免意外事故，我在一个干水塘岸上，选中一棵大柳树，用绳子把步枪捆在树干上，枪口卡上了枪榴筒，筒口正对着荒地；再把枪榴弹装进枪榴筒里，拉开枪栓，推进了无头子弹，扳机上系一根小绳子。等同志们隐蔽好了以后，我趴在干水塘里，一拉小绳子，轰隆一声，枪榴弹射了出去，火光一闪，在爆炸中，尘土卷着黑烟向上冲起，破片呼啸着四散，惊得野兔子在荒地上直打转。

听见第一个枪榴弹的爆炸声，正像母亲听见自己的胎儿坠地后的哭声一样，那种喜悦，那种激动，是无法形容的。可是我也看见，枪榴弹在空中飞行时，摇摇摆摆地极不稳定，这就要减低命中效率。同时测量了射程，只打到二百二十公尺。这样的射程不值得满足，不应该是最后的结论。对我们来说，任何成果都永远不是最后的。

我重新设计一个枪榴弹图样。把弹体的弧线加大，减少空气阻力，把枪榴弹重心再往尾部转移。经过试验，枪榴弹能够一直向前奔驰，不摆动了。可是射程总不过二百三十四公尺。

枪榴筒和枪榴弹的各部分，都做过仔细的考查，没有毛病，剩下来的就是发射用的无头子弹，一定又和以前试验迫击炮弹一样，问题出在无烟火药上。

我把意见告诉老秦，他也同意这个看法。我俩找着装配车间的老马，一块儿把火药研成碎末，又混合了另一种火药，使它燃烧加快，接连装好了几个子弹，再去打靶。

我装好枪榴弹，推上子弹，蹲在地上，朝荒地打了一枪，只听一声响，枪榴弹没影了。它跑到哪儿去了呢？同志们都昂起头向远处张望，忽然荒地那边传来低沉的爆炸声。大家低着头向前奔去。

打开皮尺一量，射程五百四十公尺，增加了一倍多。

同志们一路兴高采烈地谈笑着，还哼起了小调。

这些日子，我一直忙着搞枪榴弹，司令部几次来信了解情况。现在可以作一详细的汇报了。第二天，我带了两个同志，扛着枪榴筒，挑着枪榴弹到司令部去。

参谋长看过枪榴筒，招呼我们坐下，拿起电话筒，命令立刻布置靶场。师长、政治委员、参谋长都去了。一连打了十几发枪榴弹，个个都炸得很漂亮。

试验完了，罗师长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参谋长的办公室。参谋长问道：

“你们一个月能生产多少？”

怎么回答呢？我们只有一部车床，每个月要制造三百发迫击炮弹，其他机器只能造子弹，没有别的生产工具。参谋长看见我有些迟疑，就问：

“有什么困难吗？”

罗师长也关注地等着回答。我觉得叫苦不好，战士的荣誉感也鼓舞着我们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我回答首长：

“困难不少。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

参谋长又拿起枪榴弹筒，提出许多重要的改进意见。我们根据指示，又使生产时间缩短了许多，射程提高到七百多公尺。

由于精兵简政，军工部缩小编制，改为军工科。在这以前，吴师孟部长因为积劳成病，不幸去世了。司令部派我担任科长。

当时，淮南根据地已经有了四个兵工厂，都由军工科领导。责任是更加重大了。除了技术工作，还要处理很多行政事务、财务支出、材料采购等等

问题。但是最挂心的还是枪榴弹。我住到工厂里去，一边布置各厂的生产，一边计划枪榴弹和枪榴筒的生产。我们设计了制造枪榴筒的机器，造了几部制造枪榴弹的小车床。在大殿上又建立了一个新的车间。

我们制造的枪榴筒和枪榴弹，很快出现在前方。

枪榴弹第一次立功，是在边境的桂子山上。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战士用枪榴弹打死了八十多个日本鬼子。指挥战斗的成钧旅长，特地把一支从鬼子军官身上缴获的手枪送给我，作为制造枪榴弹的奖励。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战斗的季节。稻子熟了，遍地是金黄色的谷穗。搞群众工作的同志们动员老乡们快收、快打、快藏。民兵们武装起来，布置了一道道的了望哨。工厂的工人也组织了收割队，轮流帮老乡抢秋。

一大队鬼子和汉奸伪军，到我们的来安县来抢粮。这地方周围是山，鬼子到了半山腰，坐在山洼里休息，命令伪军打头阵。那些伪军刚翻过山梁，我们的枪榴弹就像雨点一般飞过去。战士和民兵们的射击技术还不够熟练，枪榴弹全飞远了，没有打着伪军，可是，正好落在山梁后边鬼子休息的地方，一下子打死十几个。鬼子拖着死尸，拔腿就跑。伪军们见势头不好，也跟在后面跑了。

## 拆定时炸弹

我们的材料始终很缺乏。炮弹的发射火药和炸药，多半是从没爆炸的敌人的炮弹和炸弹中挖出来的，钢是主要材料之一，多半靠民兵们破路，去拆钢轨、道钉、夹板，工厂拿手榴弹和地雷作交换。车间里的铁锤、钢凿、锉刀，车床上的旋刀，造子弹的钢模子，都是用钢轨做的。许多同志化了装，冒着生命危险，挑了担子到敌人占领的城市里，替人修补锅碗，收集破铜，凑齐一担子就送回根据地来。有的材料不容易搞到，就不得不花巨大的代价。像翻砂用的红砂土，需要数量很多，敌人控制得很紧，只好派战斗部队强攻敌人的据点，夺取些过来。还有些同志化装成难民、商人、小贩，跑到上海、南京去，收买破机器，拆卸开来，分别坐着小船、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弄回根据地来。往往要好几部破机器，才凑成一部能用的。也有不少同志被敌人查出，有的被杀害了，有的被关进了监牢。我们的兵工厂，就是在许许多多同志舍生忘我的劳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材料越来越少了，同志们就寻找代用品。做炮

弹引信用的铜，一向最缺乏。用钢来造倒可以，就是没条件大量生产！收集来的破锡壶、锡蜡烛台，是一种柔软金属，不能做引信。我们打算用铅来代替铜。没有炸药，就用自造的黑色火药。这种火药做鞭炮倒挺好，但不知道能不能引起炮弹剧烈爆炸。我们决定试试看。

同志们把炮弹里填满了黑色火药，装上铅引信，在荒地上架好了迫击炮。炮弹打炮筒里轰出去，落在远处的洼地里，只听见轻微地响了一声，这炮弹突然又从地里射到空中，尾巴向前，迎着我们飞来。

十多个参加试验的人，丢下迫击炮，拔腿就跑，炮弹紧紧在后面追赶。

炮弹掉在炮座旁边的草地上。同志们都惊呆了，奇怪，射出去的炮弹怎么会回来呢？

等了一阵，炮弹没爆炸，也没有再蹦起来的意思。我们跑到炮弹跟前，只见那炮弹躺在地上，还是完整的，摸一摸，挺烫手。只是信管已经被火药气体冲掉，炮弹头上露出安装信管的一个大圆口，炮弹里的黑色火药全部燃烧完了。

炮弹究竟怎样回来的呢？原来当炮弹从高空下坠，钻进潮湿的土地以后，土地就成了一支火箭弹筒。信管发火后，引起炮弹里黑色火药的燃烧，立刻把这软金属做的信管打掉了，露出一个圆洞，这

样就形成了火箭弹的喷口。炮弹里的黑火药压得太紧，不能迅速烧完，它就只得继续燃烧，火药气体的激流冲出喷口，打击空气，把迫击炮弹变成火箭弹，利用反冲力推动炮弹仍旧照路回来。

这次试验失败了。铅不能用，我们就用铸铁来制信管，没有发射药，就派人到敌占区去收买废电影片，当无烟火药原料。

炸药成了珍宝。敌人进攻时，工厂的同志宁愿撤下自己的背包，也要抬着火药转移。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一部分工人陷入包围。一个火药箱被敌人枪弹打中，火药爆炸了，烧伤了两个同志。大家抬着负伤的同志和其余的火药箱，终于突围出来。

敌人的封锁越来越紧，战斗任务越来越多，弹药的需要就更加迫切了。没有材料，炮弹造不成，同志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我专心实验材料，却一直没有很好效果。

但是，有一次，我们意外地获得了大批材料。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用上了我国西南部一些基地，有时派飞机到日本占领区轰炸。在一个秋天的深夜里，月亮没出来，只有星星在黑暗的空中闪烁着。天空响起了轰炸机马达沉重的声音，震得茅屋直抖。我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只见美国“空中堡垒”的巨大黑影闪着红绿信号灯，

七  
代号13-1

向南边飞去。不一会，觉得脚下有一阵轻微的震动。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司令部得到报告，在仪扬区（仪征和扬州两县交界地区）发现了八颗炸弹，都没有炸。参谋长马上打电话给军工科，叫我赶快去想法挖炸药。

我得到命令，心里很高兴，正缺材料，材料送上门来了。洗了手，找了三个同志，带了拆炸弹的工具，跨上四匹快马，飞箭样地向仪扬边境奔去。

我们刚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电话铃就响了。

我接过听筒，远处传来参谋长亲切的声音：

“你是吴运铎同志吗？我刚才忘了嘱咐你：你现在只剩下一只手，千万要当心！如果有困难，你们就回来不要冒险。”

我心里一热，身上长了勇气。我说：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有人说，搞兵工是和死亡为邻，弄信管更是老虎嘴下拔毛，早晚会给吃掉。但事实并不如此。兵工是一门科学，只要摸清它的规律，控制住它，就能把发生危险的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尽管我们的科学知识可怜得很，时感到不够应付，可是由于战斗的要求，我们总是勇敢地迎上去，边学边做，精通它，征服它。

在战斗岗位上，战士的脑子里，想到的只有胜



利，没有死亡。

到了落炸弹的地点，区政府已经动员了好几百人在挖炸弹，只见满山坡的农民们，正忙着挖土挑土，驻军司令部派了一个连的战士，在四周警卫。炸弹钻到土里两丈来深，一直挖到吃过晌午饭，才看见炸弹。

这样大的炸弹，我是第一次看见，竖起来比我还高。大概是日本鬼子的战斗机追得紧，美国“空中堡垒”为了快跑，半路甩下来的。

炸弹的半个面露出来了，不能继续往下挖了。炸弹上装有引火的信管，这东西是危险的祸根，炸弹挂在飞机上是有安全装置的，可是，炸弹一旦脱离了飞机，就断掉了安全装置，变成了武装状态。而且炸弹从高空落下来，信管里而的机件已经受到剧烈的震动，机件的组织变了形，再受到一点碰撞或是磨擦，就会爆炸。这八颗炸弹都紧靠着，要是有一个爆炸，其余的受到爆炸波的感应，也会一起爆炸。如果这八颗炸弹都爆炸了，这一带的村庄就会全部毁灭，人民的生命财产将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

现在，第一着就是先拔掉信管，否则不可能取出炸药。拔信管是拆炸弹最危险的一个动作，偶一失手，就要发生不幸。为了避免无谓牺牲，我们动员农民们到两里地外的土坡后面去。

现场上就剩下我们同来的四个人了。这美国炸弹，从来没拔过，说不定会碰到危险，多留一个人，就可能多受一些牺牲。我对同志们说：

“你们也走吧！”

“不！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

说着他们拿起工具就向弹坑走。我忙堵住他们说：

“同志们，这完全没必要，让我先去了解一下构造，你们再去。”

他们三人想了想，才离开了。

我顺着新挖开的斜坡走下弹坑，拨开炸弹头部和尾部的浮土，看到炸弹头尾都有一个引信，奇怪的是这引信头上，没有螺旋桨的装置，不像是碰炸的瞬发信管。心中没底，不敢动手。我蹲在炸弹旁边，又仔细看了一遍，发现信管的外壳被剧烈的震动震裂了一条缝，我拿螺丝刀插进裂缝，撬开一看，里面的构造十分复杂，像钟表一样，有发条，有大大小小的齿轮，还有许多钢珠，原来是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是怎么一个东西，我是清楚的，说不定两三天以后才炸，也说不定立刻就炸。这样的美国炸弹我是第一次遇到，摸不清它的底细。我一只腿跪在地上，双手轻轻地转动信管，往外一拔，信管一动不动，里面似乎联结着什么东西。忽然，

我的心怦怦乱跳，眼看着这巨大的炸弹，好像立刻就要爆炸，我立刻就要粉身碎骨了。两条腿不知不觉地，从弹坑里往外走。

刚到洞口，一阵凉风吹来，头脑清醒了，对自己这种举动奇怪起来：炸弹在坑里，你跑上来干什么？怕死吗？

如果我不拆，就得别的同志来拆，不是同样也会碰到危险吗？临阵脱逃，不仅是怯懦，而且是卑鄙。死又有什么可怕？任何工作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它不过是一种重大的代价就是了。许多同志因为战斗需要，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严重考验的时刻，我怎能迟疑不前？活着就要完成任务，死了就算革命到底！在这一刹那，一切恐惧，一切慌乱都消失了，我又恢复了镇静，充满了信心。

我拿着工具，回到炸弹坑里。右手紧紧握住了巨大的信管，心想：要炸你就炸吧！牙一咬，眼一闭，一使劲，从炸弹上拔出了比迫击炮弹还大的一个信管，却没有爆炸。原来刚才拔它不动，是因为一时慌张，不敢使劲。我把它放在一边，又把弹尾上的信管也卸下来，一手抱一个，爬出了弹坑，跑到山脚下，把它们放在凹地里。这一下，大炸弹的爪牙全敲掉了，它就神气不起来了。

我迅速地跑回弹坑，一个连着一个，花了四个

多钟头，把那七颗炸弹上的信管全部拆掉了。我跑上土堆，两手挽成了喇叭筒，高兴地喊道：

“快来啊！快来拖炸弹呀！”

大家跑来了，忙着用粗绳子捆住大炸弹，几十个人拉一颗，把八颗炸弹都拖到平地上来。我先从弹口轻轻取出一小块裂开的炸药，放在石头上，用锤子猛击几下，没有爆炸，接着四个人一齐动手，取出了八个大弹壳里的炸药，有七百多斤。

天色黄昏，当地区政府和驻军战士借来了麻袋装炸药，借来了毛驴驮运，动员了民工抬弹壳，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回到了兵工厂。

炸药的补给暂时算是解决了。我们使用时也特别节省，一点点也舍不得浪费。材料是我们一滴血一滴汗弄来的，怎么能不加倍珍惜呢！

※

## 我们的平射炮

一九四三年夏天，在江南坚持战斗的六师兵工厂一部分同志，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了淮南。

军工科又扩大成为军工部。我担任工务科长。淮南根据地处在鬼子、汉奸军队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之下。这批国民党军队抗日消极，反共积极，他们张牙舞爪地又来进攻我们津浦路西的地区了，他们跟日本鬼子一样，沿路拆房毁屋来修筑碉堡，前锋一个团进到占鸡岗。

司令部发出紧急命令，要兵工厂立刻开始制造攻坚的平射炮，准备削平津浦路西林立的碉堡群，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

军工部当天召集了会议。决定抽调人员建立大炮制造厂，原先的迫击炮弹厂改造平射炮弹。责成我主持整个设计和制造工作。

我们有的关于兵器知识的书籍少得很，我一西贪婪地钻研书本上的知识，一面找同志们商量，结合自己造炮弹的经验，开始了设计。

大炮的主要材料是钢，我们能找到的钢料只有

钢轨，无法碾成粗大的炮筒。我想历史上不是也有过生铁大炮吗？今天我们也不妨用铁炮代替钢炮，反正不准备用它一辈子，先把敌人的碉堡削平再说。

造枪榴筒剩下的许多铁棍，还存在材料科，估计能造几十门炮。只是这铁棍不够粗，口径不能太大。这也不要紧，只要炮多，这个缺点是可以补救的。

要使炮弹能够打出去，炮筒内壁必须刻出一种凸凹的斜线，就是平常说的来复线。刻来复线的机器是一种非常精密的机器，我们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加工问题不解决，有了图样，炮也没法子造出来。

以前我们在皖南兵工厂造步枪，枪筒里的来复线是用手工方法拉出来的，可是炮筒比枪筒粗好几倍，“拉”是不行了。记得有一次，罗克绳偶然谈到造来复线还可以“挤”，倒可以试一试。

这炮筒的来复线二十多吋长才转一周，怎么挤呢？我想：如果做一个橄榄形的钢柱，在钢柱圆周刻上凸凹斜线，把这钢柱硬楔入炮筒，也许就能挤出和钢柱上螺旋形一样的来复线。

究竟行不行，只有通过实验才能证明。我马上绘了一张简单的钢模图样，交到车间去。

同志们立刻动工，根据图纸制造了炮筒、钢模

和钢垫片。钳工在钢模上忙着刻凸凹的精细线条。晚饭时间早过去了，可是没有人去吃饭。炊事员焦急地跑到车间门口，拼命吹哨子，谁也不理他。八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拖着车间里的全部机床飞快地旋转。同志们满头大汗，越干越起劲。那时候是战争环境，一粒子弹，一个炮弹，都是和敌人作生死斗争的力量，因此突击成了我们经常的工作方法；再加上制造大炮又是头一回，小伙子们干劲一上来，滚油也泼不开，直到把活干全，才肯放手。

夜来了，大院里点起了明亮的汽灯，院子中间放好铁砧，同志们把炮筒竖在铁砧上，把钢模插进炮筒口，四周注上润滑油，同志们抡起大锤，把钢模打进炮筒，接着把钢垫垫在钢模上面，继续往下打。所有的钢垫全打进去，那钢模被压挤着通过炮筒，从另一端钻出来了。把筒子里油污洗净，抬起炮筒来对着灯光一照，里面的来复线又光又滑，跟我们要求的一样。

半个月来，连日带夜地赶着设计图样，左眼又红肿起来了，我点上眼药，扎起手帕，继续工作。

造炮弹没有钢料，就和枪榴弹一样，用铸铁来做。最后还缺少容纳发射火药的炮弹铜壳，别说我们没有铜，就是有，也没有制造铜壳的机器。我又回想了一遍大炮的发展史，开始人们不也是没有弹壳的炮弹吗？那现在为什么不可以不用铜壳呢？我

们可以用绸子缝成火药包，来代替铜壳。再用黄杨木做成炮轮，周围包上铁箍；把小铁轨锯断，用螺丝钉联接起来做成炮架，这样，大炮的设计算是初步完成了。

图纸完全送出以后，我感到一阵阵头晕，两眼疼痛难忍，浑身绵软无力，就倒在工作台上了。

医生给我吃了药，又上了眼药，同志们扶着我躺下。

第二天，我还是跑到炮厂帮助造炮。

没几天，实验炮造好了。在厂外荒坡上，筑起一座高大的土墙，离土墙三百多公尺远的地方，筑了一道濠沟，架起我们自己造的第一门大炮。第一发炮弹没装炸药和发射药包，把四尺多厚的土墙穿了一个对通的大洞。第二发用真炮弹打出去，土墙被揭去了一半。又打了几发，土墙站立不住，全倒坍了。

参谋长特地从几十里路以外赶来参加试炮，提出许多改进的意见。这天晚上，又开会总结造炮的经验。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参谋长的指示，改正了草图，制出了正式的大炮图样。炮弹厂的同志们也改进了生产方法，制造了铁模型代替翻砂，来嵌装弹带，又用铁模子铸造引信的毛坯，减少了材料的耗费，提高了产品的数量。

到秋天，我们造成了三十六门平射炮和大批炮



弹。

战士们团团围住占鸡岗，所有的大炮对准顽军的大碉堡。顽军团长蒙佩琼在碉堡里狂妄地叫唤：

“新四军！你们没炮打什么仗！赶快回去吧！瞧我的钢炮……”

蒙佩琼的喊话声没停，轰的一声，第一颗炮弹钻进了碉堡。他又喊道：

“共产党只有三颗炮弹，再打两颗就完事了！”

我们三十六门大炮一齐怒吼了。疾风暴雨般的炮弹从四面钻进了碉堡，尘土迷漫半天，眼看那高大的碉堡坍塌了。顽军另一个营慌忙赶来增援，战士们冲上去，展开了肉搏，顽军只得举枪投降。

我们的战士在顽军死尸堆里找了半天，没找到那个蒙佩琼。有个俘虏兵做了一个手势，嘴巴向地下一噉。战士们赶快拖开尸首，刨开乱砖碎石，下边是一块大石板，掀开一看，这个反共的少将团长仰脸朝天，躺在碉堡底下的水沟里。战士们拿枪一指，吓得他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说：“别打别打，我出来！”

占鸡岗战斗结束不久，日本鬼子发动了“扫荡”。初冬的雨点夹着碎雪粒落个不停，兵工厂开始了紧张的备战，同志们抬着笨重的机器和材料，踏着烂泥，隐藏好机器。在工厂的四周埋满了地

雷。我正忙着屋里清理文件，忽然走进来一个老百姓的新媳妇，头后挽起一个髻，花衣花裤花鞋。仔细一看，原来是炮弹厂火药装配工人陆平。

她也是六师来的，平常有空，常找我谈天。有病时，她也照顾过我。现在开始反“扫荡”为了随时掌握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她到敌占区建立秘密联络站，传递情报。这几年来，在六师，在二师，陆平常常担任这个工作。

“怎么啦？你又要回娘家？”

“你看像不像？”她没理我的问话，只咧着嘴笑。“我特地来看看你，一打仗，就见不着了，这一阵子你身体太坏，可要当心，别搞垮了。知道吗？”

看着她那一本正经的“老大姐”派头，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以后，我们就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了。反“扫荡”结束，她随着炮弹厂迁到盱眙的一个山洼里，彼此相距七十里。但是她那短小结实的影子，却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

听说她老家在扬中的一个村子里，父亲是贫农，全部家当就是两间茅草棚子，在一九四二年秋天鬼子“扫荡”时，也被一把火烧光了。一家人落得无家可归。她被迫寄住在姨母家里，最后下了决心，包了两件衣服，瞒着年老的父母，参加了丹北

人民抗日游击队。

她小时候读过五年书，入伍后，被分配到文工团工作，不久参加了党。文工团转到江南以后，她被调到六师军工部火药厂当工人。后来来到二师。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个好同志，一个勤劳的女工，一个真诚的朋友。以前和她在一起，也不觉得怎样，现在一离开，像是生活里缺少了什么东西。这究竟有什么原因呢？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军工部长。他笑着说：

“原来是这样。我来做媒吧！”

我慌起来了。

“这太莽撞吧？如果她没有这种感觉，就太不好意思了！”

“你的顾虑真多！”部长笑了。

在我炸瞎左眼、炸坏左手以后，同志们都非常关怀我的个人生活，希望我结婚。可是我想，如果仅仅是为自己生活起居有人照顾，找一个爱人，那太自私了。一个战士，对待工作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应当一致。没有理由让别人背包袱。

这时候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上，苏联已经向德国法西斯展开了全面进攻。在国内，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积极准备对日本侵略者实行反攻。我们的炮厂也在继

续扩大，只是大炮还不能满足战斗需要，必须继续改进，增强它的威力。

我们作了分工。我负责加大炮的口径，秦永祥负责改进炮弹，用钢制造，信管也要改为自动化的。当时，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争取最后胜利这个目标上。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老秦坐在工作台前，把一个日本信管拆开研究，引起了剧烈的爆炸，一块无情的爆片，割断了他的咽喉。等同志们赶到，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老秦的牺牲使我非常难过，也更督促我要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好。我骑着马跑到前方，实地查看大炮的杀伤力，又跟战士们开座谈会，了解他们对大炮的要求。我在部队住了几天，帮他们组织了一个随军行动的流动修械厂。临动身时。部队派了一个骑兵班护送我到炮弹厂。

刚走进工厂的院子，一群女工就把我包围了。

“哎呀，老吴同志，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我正在猜测她们话里的意思。女工同志们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弄得我更加莫名其妙了。

新任厂长出来了，把我拉到屋里，谈了一阵提高炮弹威力的问题。后来我问：

“你们这里出了什么事？”

“她昨天已经出院了。”厂长没头没脑地说，

接着才解释道：“陆平受伤了，起火管把她的胸部、腹部炸伤了。……你去看看她吧！”

我忙着跑出屋子，刚一出门，就碰见她。

“我来看你哪！瞧见你们谈问题，不敢打搅，就在外边等你。”

我俩走出了厂门，走进了山脚的下林荫道。

“你受了伤，怎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抱怨地说。

“怕你着急呀！听说你上前方去了。”

她停下脚步，看着我，好像有句要紧的话梗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老吴，你跟部长说什么了？”她终于憋不住了。

“什么也没说啊！”我一时想不起来。

“别打埋伏了。人家都知道了，要我请客！部长来检查工作，找我谈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这才记起那次的谈话，就说：

“我是个残废，你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吗？”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为革命事业受的牺牲，我应该向你学习。”

第二天，我们就一起给师政治部写了份报告，申请结婚。

回到军工部，我又忙着设计工作，一边画图样，一边到工厂实验，把大炮口径从三十六米厘扩

大到四十二米厘。

入夏以来，淮南解放区就闹旱灾，长久不落一滴雨，烈日当空，田地裂出龟纹，禾苗都干枯得能引火了，眼望秋收将要落空。因此，军工部把各厂的生产力作了新的调整，组织了救灾队，拖着抽水机去为农民弟兄灌水。一部分同志被派到新解放的高邮，修理面粉厂机器。各工厂向军工部附近集中，炮弹厂也从盱眙搬回来，我担任了军工部副部长兼工务科长，负责领导生产。紧急的任务使我们顾不得考虑个人生活问题了，结婚的事只好延期。

中国人民殷切盼望的伟大日子来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第二天，毛主席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响亮的号召：

“由于苏联的这一行动，……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材，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要求投降，就在这一天，朱总司令命令各战区的人民解放军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

淮南解放区军民以英勇的战斗回答了党的号召。战士们向敌伪盘踞的城镇进军，我们工厂日日

夜夜赶造炮弹。工厂的院子里，搭起了两丈多高的支架，上面架上滑车，拴上一个一百多斤重的生铁疙瘩，算是“大汽锤”，再把烧红的一节节钢轨放进炮弹钢模内。“大汽锤”从两丈高的上方一起一落锤打，就制成了钢弹壳。经过长期的反复实验，大炮的射程也已经提高到八华里。在前线上，我们的大炮，抬起了头，张大了口，要消灭那些敢于拒绝投降的敌人，解放祖国神圣的土地！

## 第三次负伤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民渴望着和平生活。军工部根据群众需要，准备把一部分兵工厂改为农具工厂。但是，躲在峨嵋山的蒋介石，却妄想抢掠人民的胜利果实。一九四六年夏天，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淮南又成为炮烟弥漫的战场了。敌人拿刀，我们也拿刀。要打就打到底！在一个黑夜里，我们接到命令，所有兵工厂连夜向北转移，继续生产，供应战斗需要。

各工厂编成了战斗大队，同志们扛着步枪，挂好手榴弹，拆下机器，把材料装了箱。好几百农民携带杠子绳索来帮助搬运。

敌机结队低空盘旋，下雨一般地投掷炸弹，并追着我们的队伍扫射，照明弹布满天空，照耀得如白昼。敌人的大炮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不断在周围爆炸。同志们就在烟火中前进。

黎明前，工厂撤到南山河南岸一个村庄，离战线四十多里。我因为照料军工部撤退，最后赶到，只见树林里堆积着机器、工具和材料箱。同志们抱着枪，倒在树脚下，草堆旁，呼呼地睡着了。身上



被水浸得湿漉漉的。朝霞的光辉透进了树林，清冷  
的晨风把树叶上的露珠扫落下来，我不禁打了一个  
寒噤。

我累得眼睛也睁不开了，可是不能睡，我轻轻  
推醒一个同志：

“起来吧！天亮了！”

同志们站起来，把步枪和手榴弹挂在树枝上，  
动手整理机器，利用战斗的间隙，制造炮弹。一部  
分工人担任警戒，爬上树梢监视敌机。大家把天轴  
抬进村子，在一所较大的茅屋梁柱上架起来，各小  
组长带领组员们忙着安置机器工具。车工们在天轴  
下面排列旋床，钳工组在工作台上装置老虎钳，锻工  
组砌砖合泥，筑起锻铁炉，司机架上轻便的柴油机。  
不到吃中饭时间，工厂的机器全旋转了。

敌人疯狂地进攻，我们准备利用晚间继续撤  
退。

宽阔的南山河横在我们背后，由洪泽湖奔来的  
急流，涌进四里多宽的河道，流入高邮湖，向东南  
奔进长江。敌机封锁了河面，轮番扫射，打得河水  
直冒花。为了赢得撤退的时间，我告诉厂长，集中  
暂时不用的机器、工具和材料，连同工人家属、小  
孩和病号，先渡过大河。随又骑上马，跑去通知军  
工部材料科，带上所有的材料、工具，准备渡河。

我们派了十多个同志沿河找船。

炮声越来越近，敌人推进很快，离我们只有二十多里了。出去找船的同志们，动员了上百的农民，在河里打捞起十多只被敌机击沉的小木船，工厂的木工在树荫下加紧抢修。只等天黑，开始渡河。

傍晚，阴霾逐渐把晚霞的余辉吞没了，顿时天昏地暗，降下倾盆大雨。大雨过后，又是狂风，岸边的芦苇，被吹得茎断叶残，河水暴跳不停。大家把修好的小船放下水，装上机器、材料，渔民撑开竹篙，同志们帮着摇桨。小船没有帆，同志们用背包绳把军毯结在两根竹竿上，两个人抱一很竹竿。军毯鼓满了风，带动小船迅速地绕过沙洲，直达北岸。河那边，早就动员好老乡们等着接运了。

当夜，敌人占领了南山河下游的黎城镇，离我们工厂仅有五里地，听得见密集的枪声。工厂立即停止生产，准备撤退。

一连几日几夜不能休息，我的左眼又红肿起来，不住地淌眼泪。在这次转移中，军工部长劳累过度，旧病复发，连日吐血。指挥工厂转移的担子全放在我肩上了，我找医务员给我洗了眼睛，扎上绷带，坚持工作。

又是一整夜的抢渡，天亮，我们跟后卫部队一起，安全地渡过了南山河。

接着，敌人侵占了整个淮南。

兵工厂继续向北转移，敌机也紧跟着骚扰。一个月后，我们撤到了淮阴新四军司令部所在地，跟华中中的军工部门合并，我被调到华中军械处担任副处长，兼任华中炮弹厂厂长。

敌人疯狂的向北侵犯，战争的中心移到了两淮（淮阴、淮安）。我们接到命令，带领兵工厂转移到山东的沂蒙山区。

工厂又忙着拆机器、装材料。从车间里铺设了一条临时铁道，通到射阳湖的岸边，大家推着铁车，把笨重的机器运到湖岸，再用粗大的树干搭起架子，当作起重机，把机器、材料吊起来送到大帆船上。一溜数十条大船张开了白帆，像一支出海舰队，浩浩荡荡，越过了射阳湖，驶进中山河的支流。

前面有一座小山堵住去路，船停住不动了。跑上小山一看，前面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中间躺着黄水滚滚的黄河故道。这小山就是旧黄河的堤岸。旧黄河河床本来没有水，有的地方早已种上庄稼，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它的军事进攻，竟不顾人民死活，在上游扒开缺口，把洪水重又导向黄河故道，在我们来到以前，无数田园和村庄已经被淹没了。我们离开了中山河上的船只，准备跨过旧黄河，继续北进。

在又高又陡的旧黄河的堤岸上，我们拣好一棵

粗壮的大树，架上起重滑车，滑车的巨钩套住捆在机器上的绳索，把又圆又粗的木棍垫在机器下面当车轮，上面的同志拉滑车的铁链，下面的同志拿铁杆撬着机器，上下一阵吆喝，那笨重的机器，像蜗牛一样缓缓爬上一百多公尺高的斜坡。接着，又把滑车移到前面的大树上或是木桩上，一步一步把机器拉到两里地外的渡口上。同志们跳下水，来回推着仅有的一只渡船，把机器、材料运过了宽阔的旧黄河。最后在新沂河换了船，经过小河道，斜穿陇海路，进入了山东境内。

船只向西北行进，河水越来越浅了，早潮起来时，海水向西灌进小河，河水涨满堤岸，河上有桥挡住，我们就把船硬向下压，拖了过去。天过正午，河水随海潮又回头向东，直往下降，变成了浅水沟渠，船只搁在河底上，静静等着晚潮上涨。再往北行，地势更高，想寻找河水最深处挤过去，但是机器太沉重了，压得船底紧贴着河底淤泥。同志们卷起裤腿，爬上两岸，曳起牵绳，拖着躺在光滑淤泥上的木船，步步前进。

秋末的骄阳像一团烈火，河底的淤泥都被烤干了。北去的航路最后断绝，我们只得转入陆地行军。老乡们有的套上双轮牛车，有的推着独轮车，赶来搬运机器。一千多头黄牛，二百来架手推车，车挨车，人挤人，排满了十里路长的堤岸。

再向北去，路很狭窄，双轮大车搁不下，只好让一个车轮在小路上滚动，另一个车轮由同志们抬着向前走。一到天黑，树林就是住地，人们燃起成堆的篝火，啃着冰冷的干粮，夜间就钻在大车底下，呼呼睡去。我不敢停脚，骑着马东奔西跑。寻找区村干部，安排明天的行程和粮草。刚一合眼，队伍又要出发了。

离开淮南，正是炎夏季节，到达沂蒙山区，已满天飞雪了。我们在河滩上一个背靠悬崖的村庄里，安下了家。同志们扫去堆积在机器上的厚雪，在茅草屋里架上天轴，继续制造弹药。

战火燃烧到山东解放区。敌机四处扰乱，邻近十多里的村镇都被炸平了。但是我们的工厂始终平安无恙，因为那险峻的崖顶向前突出一大块，正好掩护，敌机怕撞上高峰，不敢低飞，炸弹丢不准，不是落在河心里，就是落在山头上。只要山不塌，机器声就不停止。

可是，经过长途强行军，我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伤。时常头晕，炸瞎的那只左眼，老是红肿不退，直流粘水。不想吃饭，夜夜失眠。有时工作着就晕倒了。

党决定送我到东北，把身体治好。

一九四七年初春，我和陆平穿过胶济铁路，到达烟台附近的一个渔村里，这就是渡海兵站的所在

地。一个黄昏，我们乘着一只小火轮，离开了码头。在惊涛骇浪里，躲过敌舰的探照灯光，在第二天黎明，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了东北的一个海港。

在海滨的山坡上，我住在一座小楼里休养，上级给我找来许多医生，给我治疗眼睛。医生们诊断：眼睛红肿流粘水，是因为左眼里留有弹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取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静养，多休息。

早晨，太阳从海水和天空连接的地方升起来，红色的光芒把屋子照得通明。正是四月，山间背阴地方还有残雪，可是在向阳的小楼周围，绿草丛中已经开出一朵朵不知名的小花了。在这样美好的春天，不能工作，真是莫大的恨事。每夜我躺在床上，都是翻来复去不能入睡。心想：如果医疗无效，就赶快到工厂去吧！每时每刻，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人民都在从事艰苦的战斗。而我却这样白白荒废时光。休养了一个多月，我再也不能安心住下去，就请求恢复工作。

在毛主席英明的战略思想照耀下，人民解放军迅速转入反攻，国民党反动派在各战场上都遭到惨败。敌人的美式装备大批落在人民手里，我们的野战军装备了大钢炮。战争已经是大规模的攻坚战和阵地战了，没有大量的炮弹，就不能保证战斗的胜

利。当地党组织得到指示；争取在很短时间内，建立大规模的炮弹厂，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七月，我被留下参加建立新的兵工厂。前淮南军工部政治委员吴屏周也被调到东北，负责建立炮弹厂，并担任厂长。我担任总厂工程部副部长，负责建立引信厂，兼任厂长。

为了提高炮弹产量，我建议改变生产方法，用水压机压制，来代替半手工切削，这样可以使产量提高数十倍。领导上同意了我的意见，委托我去帮助吴屏周建厂，同时负责安装水压机。

在荒凉的山沟里，筑起了钢筋水泥的工厂，高大的水压机耸立在车间里。各种工作母机整齐地排满了加工车间。无数的电动机拖动了全厂机器。我们已经不再摇动石头磨子和用毛驴拖车轮子，而是电气化了；也不再用手工方式造生铁炮弹，而是使用近代化的机器来造大型的美式钢炮弹了。我们自己也有近代化的电气炼钢厂和新型的火药制造厂了。革命事业飞快地发展着，人民的胜利临近了，斗争要求我们尽最大努力，不要掉在后面。

我们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白天，我在炮弹厂车间里和工人同志们一起安装工作母机。研究制造炮弹的方法，也回到正在建设中的信管厂，和同志们一起计算引信零件的工时和所需要的机器，研究制造方法，计算材料的需要量。晚上，住在信管厂

里，常常工作到夜深，设计新机器，为了赢得时间，决定提前进行炮弹试验，准备厂房完全建成以后，立刻正式生产。

在炮弹的试验生产中，钢炮弹上的铜弹带始终没法压紧，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专用的巨大水压机。如果弹带嵌压不紧，就会引起炮弹在炮筒里爆炸，把大炮炸毁。可是，时间已经不许可我们造这样庞大的特种水压机了。这个困难不解决，生产就无法进行。我忽然想，可不可以研究一种简单的工具，来加大弹带的压力呢？长期和炮弹混在一起，我已经逐渐掌握它的性格了。我立刻开始设计，用一段粗纲柱制成一个漏斗形的钢模，迫使弹带周围都能受到高压，牢固地嵌在炮弹上，使炮弹在发射时，不会受到火药的高压而脱落，保证炮弹在战场上不发生危险事故。和工人同志们一商量，大家都说很好。果然钢模造好以后，一试验就成了。

炮弹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个个被解决了。最后碰到炮弹钢的热处理问题。钢炮弹最后要不要热处理加工，只有进行炮弹爆炸试验，检查破片的情况才能决定。

我搬运了八个炮弹，傍晚回到信管厂，准备明天试验炮弹爆炸。

我走进了建设着的火药装配车间。车间主任陆平正带领女工同志们连夜在整理工具，安装新机



器。几天没回来，工厂已经变样了。前几天，地上还是坑坑凹凹，四壁透风，现在已经铺上水泥，安上高大的玻璃窗了。

陆平帮我找齐要用的工具，我工作到深夜，装好了八个炮弹。第二天早晨，把炮弹搬上了车，运到炮弹厂。临上车时，陆平赶来嘱咐着：

“当心一点，不要又挨炸。”

“得了吧！炮弹总算跟我有交了交情，这回也许客气点。”我顺口回答她。

午饭后，开始了试验。

在傍海岸的山脚下，选好了试验场。我怕发生意外，让同志们都留在山外边。吴屏周和我走进山里；在山脚的乱石坪上，挖了一个坑，把炮弹埋进去，外面只露出炮弹的信管。又在信管撞针的横销上系一根绳子，拖到远处小土丘的背后。我俩卧倒在土丘后面，张大了口，免得耳朵被爆炸声浪震聋。我把绳子一扯，岩脚下立刻像火山爆发，地里喷出一支火柱，那巨大的爆炸声冲击着山岩，震得悬崖上的石片和泥土纷纷下坠，声浪被高山阻挡回来，消逝在辽阔的海洋上。炮弹的破片和碎石凶猛地向四面飞进，“簌簌”飞过我们的头顶，飞进了奔腾的海浪里。

我们两个紧紧地贴在地上。吴屏周微微抬起了头，伸了一下舌头：

“好家伙，真厉害！”

“就是要它厉害啊！”

我俩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土，忙去搜寻破片，作了爆炸结果的记录。接着埋下了第二颗炮弹。

第二颗炮弹也同样地爆炸了。

又埋下第三颗炮弹。我使劲一扯绳子，撞针的横梢掉了，可是炮弹却不声不响，我们伏着一动也不敢动。吴屏周忍耐不住了。站起来，要跑去看个究竟。我连忙扯住他的衣服说：

“再等一下！像这样的事也是常有的：炮弹当时不爆炸，等你走近它，它又正好爆炸了。我们抽枝烟吧。”

海涛不息地喧哗奔腾着，炮弹仍旧是没有动静。心里很烦躁，我丢掉烟头，一跺脚，对吴屏周说：

“你蹲在这里等着，我先去看看。”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炮弹，轻轻卧在地上，仔细地观察，寻找它不爆炸的原因。神经一阵阵地紧张，心里怦怦地直跳，我长长呼吸了两下，让自己镇静下来。

撞针打下去了，有没有打中起火雷管呢？得不到答案。唯一的办法，只有冒着危险把信管拧下来。我紧紧地握着信管，使劲一拧，心又急跳起来了，我屏住气息，慢慢卸着信管，警惕它受到震

动。吴屏周不放心，紧跟着也跑来了。我们刨开炮弹周围的泥土和石块，把炮弹从土里取出来。紧张的搏斗结束了，汗水湿透了内衣，清凉的海风吹过来，身上说不出的畅快。

这一颗炮弹作废，我们继续进行试验。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都爆炸得很好，扬起的尘土像浓雾一样弥漫了山脚，那沉雷般的爆炸声夹着弹片的呼啸，压倒了海浪冲打山脚岩石的怒吼。

我使劲地扯动了第七颗炮弹的绳索，炮弹没有爆炸。再拉绳子，绳子却松劲地躺在地上，我怀疑这绳索中段某处被拉断了，慢慢地把绳子收回一看，绳子头牢牢地拴好钢丝的横梢，可是炮弹还是不响。吴屏周和我彼此望了一眼，他眉头一皱：

“怎么又不响啦？”

“照老规矩，抽烟！”

我们点着香烟，一声不响地蹲在土坡后面，低着头苦苦地思索炮弹不响的原因。

“难道又是信管的毛病？”我脑子快要炸开了。

“那可不一定！……”吴屏周说。

忽然他用力摔掉手中的半枝香烟，向炮弹跑去，我一抬头，他已经上了土坡，我急忙丢掉香烟追过去。

“等一下，别动手。”我一边跑一边喊。

“这回该我了，你别来！”他只顾往前跑。

我们两个同时到达埋炮弹的地方，老吴背着高山蹲下去，准备检查炮弹，我背着大海也蹲下来，颗炮弹就在我俩中间。没想到我两腿刚往下弯，这炮弹就像山崩地裂样地爆炸了。

巨大的爆炸波浪把我从地面抛起来，我心里像着了火，窒息难忍，两手紧紧抓住胸前的衣服，想把它撕开。我被轰到五六丈外海滩的沙地上，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迸着火花，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已经死去了。一阵刷烈的疼痛告诉我，死亡还没有夺走我的生命。我活着，我还活着。可是我的伙伴呢？我的同志呢？我一翻身，想站起来去寻找吴屏周，可是马上又摔倒在海滩的血地上。我的左手腕被炮弹截断了骨头，右腿膝盖下被炮弹炸劈一半，骨头也截断了。脚趾炸去了一半，脸上许多伤口不住流血，炸烂的衣服被血浸透，成了血人。我翻身跪在地上，右手撑着地，向山坡爬去，刚移动一步，又摔倒了。我又挣扎坐起来，用眼睛向山脚那边寻找我亲爱的同志。只见岩石旁躺着一条模糊的黑影，吴屏周被轰到山岩脚下。我拚命地高声叫喊：

“老吴！老吴！……”

可是他一声不应，躺在那里。我想他一定是昏过去了，听不见，更使劲地叫喊着：

“老吴！老吴！……”

等在山坡外的同志们，在巨大的爆炸声后，听见有人喊叫，唯恐发生事故，有两个同志连忙沿着山脚过来了。

“同志们！快把吴厂长送到医院去。快点！快点！”我声嘶力竭地喊着。

那两个同志跑到吴周屏面前，蹲了下去，不一会，又慢慢地站起来，立正摘下帽子，低下了头。  
……

吴屏周牺牲了！

他在旧社会里从小就受苦，父亲是一个火车司机，全家缺吃少穿。抗日战争开始，他就参加了人民的军队，起初在津浦路西解放区做群众工作，后来担任了淮南军工部政治委员，不久前担任华中军械处的政治委员，被派到东北来建立炮弹厂。我们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现在，这个党的优秀儿子，工人阶级的战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哀痛使我忘掉肉体的痛苦，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掺合着脸上的鲜血，滴了下来。

一辆大卡车开到山脚下。车上垫好三床棉被，同志们把我抬了上去。

汽车开过乱石地，车身猛烈地颠簸着，我咬紧牙根，忍受着疼痛。汽车开出山口。总厂党委书记

带着护士慌忙地赶来，给我注射强心剂和止痛剂，作了止血手术。党委书记爬上汽车，抱住我的头说：

“运铎同志，我来晚了，使你受苦了。”

我伸出手，想握握他的手。可是，又是一阵疼痛，只喃喃地说：

“我很快就会好的。”

汽车转上平坦的公路，奔向医院。同志们在两旁用手紧握着棉被的边沿，把我抬下车来。我昏迷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们用剪刀剪去我全身衣服，要把那些大块弹片取出来，却没法下手。因为我全身是伤，没法施行局部麻醉，如果施行全身麻醉，又怕麻醉过去醒不转来。医生只好干脆不用麻醉，把我按在手术台上，用刀、用钳子硬干。

我昏过去，醒过来，就像经过好多个漫长的日夜。党给我勇气，敢冒生命的危险，党也一样给我毅力，来克服疼痛。我忍受着，忍受着，竭力不叫出声来，又昏过去了。

## 永远前进

不知经过多少日夜，我才清醒过来。

一个早晨，正在睡梦中，忽然感到手脚被什么东西夹住，伤口疼痛难忍。睁开眼睛一看，陆平正俯在床边上，带着忧虑的脸色，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让动弹。工厂派来的小朱双手抬起我的右腿，医生们正在换药。疼痛钻心，我咬紧下唇，轻轻哼了一声。陆平更紧地抓住我的手腕，好像怕我从床上滚下来。她朝我一咧嘴，镇静地说：

“别动，马上就完了！”

我昂起头，眼睛随着医生的手转动，只见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手指那么粗的青筋也炸断了，有两三寸长一段吊在伤口外面，左腿被碎片崩的尽是芝麻大的窟窿，就像一个个蜂窝。医生在右腿的大伤口上，一连塞进去几大卷纱布。换药延续了一个多钟头。

我觉得胸部一阵阵的痛。陆平忙掀开棉被，解开我的衣服，发现左胸突起一块茶杯口大的紫黑色伤痕。陆平呆呆地站在那里，她用惊奇的眼光凝视着伤痕，思索了一会，急忙转过身去，拉开小桌抽

屈，拿出一只怀表，递给我说：

“你看巧不巧？这是在你衣袋里掏出来的。”

我也愣住了。原来有一块凶恶的弹片，正巧被左边衣袋里的怀表挡住了，表里的机件打得粉碎，只剩下击扁了的外壳。如果没有这只怀表，或是弹片再偏一分，那就一切全完了！

我躺在床上，左手和右腿都被夹板牢牢地固定了，头部、腹部一直到脚尖全被纱布绷带缠满；就像被铁钉楔在床上一样，一动也不能动。我知道伤势是严重的。在皖南，机器砸坏了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这一次，又会落个什么结果呢？从那些来看望我的同志们的脸色上，可以得到答案。但是，我相信死亡跟我无缘，我战胜它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即使是死，或者落个重残废，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既然是战斗，总有牺牲者，不是自己，就是别人。在这时候，不禁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里通过保尔·柯察金所说的话：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



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是的，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而我们的事业却无限长久。个人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许多痛苦，但是只要我的劳动融合在集体的胜利里，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远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党就号召我们学习保尔·柯察金的优秀品质，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程度。不久，我从淮南《抗敌报》一个同志那里借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那是淮南仅有的一本，经过许多人的手，书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虽然由于环境的艰苦，灯油越发越少，灯草也由三根减到一根，保尔·柯察金仍然跟我一起守着微弱的灯光，度过好几个夜晚。在他那火焰一般绚丽的生命光辉的照耀下，我真正感到自己的渺小。但是我也毫不气馁地勉励自己：应该不愧为他的一个朋友和同志。

解放战争正当紧张的关头，前方多么需要炮弹，我却老是躺着，一动也不能动，总觉得没尽到责任。为了静养，我曾强迫自己不想心思，可是只要精神稍好一些，头脑里就会出现工厂里、前线上激战的场面。我的心飞出病房，奔到工厂，想像着车床在飞速旋转，大批大批的炮弹生产出来，日日夜夜，用卡车装着，用毛驴驮着，用牛车拉着，越

过凸凹不平的道路，越过遍地泥泞，送到前方去。我们的炮弹，像疾风暴雨一般，落在敌人阵地里，在漫天的烟尘中，敌人的工事垮了，战士们突破一重重障碍，把胜利的红旗插在祖国的各个角落。

.....

然而，一睁开眼，望见的只是雪白的天花板。劳动的欢乐，胜利的喜悦，都离得很远。我感到不安，哪怕是回工厂看一眼，呼吸一下工厂的空气，也会给我很大的满足。我开始了挣扎。不料刚一挪动身体，剧烈的疼痛又把我扳倒了，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爬起来，我恨得流下了眼泪。

腿上那根被炸断的筋已经割掉了，只剩下一根细骨头连结着脚和腿，腿骨缺了一寸多，短时间是长不好的。听医生们说，如果把腿锯掉，一星期就可以出院。我几次下决心锯掉腿，装一只假腿，回去马上可以工作。但是，我和陆平一商量，她却不同意。她严肃地说：

“最简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腿能锯掉，眼也能挖掉，对个人来说，顶多有些不方便。可是怎么工作呢？快别胡思乱想了！”

我再也无话可说，不得不丢掉锯腿的念头。可是我还是极力想做点什么事情。

我曾经多次拆过信管，也读过有关信管的材料，如果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告诉同志们，他们一

定要少走一些弯路，对建厂也许有些帮助。经过再三请求，医生们才同意，他们把我扶起来坐在病床上，背后垫了两床棉被，又给我找来一块方木板，摆好纸。我用绕满绷带的左手和木夹板按着纸张，右手慢慢地写文章。头一天，写了两千字，心里充满了愉快。一连三天，我连写带绘图，完成了初稿，送到总厂。他们用油印印成了小册子，党委还在第一页上加了按语，这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

浑身疼痛还没有减轻，又咳嗽起来了，我怀疑有肺病，医院里给我拍爱克斯光照片，证实肺部正常，只是头壳和两腿有些碎弹片。医生也不瞒我，坦率地说：

“你的左眼失明，是弹片崩的；现在据爱克斯光照片诊断，你的右眼里，也有了一小粒破片。”

那就是说，剩下的一只眼睛也碰到危机了，每年每月，都要过黑暗无光的生活了。我着急地问：

“很快要瞎吗？”

“很难说。”医生惋惜地说。

我不顾再问了，双目失明，的确是致命的打击。没有了眼睛，能做什么工作呢？工厂不需要失明的人，机器也不愿意和盲人作伴。我想起儿童时候，矿山上常有一个盲人坐在街头的树阴下说书，弦子一拉，周围就集拢来一大群人。他那充满情感的声调，引起了许多老人的叹息、青年的愤慨和孩

子的好奇。我和二哥常常听《岳传》听到半夜，不肯睡觉。那些矿工们也忘记了劳累，一直听到散场。如果我瞎了，就到农村去，做一个盲人宣传者！

做一个歌唱宣传员，得学会一种乐器。央求陆平给买了一只胡琴，我用左手仅剩下的一个小拇指，在弦上滑动，学习拉胡琴。……

左手腕的骨头已经接好了，在爱克斯光照片上可以看见折断处四周长了一圈新骨头，正像电焊工焊铁棍一样，牢牢地把两截断骨连接起来了。可是右腿骨仍旧有一寸来长的空间，新骨头一点也没生长，瞧着爱克斯光照片，真叫人发愁。医生用石膏绷带，把我从脚趾直到大腿全裹上，把伤口部分的石膏绷带挖了一个大洞，每天照样换药。为了使我早日复原，医院特别照顾我，对我的饮食作了安排，让我多吃含有钙质的东西：鸡蛋、牛骨髓，螃蟹，虾，海带。不过，要让这一寸长的骨头重新长起来，至少还得几个月。怎样度过这痛苦而又漫长的日子呢？我给自己排了一个课程表，抓紧时间学习。以前，因为缺乏必需的知识，工作中碰到过许多困难；现在正应该急起直追，趁着眼睛还有用，赶快把自己充实起来。

我如饥如渴地读着各种文学书和理论书，也学了外科医药知识。后来又学习外国语文。我们过去

搞到不少日文技术书籍。可惜看不懂，现在我要求组织上请来一个日文教师，学了三四个月以后，借着字典的帮助，居然能看日文书了。

春天的太阳越过海岸上的山峦，金色的光线穿过玻璃窗，射进了病房。我给自己的课程表新添了一门功课：每天在床上做早操和晚操，争取早日下床。

周身的伤口都已经封口了，只剩下右腿上的伤口，还是顽固地张开红色小口，折断的骨头也没有长好。半年多来，一直躺在床上，背脊、屁股老磨着床垫，肌肉都磨烂了，只得用汽车内胎打足气当垫子。长期不运动，各部关节也逐渐地丧失了机能，脊椎骨硬得像是成了一整块骨头。我在病床脚头的栏杆上拴上一根粗绷带，用手拉着，想慢慢使上段身体离床坐起来。第一天，因为急着要试试，用力过猛，把绷带拉断了，第二天，拴上了一根更粗的绷带，继续练习。

到了四月，腿上的伤口完全长好了。一天早饭后，我右手拉住结在床头上的绷带，左手撑着病床，使劲抬起了身子，坐起来了。过分的兴奋，使我的嘴唇不停地颤抖，两手也微微哆嗦。我极力镇静下来，开始第二个动作。我试着移动右腿，沉重的石膏腿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也不动。但是左脚已经不知不觉落地了，被子也被拖到地上。陆平连忙

递给我两根新拐杖，小朱抬起我那沉重的石膏腿，轻轻地放在地下。我把拐杖支在腋下，左脚一蹬，离开躺了七个多月的病床，站起来了。虚弱的左腿支不住全身重量，不住地颤抖，全身也不停地乱晃，吓得陆平和小朱赶紧扶着我。我撑开双拐，左脚向前一步，顾不了打扰隔壁病房的安静，快乐地高声喊着：“第一步！”接着又移动双拐，高声喊着：“第二步！”“第三步！”

我走近窗口，从三楼上明亮的大玻璃窗里望见远处绿油油的山，淡蓝无云的天空。我推开窗子，温暖的风，带着诱人的清香迎面扑来。多好的春天啊！

海岸上传来工厂里迷人的机器声，我的心也跟着它怦怦跳动。我禁不住喃喃自语：

“走着瞧吧！我一定要赶上你们。”

再不能等待了！我要回工厂，把七个多月的空白全给填满！我走近墙边的沙发，放下双拐，坐下来写报告，请求区党委准许我出院。

当天下午，接到区党委指示，已经在离海岸不远的风景区，拨出了一幢楼房，要我继续休养。

遍地是青葱的林木，建筑物整个座落在绿海里，微风不时吹来桃花的落英。小朱扶我下了马车，我架着双拐，走进庭院。小径两边尽是花草。住宅里有明亮的会客厅，铺着地毯，摆着整齐的沙

发和餐桌，卧室里摆着钢丝床和衣柜，读书室里靠窗口摆着书桌和书架。一切都好。

每逢假日，工厂的同志们常常来看我，告诉我许多令人兴奋的消息：工厂已经建立起来，炮弹也开始生产了。我想研究一种烈性炸药，增强炮弹的杀伤力。对炸药我学的并不多，不能说是内行，正因为这样，就更想研究它。我搜集了许多有关炸药的日文书籍来阅读。不过书里对这种炸药谈的也很零乱，我就一点一滴地学，再把那些片断连贯起来。一种学问，初学起来，是那样深奥，那样枯燥，可是一钻进去，就觉得趣味无穷，不忍释手了。我一边读一边记录，越读越有味道。

我又请求上级购买了化学实验仪器和药品，在疗养室里布置了一间小型的炸药实验室。疗养院的党委非常关怀我的实验，房子不够用，特地拨给我一幢房子作操作室，分为化工室和机械室两部分，我成天在实验室里工作。首先精制原料，使原料重新结晶；接着又把玻璃盆里装上冰块，制造冷冻液，使炸药原料在零下十五度硝化。可是，开始试验总不顺手，烧杯一接近冰碴就碎了，硝酸跑得没有影子，一连好几次都是这样。屋里弥漫着硝酸烟雾，呛得人不能张口。我并不灰心，坚持实验，克服了各种阻碍，两个月后，终于造成了这种高级炸药。

转眼就到夏天了。每天傍晚，迎着灿烂晚霞，我沿着平滑的林荫路，撑着拐杖散步。经过爱克斯光检查，腿骨已经完全长好，新的骨头填满了那一寸长的空间，医生给我解去了十多斤重的石膏绷带。只是刚长出的嫩骨头支持不住身体的重量，还需要拐杖的帮助。我盼望尽早丢掉拐杖，自由地行走。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缴获的美国大炮更多了。我们工厂的任务也逐渐加大，要大量制造美式炮弹。各种炮弹的信管构造很复杂，而且要有极高的灵敏性和安全性。总厂厂长几经考虑，决定把设计信管的任务交给我。

全国大陆解放的日子越临近，也更需要我们贡献力量。可是一时又不许出院，我再三请求，让我在疗养院研究和设计草图。上级同意了，并且送来新的制图机和仪器，还有这种信管的参考实样。我又布置了一个机械设计室，钳桌上安好了老虎钳、手摇钻，准备了锉刀、铁锤和别的一些必需工具，动手研究信管每个零件的制造。

我谨慎地拆开一个信管，仔细研究每个零件的作用和构造。这是由七十多个零件组成的极复杂的装置，信管雷管装置得很特殊，雷管里的火药全封得死死的，炸药无法取出来。取不出炸药就无法进行化学分析，就不能了解这种炸药的成分。我坐在



钳桌旁边，用两块木板夹着雷管，再轻轻卡在老虎钳口里，特别小心地用小刀一点又一点地挖去雷管口上的金属封闭片。不料刚一瞧见那白色的炸药，忽然雷管轰的一声爆炸了，幸亏老虎钳口挡住了破片的横飞，雷管破片向上冲起，把天花板撞了个窟窿，老虎钳的钳口也崩掉一块。

小朱听见爆炸声响，惊慌地闯进来，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遍：

“没出事？”

“你看！”我指着老虎钳缺口。

他长吁了一口气：

“好险！”

等他走后，我又夹上第二个雷管。除去刻掉雷管封片外，没有别的安全有效的方法。我坐在钳桌旁边，再照以前的方法，用小刀缓慢地刻着，刻一刀停一停，最后取出了炸药。

到了秋天，信管的图样全部完成。我丢掉了那两根拐杖，可以拄着一根手杖行走了。只是腿上的筋断了，转势不大灵活，走不快。

我终于回到了工厂。

几个月不见，工厂完全变了样，在原来的空地上，出现了一排排的新厂房，连厂里道路我也摸不清了。同志们看见我回来，都很高兴。总厂建立了新的机械、物理、火药化学实验室，指定我兼实验

室主任。不久，新引信开始了正式生产。

接着，总厂成立了一个专门学院，培养技术人才。讲课的人都请来了，只有机械系少一个机械制图讲师。总厂厂长跟我商量：

“老吴，你教书吧！”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小学还没上完，怎么能够去教大学生呢？我连忙说：

“别开玩笑！这可不是咱们干的。”

“照你说，该谁干呢？”

“你知道，我是个工人……”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是个共产党员。咱们学会了打仗，学会了造枪造炮，也得学会教书！”

早年在煤矿里做工，我只会看图纸，总觉得制图很奥妙。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亲自设计图样，不知不觉也会制图了。但是要真正讲出道理来，那就不能光凭经验，还需要理论知识，这正是我所缺乏的。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拒绝学习，我同意去试试。

同学们在讲台上摆好了座位，脚下还安置了一个搁脚的软垫子。我就坐着讲了半年课。每天晚上，我在灯下阅读参考书，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写讲义。这使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提高，弄懂了许多以前不大明白的东西。我深切体会到：要当先生，先得当学生。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工厂实行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我们造出的炮弹，不仅源源送到辽沈战场，并且飘洋过海，送到遥远的淮海前线。我们深深引为自豪，因为在人民解放斗争中，我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工作得像一个真正的战士。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永远难忘的日子，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旧中国死亡，新中国诞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祖国以闪电般的速度前进着。码头上起重机轧轧作响，列车载着各种器材开往建筑工地，第一批勘探队已经出发到边远地区，寻找埋在地下的宝藏，高山峻岭之间，正铺好枕木，开凿隧道。淮河两岸集结起百万劳动队伍，展开了征服灾难的斗争。每天打开报纸，这里是新纪录，那里是新发明，“首次通航”“首次开工”……这一切都标志着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会创造一切奇迹。这是毛泽东时代新的史诗，人民真正成了生活的主人。我渴望着迅速参加建设的行列，跟同志们一起，投进火热的斗争！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是生龙活虎、精力充沛的战士，随时准备到最艰苦、最困难、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吧！  
从人民和党那里，我们将获得无穷的力量，去移山  
倒海，开发矿藏，修建水闸，征服沙漠，把我们祖  
国建设成美丽的花园！在敌人还没有投降的时候，  
不要放下你的武器！在为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做一个无限忠诚的战士，  
永远前进！

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吧！  
从人民和党那里，我们将获得无穷的力量，去移山  
倒海，开发矿藏，修建水闸，征服沙漠，把我们祖  
国建设成美丽的花园！在敌人还没有投降的时候，  
不要放下你的武器！在为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做一个无限忠诚的战士，  
永远前进！